# 经济学方法

## 十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

王小卫 宋澄宇 编

杨小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
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
许成钢：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陈志武：解读经济学在中国的现状
张　军：走出"经济研究"
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
张五常：经济学的系统思维
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已八十多年，今天我们还在为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谁是主流、谁是非主流以及什么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展开争论，这本身说明经济学在中国还在初步形成，并没成熟，更谈不上中国经济学家不久要主导经济学世界。

——陈志武 教授

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

——林毅夫 教授

要解释现象，我们要先有现象在手。换言之，不顾现象的真实性而搞纯理论，是闭门造车。

——张五常 教授

经济研究是寻求经济事件、现象或经济诸现象之关系的可靠的解释，而可靠的解释只有在一个有计划的、设计得当的并且科学细致的理性程序中才是可能的。这种程序遵从了科学界和学术界的某种公认的规则。

——张 军 教授

责任编辑 王联合

ISBN 7-309-04892-X

9 787309 048926 >

F·1106 定价：25.00元

# 经济学方法

## 十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

王小卫 宋澄宇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方法——十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王小卫,宋澄宇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
ISBN 7-309-04892-X

Ⅰ.经… Ⅱ.①王…②宋… Ⅲ.经济学-方法论 Ⅳ.F0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4117 号

**经济学方法——十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

**王小卫 宋澄宇 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王联合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3.75 插页 2
**字 数** 217 千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 100

**书 号** ISBN 7-309-04892-X/F·1106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由王小卫、宋澄宇编选的《经济学方法——十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这本集子，收集了经济学界十一位领头学者的方法论著作，其意义重大。这不仅仅因为这几年关于经济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争论在不断升温，而且也因为翻译、引进经济学达一百年之后，是该问一问：在中国除了有经济之外，是否真的有经济“学”？如果还没有，那又到底如何让普世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时下时髦的“谁谁是一流、二流、三流”这种无聊话题，也不是要做多少年后中国经济学家会得诺贝尔奖这种毫无意义的预测。

像许多现代学科那样，晚清洋务运动之前在中国是没有“经济学”这回事的，那时充其量只有一些经济思想或者说关于经济的智慧，是一些简单的经验总结，而不是经过严格证明的科学理论。洋务运动期间，经济学与其他西学开始进入中国，其中以严复于1897至1902年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重要标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就扎根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已八十多年，今天我们还在为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谁是主流、谁是非主流以及什么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展开争论，这本身说明经济学在中国还在初步形成，并没成熟，更谈不上中国经济学家不久要主导经济学世界。

回想一下，“五四”时期盛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到今天还没有全面改变中国文人研究人与社会的方法论。“德先生”带来的

是民主与自由的理念，不是研究方法；而“赛先生”是研究方法论，是科学方法，但以往这又被理解成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研究方法论，跟社会科学没关系。于是，在多数人眼里，“赛先生”是“术”，不是“道”，以至于到今天中国还只有“经济智慧”、“经济思想”，但没有真正的“经济学”。

“经济智慧”与“经济思想”充其量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经验总结，不一定是科学。中国人的智慧是众所周知的，像孔子、孙子、管子等这些两千多年前的先哲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中，齐国时期管子的经济思想至今还是那么经典，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但是，传统的人文社会理念与智慧往往不超出个人或局部社会的经验总结。换言之，孔子自己的生活经历可以说非常丰富，他周游列国十四年，对周围的人和事观察得也绝顶细致，从这些经历和观察中他也提炼出了绝顶、绝世的精华。但是，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当时交通技术的限制使孔子不能周游到今天的中国疆土之外，在今天看来，他所能收集的“样本”自然局限性很大。再者，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处境也可能千差万别，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观察与体验到的规律未必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社会的规律。

所以，基于个人或局部经验的“经济思想”不一定经得起时间与环境的检验。特别是近几十年的研究发现，人们普遍具有“选择性记忆”的行为偏差：专记自己想看到的经历，忽视与自己愿望相背离的经历和现象。这种行为偏差在古代有，在今天的人中间存在也属自然，以至于时不时有人会对社会、对经济妄下结论，或者以偏概全。因此，在没有经过“逻辑考证”（比如，基于数理逻辑的经济模型推证）或“数据实证”之前，一种“经济思想”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谬误。

换言之，中国的工匠技术与手工业历来发达，但工业革命却偏偏发生在西方的英国而不是中国。原因是在西方出现了科学实验室，让研究者可超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超出“经验”去设计制造各种假想的实验状态，可以多次重复实验，也可以让很多人在不同地方重复实验，以此来发现在个人不可能经历到的状态下物质和自然的规律，这样研究的结果可以大大超出个人的经验总结。例如，正常人是不可能经历一千度的高温，因此也不会知道在一千度高温下泥土的物理表现会如何，但在特设的实验室里这是容易模拟、发现的事情——科学实验室和数理逻辑是科学方法论的两大支柱，使人类的知识远远超出基于个人经历的智慧。

让我们庆幸的是，经过洋务运动之后一百多年的努力，“赛先生”在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算是扎根了，一代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已为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都有目共睹。但是，“赛先生”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经济研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管子时期就有的“经验总结”方法。特别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下，由于经济学又不制造兵器炮舰，自然不在“术”的范畴，因此觉得“赛先生”对其不适用。洋务运动之后的一百多年并没改变“中学”轻实证、轻形式逻辑考证的研究方法，还只停留在“经验总结”上。对于从西方引进的相互矛盾的思想，我们只能根据灵感和需要去取舍，特别是根据“主义”去取舍，而不能做自己的“数据实证加逻辑分析”。

在没有以实证和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实验室”的条件下，过去一百多年里我们的精英决策者只好根据自己“觉得应该是对的”理念，拿中国社会本身去做试验。让中国社会亲身为一个个理念做试验的代价是什么呢？其代价是连续不断的革命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不仅如此，事实上，即使在一个试验导致千千万万、甚至几百万人失去生命之时，按理说这些灾难性结果足以证明当初的理念是错的，但是决策者也不一定会承认这种错误，可能还会让全社会遭受下去——为什么会这样拿社会本身去做试验呢？道理很简单，既然没有“社会科学实验室”帮助我们通过实证和形式逻辑发现一项决策的各种可能后果（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就只好拿真实的社会去做实验。实际上，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还真的在这样做着。这让人想起来都后怕！

那么，“实证加数理逻辑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背后又代表一种什么含义呢？其实，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经济学模型研究是与“理论物理”、“理论化学”和“数理生物学”相对应的，其作用是检验一些理念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以及推演出经济决策的各种后果。这种逻辑分析显然是成本最低，不需要直接拿社会做实验。

而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又与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的重复实验研究相类同，它跟个案实验或案例研究的差别在于，前者能避免个案的偶然性、避免以偏概全。但问题是，对于像制度机制、政策选择等问题又如何收集大样本数据或者重复试验呢？

好就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脑技术的普及，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之后，研究人员已经把世界近两百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数据输入电脑，然后组成数据库，以免费或很低成本的形式供世界各国有兴

趣从事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人使用。由于今天以及过去世界各地的国家形式和经济形态各种各样，社会与文化环境也各有差异，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果也不全相同，这些跨国、跨社会的丰富数据显然能帮助我们检验关于人和社会的各种理念与假设，以判断这些理念的真伪。如今，为不同学科建立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库在互联网上可以方便地搜索到，这真是现代人的福气。这些历史与经验数据当然离可靠的、可完全重复的“社会科学实验室”还很远，但至少现在有能力把两百个国家的实际成功与失败经验综合在一起，辨别其中的共同规律，让我们有可能避免一些国家犯过的错误、经历过的教训，以免我们再像以前那样非要亲自“以身试法”不可。特别是，通过分析众多样本国家的经历，我们能够更系统地领悟出他国成功的经验。比如，像哈佛大学的 Andrei Shleifer 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十年里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整理出一百多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量化数据，他们对许多旧的和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做了系统的计量统计研究，使停顿多年的政治经济学变得耳目一新。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学术研究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能从世界学到的不再是简单照抄的思想与理念，而是一套研究经济、社会与国家的形式逻辑方法论，再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证伪的跨国数据库。这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的融合正在开启新的一页，预示着中国近代思想变迁过程中的又一次大转变，而且是正在进行中的转变。当然，转变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使其完全基于形式逻辑和数据实证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想一想从晚清洋务运动到今天终于弄懂自然科学技术，整整花了一百多年，我们就能理解这个过程的艰难，更何况这是接近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决策可能还得继续靠“摸着石头过河”，但我期望中国老百姓为“试错”埋单的肩负越来越小直至完全消失。

陈志武

2005 年 11 月 15 日于耶鲁大学校园

# 目 录

序言 …… 陈志武 1

杨小凯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 1

林毅夫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 …… 11

林毅夫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 …… 26

钱颖一 理解现代经济学 …… 41

钱颖一 经济学家市场在美国 …… 59

许成钢 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 …… 69

许成钢 科学研究的目标：市场竞争还是认识世界 …… 81

田国强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96

陈志武 解读经济学在中国的现状 …… 137

张 军 走近“经济研究” …… 149

汪丁丁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及其现代危机 …… 157

汪丁丁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 …… 165

张五常 经济学的系统思维 …… 182

周其仁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 185

方汉明 美国经济学教育体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200

后记 …… 211

#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①]

杨小凯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

## 何谓经济分析框架

因为经济是一个由许多行为人、社会制度结构和自然环境的许多成分以及它（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所组成的大系统，所以我们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将概念组织成由子系统构成的结构。我们把这种组织结构称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在理论化的过程中，组织概念的方式有时比概念的形成更重要。例如，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组织成以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为基础的概念层系。这一分析结构不仅对由微观经济学产生的结论，而且对诸如需求、供给、企业、生产函数和禀赋约束等概念的含义都有深远的影响。

我们可以用组织程度、概念和演绎的严格程度、一般性程度、内生程度、内洽（internal consistency）程度、强壮程度以及可处理程度来刻画任何一个分析框架的特征。

一个具有组织良好的概念层系的框架（如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较之没有任何组织的结构和概念层系的框架（如大多数古典经济学框架），其组织程度更高。

任何经济都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只能用概念层系来分析。新古典

---

① 杨小凯教授不幸因病于2004年7月7日去世，本文节选自他与黄有光教授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玉纲译）一书，个别语句有改动。

微观经济学无力解释许多所谓宏观经济现象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层系，它包含更多描述现实的概念层系。然而，凯恩斯(1936)试图用一个没有概念层系的框架来解释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凯恩斯框架比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的组织程度低。新古典框架是将经济学组织成四层次概念层系的第一个框架。底层由对技术、偏好、禀赋初始分布、游戏规则[如瓦尔拉(Walras)制度中个别决策者不能操纵价格的规则]以及有关制度安排(如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预算约束)的规定组成。第二层由个人决策问题组成，他们将底层规定的环境映射到表示个人行为的需求和供给函数。第三层由个人行为及其相互作用造成的后果(均衡)所组成。顶层则由对这些后果的福利意义的分析组成。

德布鲁框架(1959)具有很高的严格程度和逻辑内洽程度，是组织得最好的框架。此框架中的所有概念、假设和公理都从数学上严格定义。此框架中的所有引理、定理和推论都以严格的数学为基础，而且相互内洽。

古典经济学，如斯密的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没有组织得当的框架。古典框架的严格程度和内洽程度都比较低。概念没有严格定义，而且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解释。这些框架只是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且不说这些框架没有概念分层结构，就拿这些理论来说，其中许多都是互不相容的，甚至是互相冲突的。例如，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就是与他的工人绝对贫困理论相抵触的。古典经济学中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概念定义模糊，因而可被任意解释。

在利用极复杂的系统——例如经济学——组织思想实验时，概念的分层结构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威廉姆森(1967)、克莱茵和莱维哈里(1979,1982)、杨小凯和霍格宾(1990)曾证明，管理的分层结构能提高复杂系统的管理效率。然而，分析框架中的概念层系与现实没有直接联系，它只是组织思想实验的工具。一方面，这意味着，在尚未判断哪一个最好之前，有无数种可能的概念层系需要考察。没有人能将他的框架与现实相等同，并声称它是现实的唯一表达。另一方面，层系的现实性不是评价其质量的唯一准则，因为需要在现实性与可处理性、现实性与模型的一般性，以及模型的现实性与其依赖于可处理性的预测能力之间进行权衡。

一般性程度是框架的另一个决定因素，如果某一框架的概念和特征只是另一个框架相应部分的特殊情况，则后者要比前者更具一般

性。组织程度可能与一般性程度有关。例如,一般均衡模型比局部均衡模型更具一般性,局部均衡模型又比决策模型更具一般性,而决策模型则比仅由状态方程组成的模型更具一般性。这是因为状态方程只是决策模型中的约束,而决策模型只是局部均衡模型的一部分,局部均衡模型又包含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

内生程度是框架的决定因素之一。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的结构有许多种。对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增长模型[哈罗德(1939),多马(1947)]来说,个人行为是外生的,因为人们的消费占收入比重在这个模型中是外生地给定的。对于管理决策模型来说,个人行为是内生的,但个人行为之间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生的。对于一般均衡模型来说,个人行为和个人行为间的互动都是内生的。

对于各种一般均衡模型来说,我们还有一些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的结构。对于德布鲁的均衡模型来说,资源配置(用于生产各种产品的资源的相对量)是内生的,但产品种数、企业结构以及专业化水平是外生的。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Dixit-Stiglitz)的均衡模型将资源配置连同产品种数一起内生化,但企业结构和专业化水平仍是外生的。杨小凯模型(1988,1990),杨小凯—博兰(Borland)模型(1991)、杨小凯—黄有光模型以及史鹤凌—杨小凯模型(1992)已将专业化水平、产品种数、交易效率、企业的出现以及商品和要素层系的层次数内生化。

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的结构取决于设定者,他可以按他的观点选择哪些变量或者哪些变量的值为内生的,而哪些变量是外生的。从一种框架可能得出的结果有时对这种结构非常敏感。

当经济学家将一种复杂的经济模型化时,设定行为人之间关系以及子系统之间关系的方式有无限多种。例如,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中,经济被划分为用生产函数表示的技术、用效用函数表示的偏好以及外生给定的禀赋约束。此外,行为人被划分为抽象的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经济学通常把这种结构视为给定的,只有少数人对它持批判态度。不过依然存在许多替代的结构。例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和禀赋的概念不能看作是互相独立的,因为技术上的某些改变可能改变可利用的禀赋[例如,电的发明对于可用技术和能源的影响,见王建国和罗马塞特(Wang and Roumasset,1992)]。另外,我们的研究证明,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之两分,人为地固定了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排除了经济组织问题,而且对此框架为基础的理论的预测能力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框架中的概念和子系统之间更重要的内部关系涉及如下问题:哪个假设对于以某个框架为基础的模型的可处理性是关键的?概念间或子系统间的哪种划分对于模型的现实性或预测能力是关键的?从一个模型得到的哪个结果对于哪个假设以及对于概念间、行为人间或子系统间的哪种关系是敏感的?哪个或哪组假设对于从某个模型得出的哪些推断是不可缺少的?这样一些内部关系对于我们理解一个模型以及采用的技巧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从一个框架得出的结果对于假设的敏感性与一种理论的强壮程度有关。如果一种以某个框架为基础的理论对于该框架的假设或组织结构上的轻微改变不敏感,则此理论是强壮的。

在这里,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将证明这个假设对于边际学说之得以成立是关键的,而且它对于以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为基础的理论的可处理性以及现实性和预测能力有重要影响。这就是说,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中产生的理论对于这个貌似平凡的假设是极为敏感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在这个方面不够强壮。

## 对框架质量的评价

评价框架质量的标准有许多。一个标准是框架的组织程度越高,则框架的质量越高。根据这个标准,新古典框架是组织程度最高的框架之一。

虽然对于新古典概念层系的每一层次都有许多批评,但对这个层系本身却几乎从未提出过认真的挑战。有些经济学家,例如,信息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倡导者,曾建议这个层系的底层应该增添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加以扩充。另一些经济学家曾批评第二概念层次的结构,认为个人行为的特征是常规、模仿或其他直觉决策规则而不是某个目标函数的完全最优化。纳尔逊(Nelson,1982)和其他支持进化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所表述的这种批评意见指出,如果最优化计算的费用高得令人却步,则个人决策可能成为某种常规和模仿。然而,这只是对个人决策问题附加更多约束的提议,而不是对体现人类行为特征的最优化概念提出真正的质疑。借助对策论来重构微观经济学以及专门研究激励机制设计的经济学家,曾批评新古典概念层系中第三层次上的瓦尔拉均衡概念。这些批评又一次把我们引向均衡概念和

支配个人行为间相互作用的游戏规则的一般化。而不是对概念层系本身提出挑战。

科斯(1991)和威廉姆森(1975)对生产函数的古典概念表示异议,他们认为这个概念与对组织的研究毫不相干。我们则对新古典的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提出诘问。我们将采用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框架。我们将证明,对框架作这样的改变对于所能得到的结果将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不过,我们欣赏生产函数的概念,尽管我们认为生产函数系统和禀赋约束应该用于描述生产力(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技术本身(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关系)。

评价框架的第二个标准是概念和演绎的严格程度以及逻辑内洽程度。德布鲁框架的高度严格和逻辑可靠性对于统一的经济学词汇的形成贡献至大,同时它也提高了对争议问题的辩论效率。它使得经济学家得以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有所建树,同时通过分工加速知识的累积性获取。除此之外,严格程度和逻辑内洽性的提高,还能提高交流效率,从而促进几代经济学家间以及经济学子专业间的分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严格程度和逻辑内洽程度越高的框架越好。

评价框架质量的另一标准是设定较具一般性的模型优于设定较为特殊的模型。根据这一标准,以对策论为基础的经济模型要优于瓦尔拉模型,因为就所涉及的游戏规则的一般性而言,瓦尔拉制度环境设定的游戏规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一般对策模型可能包含远为普遍的游戏规则。然而,一般对策模型要比瓦尔拉模型难处理得多。因此,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在游戏规则的一般性与模型的其他方面的一般性以及(或)模型的可处理性之间进行权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策模型的一般性,在所涉及的游戏规则方面,要比瓦尔拉模型强得多,但在生产和消费结构的设定方面却远不及瓦尔拉模型。

许多以对策论为基础的经济模型都没有设定一个复杂的具有多种商品的效用和生产函数系统。有些对策模型是只包含一种商品的局部均衡模型。有些以对策论为基础的经济模型根本没有设定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它们只是设定一个极原始的结构,它只有一种商品和若干参数,它们表示该商品对于各局中人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布鲁框架要比大多数以对策论为基础的经济模型更具一般性,尽管后一类经济模型设定的游戏规则要比德布鲁的价格制定行为更具一般性。

由于经济学是一个难以处理的大系统，因此，不可能找到一个在一切方面都比其他所有框架更具一般性的框架。模型在某一方面的一般性程度的提高通常引起它在其他方面的一般性程度的下降。这种此长彼消的关系使得框架质量的评价变成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

评价框架质量的另一个可能的标准是，被内生化的变量较多的框架质量较好。根据这一标准，时间之外的其他所有变量均为内生的动态均衡模型要比具有若干外生变量或参数的模型为优。

然而，在模型的内生程度与可处理性之间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精致的动态一般均衡型可以用时间来说明一切变量，但它既无法求解，又无法定性地描述，因此，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

虽然可处理程度也是评价框架质量的一项重要标准，但在框架的可处理程度与其现实性程度之间存在某种两难局面。某些特定的假定和人为的设定对于保证某个模型的可处理性往往是十分关键的。一般而言，降低现实性以实现可处理性通常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权宜之计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当数学工具对于保证可处理性而言还不够精致时，还是必需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明确提醒读者和学生了解，采用这种权宜之计所得的结果可能是敏感的。当处理角点解的方法尚未发现时，为保证新古典微观经济模型的可处理性而人为地采用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之两分的手法，正是说明这一点的好的例证。我们的研究证明，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产生的种种理论对于这一貌似平凡的手法是极其敏感的。

因此，强壮程度是评价框架质量的又一标准。从一个好的框架得出的结论，对于框架中为此结论所必需的假设和组织结构的小变动，应该是不敏感的。

模型的可处理性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家可用和掌握的数学工具。一个较为贴近实际的经济模型在数学方面通常较为复杂。较具一般性的模型往往适用范围比较宽，但需要较复杂的数学工具来处理。例如，德布鲁模型非常一般，因此，需要用到拓扑学。拓扑学中抽象的不动点定理很难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找到用武之地。但不动点定理却是德布鲁框架所必需的工具。

德布鲁(1991)认为当数学被广泛运用时，框架的一般性与简朴性(它对可处理性有益)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这种关系是否普遍存在还值得怀疑，因为不难找到反例。没有人会否定，运用不动点理

论证明德布鲁框架中的均衡存在,要比证明特定的过量需求函数线性系统中的均衡存在复杂得多,尽管有这个反例,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数学能为给定的分析框架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或最有效率的逻辑链。不仅如此,数学还可能为将一个或一组粗略的设想转化成一个具有高度严密性、可处理性和内洽性的框架提供最简捷和最有效率的手段。

正如德布鲁(1991)所说,在框架的一般性程度、抽象程度以及适用性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不过,我们不能将抽象程度作为一条独立的质量评价标准,因为抽象可能与框架的质量无关。某个框架的抽象程度高却可能伴之以一般性程度和现实性程度低。我们要考察所讨论框架的一般性和现实性程度,才能断定哪样的抽象是适合的。

框架的组织程度、严格程度和一般性程度受其数学复杂程度影响极大。因此,德布鲁(1991)把数学复杂程度作为衡量框架质量和经济学家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提供某种因果关系,或是为了解释我们观察到的东西,或是为了评估我们决策的影响。我们可以用某种比较静态分析来推测这些因果关系,比较静态分析有三种:状态方程比较静态分析,个人决策比较静态分析和均衡比较静态分析。这三种比较静态分析的一般性依次递增。

由于静态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或动态模型的比较动态分析对于模型的预测能力十分重要,因此,用于比较静态分析或比较动态分析的数学对于框架的可处理性也十分重要。模型越具有一般性且(或)越现实,处理其比较静态分析或比较动态分析所需的数学就越复杂。新古典框架内需求系统的比较静态分析可以无需以显式设定函数形式,而只用导数和矩阵的概念来处理。德布鲁框架内需求系统的比较静态分析是经济学家所掌握的和可用的任何数学都无法对付的,因为德布鲁框架中的需求函数可能不是一一对应的。新古典框架内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在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没有以显式设定的情况下,通常是无法处理的,因为一般均衡的一般性远在产生需求函数的个人决策之上。德布鲁框架中的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是经济学家所知的任何数学都不可能解决的。

另一方面,一个不现实的简化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却不难做,而且容易求出解析解。但对于较为现实的模型,计算机数值模拟可能是必需的处理手段。实际上,大多数比较合乎现实的一般均衡模型只能

用数值模拟来处理。当我们涉猎各种经济模型时，总是遇到在可处理性、一般性与现实性方面互有得失的许多例子。精致的计算机软件的迅速发展提高了我们运用数值模拟来处理模型的能力，同时使我们权衡得失作出取舍时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无论如何，由框架产生的理论的预测能力是评价框架质量的一个标准。由于经济过于复杂，难以用单独一个模型完全描述，因此，建立了许多经济模型以适应对经济的某些特殊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可能看到，某个模型在预测某种经济现象时要比另一个模型更有力，而对于另一种经济现象，情况正相反。就理论研究而言，我们可以接受的标准是，能够同时预测的经济现象越多，其模型越好；如果一个模型能预测另一个模型所能预测的全部经济现象，而且还能预测后者不能预测的某个经济现象，则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前者优于后者。

预测能力的标准往往与其他标准相冲突，我们可能要在预测能力与一般性程度之间，在预测能力与内生程度之间权衡得失，决定取舍。许多经济现象要用一般均衡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来预测，而比较静态分析的可处理性往往以函数形式的显式设定为条件。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可用于范围极广的函数族类。但这种一般性是以预测能力为代价的。举个例来说，无法作出德布鲁模型内瓦尔拉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因此，它就无法用来预测结构变化。

然而，德布鲁框架的高度一般性对于理论研究价值巨大。例如，瓦尔拉均衡存在定理具有永恒的理论研究价值。对于德布鲁一般框架中的一大类模型，这一存在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而这正是可以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的前提。

就一种以某一框架为基础的理论的推断而言，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是评价质量的更深一层的标准。不过，一种进行经验观测理论，其统计意义可能远不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么重要。许多模型的设计都是用来迎合统计数据的，但是这些数据所依据的概念可能包含它们的发明者带来的某种致命的思想缺陷。例如，资本的概念是从经济组织的许多错综复杂的方面抽象出来的。这个抽象是在可处理性和现实性之间权衡取舍的结果。这种取舍是否得当，取决于我们能收集到的数据种类以及我们可用的与掌握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机软、硬件的复杂程度。例如，扬格（Alwyn Young，1928）就不曾采用资本的概念。作为替代，他采用“生产迂回性”和“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分工”这两个概念。在他看来，资本是生产迂回程度的一个结果，而生产迂回程

度是以迂回生产活动中的分工程度为基础的。扬关于“资本”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思想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了。因为要收集生产迂回程度和分工水平的数据要比收集“资本”的数据困难得多。因此,当新的计算机技术为收集迂回生产活动中分工水平的数据提供了方便得多的工具时,连“资本”这个概念本身的质量都成了疑问,以至于当我们在经济分析的技术条件改变时找到一个新的高质量的概念框架之前,以“资本”概念为基础的理论的统计意义并没有太多价值。

由于对现实性和可处理性或者对一般性和可处理性的权衡取舍,许多模型是为某个特定问题而设计的,它们有意回避其他一些问题。某些观测与这样一些模型之间的一致性可能伴之以其他观测与这些模型之间的不一致。因此,理论的质量是一个难题,它要比经验观测与由理论产生的推断之间的一致性复杂得多。

至此,我们已提出了范围广泛的评价标准:组织程度、一般性程度、内生程度、可处理性程度、预测能力、严格程度、逻辑内洽性程度、可验证性以及强壮程度。要找到一个在所有这些标准方面都优于其他框架的框架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我们要用各种标准来衡量,在框架质量的各个方面多次进行权衡取舍①。

不能单用一条标准来评价各种框架和模型的质量。我们不得不设定某个目标函数,它从各项标准的其他方面来弥补其某一方面的缺陷。但要在经济学家之间就各种框架的评价达成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大家都能接受的目标函数中的权重系统。在本书②中我们根据上述标准中的若干项,将我们的框架与其他经济分析框架进行比较。上面的讨论意味着,将经济学的规范方面与它的实证方面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为实证分析选择概念的分析框架必定包含有经济学家对框架质量的价值判断(对各种评价标准所加的权重以经济学

---

① 这里列出的标准还不能认为是完全的。例如,斯蒂格里茨(1986a)认为理论的完备性程度应是评价理论质量的一个标准。按照他的定义,完备性意味着该模型的假设应尽可能的“原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宏观经济学中一种用工资刚性来解释失业的理论就是不完备的:它没有解释为什么工资是刚性的。完备性程度的概念与我们的内生程度概念有关。此外,斯蒂格里茨还认为,解释给定现象所需的假设越少和(或)越弱的模型越好,这就是奥卡姆(Occam)剃刀原则。

② 指《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编者注。

家对框架质量的价值判断为基础)[①]。如果经济分析的不可回避的规范本质得到承认,而不再坚持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割裂,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更加客观和科学的学科。被实证分析与价值判断能完全分割的观点所误导的人会变得对经济学思想中可能的缺陷和不足不敏感,而人们理解和感知这种缺陷和不足的敏感性正是经济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个框架的各个方面(函数形式、游戏规则、概念和子系统的分层结构、行为人与子系统间关系的结构、外生和内生变量的结构等等)的不同组合产生出许多可能的框架。与可能框架的多姿多彩相比,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框架种类对于有意义地评价所有可能框架的质量来说实在太贫乏了。对策论取向的微观经济学框架以及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对贸易及增长理论再思考的新进展使微观经济学框架的种类显著增加了。

① 不过这种判断可能是以对事实的主观判断而不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见黄有光(1972)对这种区别的讨论。

#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①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995 年 10 月我应贵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之约，撰稿庆祝《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发表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短文，倡言以规范化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并断言若能如此，本土经济问题的研究不仅可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做出贡献，而且，也可登上世界经济科学的殿堂。该文发表至今，转眼五年，有幸承蒙贵所再度邀约，来谈我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看法。借此机会，不揣浅薄，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将我近年来的若干心得体会再次提出来和各位同仁进一步探讨。

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中，我也宣扬 21 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个想法是基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的特性而推论，并根据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从原来的英国转移到现在的美国的现象观察而得来的。

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

---

① 本文系根据作者于 2000 年 8 月 4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作学术讲演记录，同时，参考了 2000 年 7 月 18 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届“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上的报告整理而成。在整理这篇文章时，胡书东博士提供了不少协助。定稿时间为 2001 年 2 月 22 日。

家,他们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了解经济理论发展史的学者都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当地人,就是旅居英国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原因就在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20世纪最后二十年GDP年均增长率居于世界首位。现在国内国外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最迟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我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时,有近水楼台之便,可以预期,当我国的经济在21世纪变成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时,我们也有可能迎来中国籍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只是为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提供了机会,要把可能变成现实,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还必须做出非常自觉的努力。除了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外,我今天想再就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其他几个方法论的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

## 内部逻辑的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但是研究本土经济问题本身还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在国外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必须遵守一定的写作规范。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对稿件应请专家匿名审稿。这些"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然而,我国的经济学家要想对世界经济理论发展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遵循理论创新的规范。

只有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才能对学术思潮的发展做出贡献。

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我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系在教学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研究者在写论文时，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这样的观点、主张对推进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可能贡献不小，也常被冠以理论之名，但和对经济学科的发展能够做出贡献的理论，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推论必须合乎严格的形式逻辑的规范，数学模型是最严格的形式逻辑，能将逻辑分析数学模型化最好，这是国际上经济学科发展的一个趋势；如不能，至少在分析问题时，对什么是大前提、小前提，什么是假设，什么是推论也应该有明确的表述。

其次，经济学家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内部一致的逻辑体系，并非是为了玩逻辑游戏，而是要解释经济现象。因此，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的，这个理论暂时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摒弃。对于这一点，我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要特别给予重视。一方面，学习国外现有的理论是需要的，但是，不管是哪个名家的理论，只有他的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相一致时，这个理论才是可以暂时接受来解释我国经济现象的理论。如果发现理论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不一致，要坚持的不是现有的理论，而是进一步去了解我国的经验现象，然后，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所以，当发现这种不一致时，不要死抱理论，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也不要在巨人的面前而感到自己的渺小，其实，这正是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绝好机会。其次，和外国的经济学家相比，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通常数学较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而且，利用数学模型来做逻辑推论在国际经济学界是一个潮流，因此，我国的年轻经济学者容易以为数学模型就是经济学理论，以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自得，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如果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

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甚为盛行，由于所要处理的是规模报酬递增的问题，因此，所使用的数学必须相当复杂，但是，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所以引起重视不在于它复杂的数学模型，而在于它解释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为什么没有像古典增长理论所推论的那样收敛，而是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经济现象。这几年，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已有些过时，其原因则在于这个理论的许多推论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证实。其实，在世界上第一流的经济学期刊上，纯数理模型的文章是少数，以《美国经济评论》为例，在2000年共出6期，不计第2期年会文集以及各期中的短文，总共发表了48篇论文，一点数据分析都没有的纯数学模型的论文仅有17篇。

此外，一个理论是几个重要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因此，当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的时候，通常也可以通过不同变量的选择组合，而同时形成几个内部逻辑严谨并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若干个其他理论。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经验事实为例，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以发达国家的教育、R&D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具有规模报酬递增，而R&D等又多发生在发达国家来解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可以比不重视这方面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快而使收入差距扩大。但是，我和蔡昉、李周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同样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一国的收入水平决定于其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则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以，要提高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的提高指的是人均资本量的提高，资本来自于经济剩余的积累，按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结构，可以使一个经济最有竞争力，能创造最多的剩余。除了剩余的大小，资本的积累还决定于积累率的高低，积累率的高低则决定于资本积累回报率的高低，后者则视技术创新的速度而定。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只能来自自己的R&D，投入大而成功的概率低，发展中国家如果按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其技术创新绝大多数可以来自国外现成技术的引进，成本远低于自己由R&D来获得，所以技术的创新可以远快于发达国家，资本的回报率、积累率也可以远高于发达国家。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剩余大、积累率高，要素禀赋结构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将逐渐缩小，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也就会收敛。反之，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按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发展的产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

力，获利能力低，缺乏自生能力[①]，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的提升也就慢。而且，为了建立没有自生能力的优先发展产业，国家只好以扭曲价格、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护这些产业，所以经济运行的效率很低，和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的差距也就会越来越大。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了解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决定作用，而以为发展和不发展是技术水平决定的，把发展的目标定位在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上，结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发展在技术上水平较高但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事与愿违。我们提出的这套理论同样可以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的现象，提供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解释[②]。所以，当我们看到现有的理论和我们观察到的经验现象一致时，即使这个理论是名家提出的，也不能就此满足，而应该进一步想想是否还有其他同样是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不管是现成的还是自己提出的——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

当有好几个理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一致的，这些理论可以是互补的，亦即这些理论所强调的原因可以同时存在，而不相互矛盾。这些理论也可以是相互竞争的，也就是这些理论中接受了一个，就要排斥另外的。那么，在竞争性的理论中该接受哪个理论呢？而在互补性的理论中，也不是每个理论都成立的。通常当有许多理论都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时，我们可以从各个理论中分别得出许多不同的推论，一个理论只有当它所有的推论都不被经验事实所证伪时，才能不被修正或抛弃。

同样以上述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为例，按内生性增长理论，一个发展中国家除非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比发达国家投入更大比例的资金，否则无法赶上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亚洲四条小龙赶上或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它们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R&D、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仍不及发达国家，因此，用人力资本投资来说明为何发达国家能够继续增长则可，但这个理论

---

① 有关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的讨论，详见 Justin Yifu Lin and Guofu Tan,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9, No. 2(May 1999), pp. 426-431.

② 详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年，第四章。

无法说明为何有些发展中国家赶上了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了。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我们提出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赶上发达国家决定于是否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理论应该比内生性增长理论更有说服力。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中国 1959—1961 年农业大危机原因的争论。传统比较流行的理论有三种,一是天灾说;一是人祸说,即认为公共食堂及其管理不善是造成大危机和大饥荒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人民公社规模过大,"五风"盛行,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上述三种理论,从逻辑上来说都能导致农业危机的产生。我则提出了另外一个理论假说,认为这场农业危机导因于合作化运动从自愿转变为强制,农民的退出权被剥夺,使得"搭便车"成为不可遏制的行为,劳动积极性随之瓦解。何者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传统理论的一个共同逻辑推论是,如果天灾结束,气候条件恢复正常,或者如果公共食堂解散,如果人民公社规模缩小,农业生产效率就能够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退出权理论则预测在强制性的农业合作社中其效率将低于在个体农场中。国内外的研究表明,1959—1961 年农业大危机以后,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从未恢复到农业大危机前的水平,虽然这段时间天灾结束了,公共食堂解散了,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五风"得以纠正,农业生产实际上划小为以生产队和大队为核算单位。到目前为止,我的这一理论在内部逻辑上是一致的,内部逻辑与经验事实也是一致的,没有被证伪[①]。

## 理论假设的一致性

内部逻辑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一致是任何学科理论发展的共同要求。而经济学所以不同于其他同样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则在于其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科的基本假设,即理性人的假设[②]。一个

---

① Lin, Justin Yifu.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December 1990): 1228-1252. 中文译文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年。

② 参见 Gary. S. Becker(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学科甚或一个学派所以成其为学科和学派，是因为一些假设为这个学科或学派的各个学者所共同接受，并作为他们理论研究的共同出发点。现代经济学在国外有各种不同流派之分，如凯恩斯学派、芝加哥的货币学派、新制度学派，等等，这些流派都属于现代经济学的范畴，即在于他们都以理性人为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经济理性的含义是，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就各种可能选择中，做出最有利于其目标实现的选择。所谓经济理论其实也就是理性的人在某种限制条件下（也就是因），做出了最佳的选择而产生了这个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也就是果）。所谓最佳的选择不局限于收入的最大化或利润的最大化，一般经济学家讲的是效用的最大化。在效用函数中收入、风险、休闲、名誉等都可包括在内，而且在这些目标间可以有一定的替代。一个革命志士，可以为革命目标抛头颅、洒热血，但在可以达成同样的目标而不必牺牲性命时，以较小的代价保住生命即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有许多现象似乎和理性人的假设不一致，一般人常会因此而质疑这个假设，甚至想以其他假设替代理性人假设。但是放弃理性人假设的结果是发展出来的理论无法纳入经济学理论的主流体系。而且，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过去国外的学者经常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保守的、不理性的，证据是在殖民地国家的农民经常拒绝接受殖民者所带来的先进技术，而这种技术可以增加产量。我的恩师舒尔茨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理论，改变了经济学界对农民是不理性的看法①。先进的技术通常预期产量高，但要求的天候、温度、湿度、肥料等条件也较严，合乎这些条件，产量会远比传统品种高出许多，而不符合这些要求，也可能颗粒无收。传统的品种，产量低，但一般旱涝保收。在落后的地区产量高时，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产品很可能运不出去而“谷贱伤农”，丰产不丰收，而当减产时，则又难于从其他地方运来粮食。在这种情况下，种旱涝保收的低产品种正是传统社会农民在预期收入和风险之间做了最佳选择的理性行为。

经济学家之所以坚持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是从这个假设为基本

---

① 参见 T. W. Schultz,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reprinted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3.

点出发，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而不能简单把我们所难以了解的现象贴上不理性的标签。而坚持这个假设也给经济学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我们在研究问题时，发现了某些似乎是不合乎理性的现象时，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当事人不理性，而只是我们对当事人在做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了解，对所研究的经验事实还未吃透，所以，要求我们进一步去了解产生这个现象的各种条件。

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这个学科中所有的学者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同样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于前后一致。假设的一致性要求学者不能随便行事，熟悉数学模型的人都知道，只要改变前提条件，那么，数学模型可以得出你所想要的任何结论。一个学者，在研究同类问题时，坚持前后一贯的基本假设，这样研究才能更深入，研究出来的各种成果也才能累加成一个体系。

## 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

在人是理性的前提既定之下，所谓经济理论无非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在给定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以达到其目标的最大化，而选择的结果正好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包括在这个模型中的给定条件是否合适。所以要构建一个理论时，首先要了解限制当事人的选择的给定条件是什么。

我和蔡昉、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对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解释。过去总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学习苏联经验来解释我国传统计划体制的形成。我们则从政府当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资金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我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经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替代解释。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一般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我国当时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资本非常稀缺，如果由市场决定，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无法投资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

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经济落后还使主要经济剩余只能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少而分散，不容易聚集，靠市场无法动员资金投资建设规模大的项目。认清了重工业的三个特性和落后经济的三个特征（决策者的约束条件）及两者的尖锐矛盾之后，可以导出为了实现政府决策者的目标，仅能用计划替代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传统的计划体制尽管效率很低，但从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来看，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它的存在是由要素禀赋和发展目标的矛盾决定的，而不在于我国的社会性质，学习苏联的经验则是因为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和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时面临的矛盾相同。从我们这个理论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何社会性质不同的印度、拉美国家也和我们有非常类似的计划体制，因为他们的政府和我国一样，想在资金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优先发展资金相对密集的产业。

其次，理论是一个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模型并不是越复杂越好，而要尽可能地简化，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少。要用很少的给定条件，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一般学者容易采用带有很强的“模型特定性”（Model Specific）和“问题特定性”（Problem Specific）的条件。但如果条件是模型特定的或问题特定的，这种理论能运用的范围就很局限，用社会性质来解释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存在，就属于问题特定的条件，因此，由此产生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性质和我们绝然不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和我们非常类似的计划体制。由于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要有尽可能强的“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有更大的解释范围，要达到这个目标，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就要有一般性。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既能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

由于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模型要尽可能地简单，不仅要求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少，而且，不能苛求限制条件完全吻合于现实。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最为经典的论文是弗里德曼撰写的“实证经济学

方法论"①。在该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假设条件不相关"命题,其含义是,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现象。对于理论的取舍以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即理论是否能解释和预测现象为依据,而不能以理论的假设是否正确为依据。例如,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著名的"要素价格趋同理论",按此理论,如果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贸易摩擦和交易成本,则通过货物贸易,两国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价格将会趋同。显然,不存在完全自由、没有摩擦和交易成本的贸易,但不能以此来否定这个理论。是否接受这个理论,依据开放贸易以后两国的工资和利率水平的差距是否缩小而定。理论和地图一样,是信息节约的工具,只要能说明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可。因此,要舍弃掉一些无关紧要的条件,仅保留最重要的条件,否则,理论丝毫没有节约信息,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当然,保留在理论中的假设条件也不能过于偏离现实。过于偏离现实,理论将失掉对现象的解释力。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s)应该是"易于处理的"(Managable)和"现实的"(Realistic)。而科斯本人也正是通过松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才做出在新制度经济学上的开创性贡献的。我个人对合作农场中劳动者积极性的研究也是从放弃 Amartya Sen 著名的 1966 年论文中完全监督的假设②,而取得和经验现象一致的合作农场中劳动者积极性较家庭农场中积极性低的理论推论。

理论必须有高度的抽象,而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前提条件又不能太过偏离现实,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但什么是不过于偏离现实,例如,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什么条件下交易费用必须作为主要的条件,则又视问题的特性而定,这并无简单的规则可以遵循。理论构建近乎艺术,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于好的经济学家能把握住重要的、一般的、简化的但又不偏离现实太远的条件于他的理论中。在这点上,我国经济学研究者必须多下点苦工夫,在平时读经典文献时,不只是去了解观点,而是去体会大师们如何观察现象、提出问题、选择给定条件等。所谓,"外行看热

---

① Friedman, Milt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② Sen, Amartya K., "Labor Allocation in a Cooperative Enterpris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33, October 1966, 361-371.

闹，内行看门道”。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在读经典文献时，如果只关心观点而不从方法论上去揣摩，则只能说是看热闹。另外，在研究问题时，一方面要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特性，另一方面要有比较宽的视野。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以下的“一分析，三归纳”方法，也许对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在寻找最重要、最一般的限制条件来建构理论模型时有参考价值。

### ☞ 本质特性分析法

在分析一个现象时，首先想清楚谁是这个现象中的主要决策者，他的目标是什么，目标的特性为何，他所处的环境又有哪些特性等问题。例如，蔡昉、李周和我在提出计划体制的形成理论时，就是从作为决策者的政府，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重工业的三个特性和我国资金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的特性冲突而演绎出来的。我在研究合作农场的激励机制问题时，则从农业生产空间分布大、时间长的特性，知道农业劳动投入监督不易，而放弃了 Sen 的完全监督，加入监督程度和监督成本于模型中。最近，我在研究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的问题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发展中小银行的理论，则是从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动员资金和分配资金，而能动员的资金决定于资金分配的效率，以及在资金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发展中国家，资金使用效率最高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中小企业，而股市直接融资固定成本高，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规模小等特性演绎得来①。在这儿我有一个心得，要特别提醒诸位注意，在分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时，要特别给予要素禀赋结构足够的重视。在主流经济分析时，通常只有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才会讨论到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但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在做任何与发展有关的技术和产业选择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给定条件。中国在改革前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大多和忽视了我国的要素禀赋的特性有关。

### ☞ 当代横向归纳法

在研究某一时某一地的一个现象时，同时去了解这个现象到底是

---

① 林毅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收于海闻、卢锋主编《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汇编 1995—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此时此地唯一的，还是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对计划体制产生原因的研究，如果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用社会性质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逻辑上也是严谨的。但当我们看到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计划体制时，那么，应该可以知道计划体制的产生有比社会性质更为一般的原因。

### ☞ 历史纵向归纳法

《大学》上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了解了一个现象的演变发展过程，大概也就知道了它产生的原因。同样以计划体制为例，苏联刚建国时并无此体制，而是在1929年斯大林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之后才形成的。由于体制的变化是伴随着发展战略的变化，因此，计划体制产生的原因应该和战略有关。

### ☞ 多现象综合归纳法

将一时一地同时发生的多个现象综合分析，归纳出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发生的现象。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差的原因时，国际贸易学者常从发展中国家采用的是进口替代的战略来分析，而金融学者则从金融抑制的现象来分析。但进口替代和金融抑制一般是同时存在的，如果能将这两个现象同时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在资金相对稀缺的状况下追求资金密集的产业优先发展，是为了让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能够生存的必要制度安排。所以，要素禀赋和发展战略是比进口替代和金融抑制更为一般的条件。

以上的"一分析，三归纳"虽然分开来解释，但在运用中实际上是反复交替的思维过程。从本质特性演绎来的理论推论必须随时对照于归纳来的现象特性。从现象归纳来的特性，也必须经由演绎来重构因果之间的逻辑体系才成为理论。

## 实证检验

理论分析只能说明在理论所阐述的逻辑机理中，因（给定的条件）对果（所要解释的现象）的产生是有正的还是负的影响，但无法说明这个影响的量有多大。是否真的有影响，以及影响有多大，只能从经验

实证中才能获知。理论既然是用来解释现象的，理论就必须不断地接受经验现象的检验。只有不被经验现象证伪[①]的理论才能被暂时接受为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只有在经验验证中，确认为有相当大影响的理论，才可接受为在诸多可能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中，不是一个无关紧要(trivial)的理论。作为一个有志发展理论的经济学者，不能仅满足于逻辑的完美，而必须不断用经验事实来检验他所发展出来的理论。

计量检验是经济学中经验实证的一个主要方法。需要注意的是，理论模型为了简化起见，通常把给定的条件尽量简化，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所要解释的现象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在做计量检验时则必须将其他可能影响的因素尽可能地考虑进来，以便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分离出理论模型所重点考察的因素的影响。例如研究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时，在理论模型中消费是消费者根据给定的收入条件和一定的相对价格所作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结果。然而，消费行为除了受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影响外，还可能受不包括在理论模型中的消费者受教育水平、年龄、性别的影响。在根据家计经验资料做回归分析时，教育、年龄和性别等因素都要包括在内。而且，消费者收入水平显然也受教育水平、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收入在理论模型中是作为给定的条件，而在回归模型中则需要被看作是内生的变量，使用二阶最小二乘法或其他计量方法来处理。

国内经济学者一般善于写文章阐述观点，而不乐意做经验实证的工作，有的人还误以为经验实证是数量经济学的事，将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不适当地割裂开来。实际上，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养成经验实证的习惯是培养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一个重要方法。当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时，要养成不断将所学理论和自己所知的经验事实对照的习惯。自己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时也要不断地寻找更多的经验现象来检验这个理论的习惯。从这种理论和经验的不断对照中，去寻找理论创新的机会，也从这种不断对照中去深入了解现象，寻找更深层、更一般的理论。

---

① 所谓证伪，指的是经验实证发现实际的影响和理论预期的影响相反。

## 结 束 语

作为一个热衷于教育新一代经济学家的工作者，我将自己的一点心得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希望有志者能够少走弯路。由于谈的是自己的体会，报告中难免有许多“王婆卖瓜”的地方，还请多包涵。改革、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舞台的提升，给了我国经济学工作者许多可对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题材，目前我们较欠缺的只是规范方法的普及和运用，《经济研究》作为我国经济学龙头刊物，在推动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方面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作为一个热切期盼中国经济学研究走向世界经济学殿堂的工作者，我呼吁大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为迎来21世纪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共同努力。

## 参 考 文 献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

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祝贺创刊40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林毅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收于海闻、卢锋主编《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汇编1995—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Becker, Gary S.,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 1937, (4), 386-405; Reprinted in G. J. Stigler and K. Boulding, eds., *Readings in Price Theory*, Homewood 1952, 331-351.

Friedman, Milt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Lin, Justin Yifu,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6, December 1990, 1228-1252.

Lin, Justin Yifu,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March 1992, 34-51.

Justin Yifu Lin and Guofu Tan,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9, No. 2(May 1999), 426-431.

Schultz, T. 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reprinted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3.

Sen, Amartya K., "Labor Allocation in a Cooperative Enterpris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33, October 1966, 361-371.

#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
## ——林毅夫访谈

## 经济学教育现状与瓶颈

**《21世纪》**：您对目前国内经济学教育体系的现状有何评价？

**林毅夫**：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起来，国内经济学教育的面貌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学，尤其是当代经济学，已经从被批判的对象变成各大学经济系教学的主要内容。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们学当代经济学的时候，老师在介绍完任何理论之后一定要加一段批判。后来，由于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过渡中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而这些问题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容易解释清楚，当代经济学就从被批判的对象变成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补充。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到了现在，当代经济学基本上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教育的主流，经济学科也成为大学里最受学生欢迎的学科之一。就具体的统计数据来说，我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每年招收的经济学双学位学生大约占北大本科生的19%，如果加上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的话，这个比例超过北大每年招收新生的1/3。

就教材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内基本没有当代经济学的教材，上课时用的是一些老师自己整理的、不成体系的笔记。现在，美国大学里用的最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而且，许多美国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一年左右就在国内出中文版，梁晶主持的《经济科学译丛》过去10年来对此变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留美经济学会也做了不少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国内大学里经济

学科的教材和美国大学里用的教材已经没有多大差距了。

就教师方面来讲,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直到 80 年代末基本上没有从西方学成回来的教师,而 50 年代之前归国的教授们到了 80 年代大多已经垂垂老矣。因此,改革开放之初,教当代经济学的老师,不是教学说史的,就是靠自学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转过来的,在师资力量上有一个断层。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风气之先,吸引一批留学生从国外回来,到现在大量经济学人才从国外成批引进,目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不是从国外回来人数最多的地方,像光华、清华、浙大、复旦、中大、南开等都有不少从国外学成归国的教师,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国内经济学教育体系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变化程度之大、之深。

**《21 世纪》:** 那么您认为经济学教育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制约目前国内经济学教育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林毅夫:**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宗旨为何。到底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还是为了了解社会、影响社会而研究、学习经济学。

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学从亚当·斯密于 1776 年发表《国富论》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来,一直是一门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小到影响个人的消费、投资、就业的选择,大到影响国家的政策为目的的致用科学,这从《国富论》的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可以得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以学院派的风格著称,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很少学而优则仕,但是,今年 6 月初,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教授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做"汇丰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讲座"时,有人问他,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是否只顾理论的完美而不顾理论是否有实用价值时,他回答说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包括弗里德曼、舒尔茨、斯蒂格勒、卢卡斯等和他本人,都是以了解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的后果,进而影响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为其研究目的的。

但是,任何当代经济学的理论观点都是根据一定理论模型的推论而来的,都是在表述一个决策者如何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做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是经济学家所要研究的现象。然而,经济学家由于个人的局限,不能保证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约束条件确实

是现实社会中决策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约束条件。而且，即使要解决的问题相同，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决策者来说，也可能是不同的。更何况就是同一个人，随着年龄的不同，约束条件也会随之变化。所以，在我看来，经济学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美国，由于近水楼台的原因，当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这些理论不见得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发展中国家。即使有些美、欧的经济学家致力于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问题的研究，但是由于对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主要约束条件没有切身的体验而把握不准，提出的理论经常是隔靴搔痒。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到了 70 年代经济发展都困难重重，难以为继。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转型时，根据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来制定政策的国家也都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几乎是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我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学教育的主要瓶颈在于教科书上谈的都是以外国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缺乏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有助于了解、解决中国现实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的理论和体系。由于缺乏这样的理论和体系使经济学的教育和现实脱节，以致有些学生甚至老师误认为经济学的教育是为了理论而理论，甚至把经济学的教育变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把当代经济学中针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而提出的理论意识形态化。

## 用规范方法研究本土问题

**《21 世纪》：** 那么，如何解决您所说的“瓶颈”问题？

**林毅夫：** 1995 年中心成立之初，我应《经济研究》庆祝创刊四十周年之约，写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文章，说明了我个人对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看法和努力的方向。

我认为经济学虽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般的。我同意 1992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的观点，经济学之所以异于其他社会学科，在于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方法，

经济学家总是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所谓“理性”,我个人的理解指的是:“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的时候,总会在他所可选择的范围内,做出他认为的最好的选择”。每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时,可选范围会因所处地位、所在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等约束条件的不同而异,因而,最佳的选择也可能不同。所谓经济学的理论,包括前沿的理论,其实只是决策者所要解决的问题、面临的重要约束和最佳选择的一种逻辑表述,是理性原则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既然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应该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且,只要经济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用严谨的、规范的方法来研究问题,研究的即使是本土问题,其成果和按照同样方法来研究发达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成果应该是等价的,都是对世界经济学殿堂的建设添砖加瓦的努力,都是帮助人们理解未知的经济现象、增加人们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知识,都是国际化的贡献。

这 11 年来,中心汇聚了一批了解中国实际,又受过当代经济学训练的学者,正沿着上述方向努力,以严谨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以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来教育、鼓励我们的学生。

**《21 世纪》**:*具体说来中心取得了哪些成果?*

**林毅夫**: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我和蔡昉、李周等合作者以及几位学生根据中国转型和发展提出的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基础,建立在发挥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为目标的经济发展观,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转型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基本上可以解释出现在我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外贸、金融、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扭曲背后的原因,也可以解释许多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收入分配不公、裙带资本主义的现象,以及渐进式的改革为何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有效的原因等。

另外,周其仁教授从产权的角度也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系统的阐述;卢锋教授从技术进步、交易费用降低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形式从原来的以产品单位为主,变化为产品内部的更细微的部件的贸易,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陈平教授从方法论的角度,结合现在的混沌理论对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同时我们的学生写的毕业论文,大多试图解释中国改革发展中凸

显的现实问题，比如预算软约束、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结果等，既有理论模型，也有实证检验。

当然，中心成立才11年，相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来说，中心的老师和学生的努力只是往前迈出了小小的一步，要完全克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瓶颈”，需要全国各个经济学教育科研单位和几代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

## 经济分析与数学工具之间

**《21世纪》：**有经济学家曾断言经济学正在走向数学的不归路。你如何看待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

**林毅夫：**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必须先厘清经济学研究的本末问题。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是先有看法，然后才有逻辑体系。事实上，在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受过经济学教育的学者都会知道，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对问题表象背后原因的直觉（Intuition），直觉按照《美国传统字典》的解释是“未经过理性的论证过程便能知道或感觉的行为或能力”。一个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是先对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有了直觉的判断，然后根据这个判断，再用比较严谨的逻辑来表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数学模型是逻辑表示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如果说只有懂得用数学构建模型才能成为经济学家，那么，远的像斯密、李嘉图，近的像哈耶克、科斯、诺斯等都称不上是经济学家？而且，靠数学模型是难以提出有用的理论的，因为只要约束条件不同，数学模型是可以推论出任何不同的结论的。

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经济直觉是本，数学工具是末。在经济学的教育上，不能舍本逐末，在强调数学工具的重要性时，更要强调经济直觉的重要性。一个人的经济直觉是对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以及经济学方法的总体把握和体悟而来的，文科的学生在直觉的培养上应该是有一定优势的，数学底子不厚的文科学生在学习经济学时不见得就吃亏，更何况绝大多数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并非得用数学模型才能阐述清楚，因此，即使数学不强的学生也有可能成为很好的经济学家。

**《21世纪》：**那数学为什么在现在的经济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

地位?

**林毅夫**:当然数学是最严谨的逻辑,除非是大师,一般人用语言逻辑不容易严谨,但是用数学模型一步一步去推,就比较不会出现逻辑的失误,并且即使有错误也比较容易被发现。例如,我们中心新来的霍德明教授就曾证明卢卡斯1980年代的一篇奠基性文章在数学逻辑上有一个错误。因此,数学的应用是经济学体系严谨化的一种努力和要求。

但为什么现在数学似乎有喧宾夺主之势?这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18、19世纪时在英国,到了1930年以后转移到美国,都是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2%,和发展绩效好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可以有9%、10%的增长速度相比,是一个相对稳态的社会,没有多少新的、大的经济社会现象,所以,在亚当·斯密等早期的大师对主要的经济现象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以后,就很少有大的经济社会现象可以研究,作为后来者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只能是研究一些小现象,提出小理论。或是在一个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在主要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作些注释性的、补充性的、小修小补的研究,这些研究如何来评价贡献呢?只好比技巧,而不是比对经济现象解释的贡献。

**《21世纪》**: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没有大问题去研究,所以只好在技术细节上斗法?

**林毅夫**:对。这也跟当代经济学科在西方高度发展有关系。现在,单单在美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就有5万多人,当中在大学教书的有1万多人,这1万多位经济学家每年都要发表论文,才能生存,才能晋级,可是哪有那么多现象可以研究?没那么多现象研究,就只好在技巧上下工夫。同时也因为有太多经济学家,比较好的大学要雇佣教授,根据什么作标准呢?数学就变成了一个门槛,不能用数学工具的人就进入不了这个门槛。这有点像俱乐部,要进入这个俱乐部需要跨过一个门槛,取得身份才能成为会员。

**《21世纪》**:中心在教学中对数学的侧重程度是怎样的?是怎么样处理数学的定位问题的?

**林毅夫**：当然作为学生最好是本末兼顾，数学是学得越多、掌握得越扎实越好，这样才容易跨过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槛。跨不过这个门槛，就不容易发表文章，就不容易被其他经济学家接受为同行。特别是，我们研究的是中国问题，而美国人对中国问题又不甚了解，不用数学模型就得不到人家的关注、承认。但我们也强调数学只是工具，要会用工具而不要被工具所限制，强调对问题的观察分析能力，强调经济学直觉的培养。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给学生上课时特别强调方法论，并将和学生有关方法论的对话编辑成册出版的原因。

## 中国问题就是前沿问题

**《21 世纪》**：什么才是经济学中的前沿问题？

**林毅夫**：经济学科的前沿问题和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前沿是不同的，物理学、化学的理论发展通常是直线式前进的，新的研究成果通常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其为出发点，再往前走出一步。但是，经济学不是这样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经常是在不断否定前人提出的理论，而不是以前人提出的理论作基础前进的。

比如说发展经济学，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应该会收敛，所有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最后都等同于人口增长率。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论来自于所有国家所用的技术是外生给定的，而且是相同的假定，按照这个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来自于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差异。新增长理论保留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所有国家所用的技术是相同的假定，但是放弃了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假定，认为技术是内生的，是投资的结果。

为什么新古典增长理论被放弃掉，因为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并没有像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收敛，而是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其人口增长率。新增长理论并不是建立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的，而是改变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前提、假设。按新增长理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因为发达国家对技术创新不断进行投资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的投入上低于发达国家造成的。

新增长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曾盛行一时，但是，它不能解释东亚经济在技术创新的投资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情形下，经济增长速度却远高于发达国家，取得了缩小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差距，甚至赶上发达国家的事实。现在发展经济学的前沿，像哈佛、MIT的Acemoglu等人，转而研究那些决定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绩效的最外生的变量，例如，三四百年前，美洲开始殖民时，中南美洲和北美洲的气候和死亡率的差异等如何影响到现在的经济增长。

再比如宏观经济理论。我在今年5月份到韩国参加了一个庆祝韩国银行成立55周年的国际会议，讨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的最近进展。我主要研究的是发展、转型和农业问题，对宏观理论并不熟悉，在会上我发现20世纪80年代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的最前沿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许多结论不是被放弃，就是被修正了，现在盛行的是新兴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否定了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政府财政政策是有效的，以及菲利浦曲线所认为的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替代关系的结论。凯恩斯主义和菲利浦曲线理论被理性预期理论所取代是因为无法解释在70年代出现的滞胀的现象，而理性预期理论所以被修正则是因为无法解释各国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反经济周期有明显影响的事实。

总而言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经常是建立在否定前人的理论，而不单是建立在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前进的。旧的理论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它解释不了新出现的现象。新的现象的出现就呼唤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大多数是以推倒重来的方式，从新的假设条件出发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阐述新的因果关系。

**《21世纪》：** 那今天的经济学前沿问题在哪里？

**林毅夫：**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最前沿的经济学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根据这些新现象的研究提出的理论，就是新的、前沿的理论，并不是只有美国著名大学里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才是前沿的问题。当然，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还在美国，所以，美国著名大学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容易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

其实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千载难逢的机遇。研读经济学的多属当代中国人中的精英分

子,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无可旁贷的责任,要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自然应该深入研究中国的问题,提出能够解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

另外,自亚当·斯密开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总是和世界经济的中心结合在一起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任何经济理论的构建总是建立在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直觉上,而经济直觉的获得是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文化因素的,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对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有先天优势的,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我们一定会迎来引领国际经济学界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时代的到来。

**《21世纪》**:那么中国学生研究作为前沿问题的中国经济问题应该做哪些准备?

**林毅夫**:首先,必须培养良好的经济学的直觉,现实的社会经济变量成千上万,如果保留在模型中的变量错了,固然不能揭示造成所要解释的现象的真正的因;保留的变量多了,模型不仅会很复杂,而且,会没有确定的结果,但是,所要解释的现实的经济现象是确定的。一位大师和一般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于大师像孙悟空一样,有火眼金睛,对一个现象看了一眼之后,马上就知道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什么是造成这个现象的最重要的因,哪些变量应该舍掉,哪些变量应该保留在理论模型中。

要培养良好的经济直觉除了必须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体认外,还必须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重要的、必须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重要,在西方不重要的、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一个变量到底重要不重要,不能从数学模型的推导中得到,只能从个人对社会的了解得来。如果人文素养不足,就很难掌握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

其次,要有良好的数学基础,能够把经济直觉用严谨的数学模型表述出来,并用严谨的计量方法来检验理论模型的各种推论。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国际经济学界的俱乐部,成为被国际经济学界接受的一

员，也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去影响国际经济学界。

## 拓展中国经济学的话语空间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经济问题就是前沿问题，在今天西方依然拥有话语主导的前提下，如何成就中国经济学的话语空间？

**林毅夫：**你说的西方话语权主要表现可能在于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不见得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例如，选举、人权、知识产权、少数民族、妇女地位等。我们不能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但是不见得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和问题。第二，我们在分析问题时所用的理论和概念来自于西方，西方认为重要的，我们很容易也认为重要，西方的概念中不存在的，我们也就认为是不存在。我们根据这些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时，西方的学者容易接受。但是，发生在中国的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和西方一样，可是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样。

例如，我国出现于1998—2002年间的通货紧缩，和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一样都表现为物价水平的不断下降。但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一般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产生财富收缩的效应，导致消费下降，生产能力过剩，其结果不仅是物价水平下降，经济增长也必然很疲软。而我国的通货紧缩则是由于前一期的投资过热，引起生产能力猛增，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物价水平下降，并没有财富效应，消费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还能保持和过去大致相当程度的增长率；民营经济的投资会因生产能力过剩而减少，不过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投资还维持一定的增长率。

由于消费和投资都还继续增长，所以在物价水平下降的同时还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不曾出现通货紧缩和高增长同时存在的现象，没有这方面的理论，而根据现有的理论，通货紧缩和低增长应该是并存的，于是外国的经济学家就对中国通货紧缩下的经济高速增长产生很大的怀疑。同时，我国的学者，也很容易根据国外的通货紧缩理论来对我国的通货紧缩现象开药方。然而，既然通货紧缩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理论模型不应该一样，治理药方也应该有所不同。同时，也应该提出一些新的分析概念，例如，生产能力过剩是有一个生产能力的存量未使用，所以，治理通货紧缩的

最好办法是启动存量需求等。但是，在多数人习惯于从现有的理论和概念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时，根据我国的现象提出的新理论、新概念很不容易被学术界，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学术界所接受。

不过，根据新现象提出新理论不容易被学术界接受的情形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时所特有。多数人在学习理论时总是先入为主的，即使在国外，一个经济学家也很难说服另外一个已经接受不同理论的经济学家。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新的理论时，通常不是通过说服已经接受现有理论的经济学家，而是通过说服刚入门的学生而产生影响的。比如说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时，开始的时候经济学界基本是不接受的，他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去发表论文的时候，是群起而攻之的。但是，根据旧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没有办法解释滞胀的现象，他的理论可以解释滞胀，后来更多的学生接受他的理论，理性预期理论也就变成新的主流。

现在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概念，会比卢卡斯当时的处境更艰难。当前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主流的意见是“华盛顿共识”，而“华盛顿共识”是建立在现有的主流理论和概念体系中的，在主流理论框架和观念中不存在的现象就被忽视了，然而，那些被忽视的现象或概念也许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问题的更根本原因。例如，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许多政府干预和制度扭曲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想去扶持一批技术先进、资本密集、不符合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但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不会或很少存在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所以，现有的主流经济学中没有自生能力的概念，各种理论则是建立在凡是存在的企业都是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上。由于国内学术界通常以国外的理论概念来分析国内的问题，要在国内产生影响，必须先在国外产生影响，靠出口转内销。但是，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的时候，西方的经济学家对西方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还是比较理解的，而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西方是有隔阂的，要说服他们则会是难上加难的，既要克服他们先入为主的心理障碍，还要克服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现象陌生的难关，否则写的文章是很难被主流杂志接受、发表的。

但是，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职责不在于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最重要的是提出的理论能否解释我们关注的现象，能否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作出贡献。只要理论能解释现象，慢慢就会被接受。随着中国

的经济发展，外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关注，他们发现现有的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处处显得苍白无力，就会更多地接受根据中国现象提出的理论解释，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改变现状。机会总是和困难并存的，中国经济现象是一个金矿，要挖金矿必须有心理准备付出比挖煤矿更大的代价。所以，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时能否被国内、国外学术界接受，而在于我们能否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在“论经济学方法”的对话中，我特别强调作为一位学者必须有“常无”的心态来研究任何现象和问题的原因之一。

**《21世纪》**：*在强大的西方话语背景下，我们如何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

**林毅夫**：这里面牵涉经济学的本质问题，如果经济学是指一套套现成的理论，那确实是有一个话语背景，因为任何理论之所以被提出来都是为了解释某一特定社会的某一特定现象的，那些现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陌生的，就像中国的现象对于外国的经济学家来说是陌生的、有隔阂的一样。但是，经济学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角度、方法，也就是前面我讲的，“一个人（决策者）面临选择时，总是做出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我认为这是经济学的“体”，是所有经济学的理论抽象到最后唯一剩下的共通的东西，这个“体”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在中国、在外国，在现代、在古代，其实都是适用的。

比如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按劳分配的农业生产队里，由于监督困难，队员的最佳选择就是干活磨洋工，这种情形其实在实行井田制度的中国古代也同样是，《吕氏春秋·审分》里面记载：“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公作则迟”、“分地则速”所反映的不就是一个生产者在监督困难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做的最优选择吗？成语故事里的“南郭处士”反映的不也是同样的现象？我认为经济学的“体”（方法）是普适的，用来分析中国的现象同样是适用的，中国人接受起来应该是没有困难的。而经济学的“用”（理论），也就是“体”在一个一个特定情境下的表现形式，则是有一定的话语情境的，西方盛行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讲确实不少是陌生的，甚至是难以理解的。

**《21 世纪》：那么经济学教育是完全西化还是必须结合中国实际？**

**林毅夫：**在谈过我对前面的问题的看法以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学的教育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现在的主流理论是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研究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的一个结果，这些理论对理解和解决发达国家的现象和问题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些理论本身并不是真理。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这些现在是主流的理论将来会被修正，甚至被抛弃。中国的问题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不完全一样，所以，试图简单地把那些主流理论运用到中国来是削足适履，是教条化、意识形态化的行为。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是一门经世济民之学，只有深入中国实际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帮助我们理解、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经济学的教育要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除了培养学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看问题、分析问题之外，还应该用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理论来教学生，这样学生才会对理论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学的理论也会在实际的工作中比较有可能得到运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就有这么一个传统，通常要求外国学生以他们国内的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因为，理论是用来解释现实问题的，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是有文化背景的。所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鼓励学生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这样不仅比较容易写出好的论文，而且，也有利于这些学生将来回国工作。这种方式、取向是我国的经济学教育所应该学习的。

## ☞ 从"西天取经"到本土化

**《21 世纪》：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如何？**

**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一定会像佛学一样，从西天取经到本土化。佛教是在东汉传入中国的，开始时主要依赖翻译的西方佛学经典来传播，只在上层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佛学真正对中国社会有很大影响，且中国对佛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则是到了唐朝禅宗的六祖惠能把西方佛学本土化以后，才普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佛学也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而有了很大的发展。

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起始于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自那之后直到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首先当然是以引进开始。但是，任何现有的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才成立的，任何经济学的理论抽象到最后只有理性原则是共通的，我们必须从一个个特定的理论中去体会如何运用这个经济学的"体"来分析研究问题，结合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来培养经济学的直感，然后才能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可以解释、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体系。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开始，我们是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希望从西方的经济学中得到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使中国重新富强起来的真经的。但是，如果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到头来就会发现外来的经念起来不灵，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在理论创新上走过本土化的历程，才能对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才能对世界经济学殿堂的辉煌做出贡献。

**《21世纪》**：其实佛学更接近人性的本质，也具有更大的共鸣空间，但是经济学是基于事实而提出理论的，而这些事实在之前大多数是西方的事实，本土化会不会更加困难？

**林毅夫**：怎样对待这个问题，《金刚经》里倒是有很好的答案，比如《金刚经》里有一段："如来所说法皆不可说，不可执，非法，非非法"。为什么？佛所说过的话都是帮助人们达到终极的涅槃境界成佛的法，佛法有八万四千种，但是每一种法都是针对特定情况下的人说的，对不同情况的人就不是成佛的法门了，所以是"非法"，但是，对于佛所说的对象又是成佛的门径，所以是"非非法"。问题是把这八万四千种法都修炼是不是就一定能成佛？未必，问题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个人所面临的状况可能是在佛所说的八万四千种状况之外，所以，禅宗才强调佛向心中求的自悟。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比喻来讲就是佛所说的法，是"理论"，是"非理论"，是"非非理论"。学这些从西方的事实提出来的理论，只不过是作为范例来学习如何运用经济学的"体"于具体的状况中，而不是为了照搬这些理论于中国，甚至也不是为了运用于产生这些理论的西方，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还必须自己从中国的现实问题中提出新的理论来。在中国的本土化理论尚未成为完整的体系之前，教科书中所用的

理论必然只能来自于西方的事实，可是，即使到了有一天中国的理论体系已经成熟，教科书中所用的理论都是来自于中国的事实，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也只能用“非法，非非法”的态度来对待。因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如果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任何已经被提出来的理论，那么，学习根据西方的事实提出来的理论也就不会成为经济学本土化的障碍。

**《21世纪》：**中国经济学者如何成为经济学大家？近期能否出现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林毅夫：**我在很多场合提到，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一定会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因为经济理论来自于经济现象，而经济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呢？发生在最重要的国家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高，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问题上有近水楼台之便，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不少经济学家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

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需要两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从西天取经，如果能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取得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本土化的共识，并开始以此为目标努力就很不错了。如果这个共识和努力能够早一点开始，那么，下一代的经济学家，也就是现在的学生，不少人会有机会成为国际经济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当中也就可能有人会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 理解现代经济学[①]

钱颖一
（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是二十多年来推动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我国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直接力量。二十年来，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市场经济体系正在全面建立。伴随着这一过程，现代经济学科的各个分支领域逐步被介绍到我国，并在高校讲授。今天，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必然要全方位地与国际接轨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经济改革和开放也将上一个新的阶梯。这一大趋势呼唤着我们的经济学学科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与现代经济学接轨。为此，比较完整和准确地理解什么是现代经济学就恰逢其时。

##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我们把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②]。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核心

① 作者感谢（以姓名拼音为序）白重恩、陈旗、姜纬、茅于轼、王则柯、吴敬琏、肖梦和许成钢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建议。

② 本文中所指的经济学是按照国际惯例定义的经济学学科，即国内所说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两个“一级学科”名下的全部“二级学科”，包括宏观、微观、计量、金融、财政、产业、劳动、环境、国际（世界）、发展、比较、经济史、政治经济学等。

内容，而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目前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然而，这样说并不排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实际上，做研究时必须要考虑到某地某时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

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

第一，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的看问题的角度或曰“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①]。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实际上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所以我们会听到人们惊叹：“我怎么没有想到？”经济学的这些视角起初是研究纯粹的经济行为的，后来被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诸如选举、政体、家庭、婚姻等问题。

第二，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

① 值得指出的是，“自利”动机并不排除经济人（如父母）将他人（如子女）的福利作为本人效用的一部分所表现出的“利他”动机。

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鲁定理(Arrow-Debreu Theorem)([3],[7]),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6]),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17])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阿罗(Kenneth Arrow)曾经说过: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但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他的意思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就像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一样,尽管无摩擦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把这些基本定理定位于参照系有助于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却不知在通常情况下,它们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与现实的距离因地而异。另一种是因为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因此认为毫无所用。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的进一步理论提供参照系。

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生的时候,韦茨曼(Martin Weitzman)教授问我,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他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经常去苏联访问,问这个问题是从与苏联经济学家交往中有感而发。韦茨曼的回答是,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我们常见到,一些记者洞察力很强,有经济头脑,写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们与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没有参照系而会显得分析缺乏主线和深度。

第三,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试举几例说明。

第一例是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起初,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问题,后来又用它来分析政府干预

市场的政策效果。不仅可用它来研究市场扭曲问题,也可用它来研究市场失灵问题和收入分配的福利分析等问题。

第二例是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的重叠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25])。这一模型考虑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和代际之间的市场的不完备性,因此成为研究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有用的分析工具。

第三例是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哈特(Oliver Hart)和穆尔(John Moore)的所有权—控制权模型([11],[12])。它是分析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对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非常有效的工具。

第四例是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和梯若(Jean Tirole)的非对称信息模型([16])。它用来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配置效率"和"信息租金"之间存在的利弊得失交换。这一工具被用来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比如电信业)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

第五例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迪布维格(Philip Dybvig)的银行挤兑模型([8])。这一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多重均衡点,除了好的均衡以外,还有类似于"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坏的均衡点。因为别人去挤兑,所以我也要挤兑。这一模型对研究金融危机和金融体制的脆弱性这类问题很有用。

以上五个例子中的模型都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广泛用来作为分析工具,并被证明是极其有用的。

这三部分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一个人受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时所接受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键所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种由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构成的分析框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新鲜的经济学名词和概念的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这些名词和概念,而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

上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在这方面,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比如,社会学中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范式。多元化虽然可贵,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分析框架,学科的发展会大受局限。政治学的现状则介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虽然目前政治学有明显的朝经济学方向发展的趋

势，比如，“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学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学的问题，其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但它在政治学中还不是唯一的范式。现代经济学趋同于一种范式，有利亦有弊，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从中的受益远远大于损失。正是由于经济学的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相对于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

## 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作用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学领域都用到数学，有的领域多些，有的领域少些，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下面我们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empirical，又译经验）研究两方面来具体看一下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借助数学模型至少有三个优势：其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其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是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模型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并且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至少有三：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发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限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以得出定量性结论，并分别确定它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讲到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重要作用时需要澄清两点。一是确有不少好的经济学的初步想法或猜想一时还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表示,因此要用非数学语言写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应视作"前期产品"。初步的原创思想往往需要后继者用数学模型表述,在此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取得明确的、有预测性的理论结果后,才会影响深远。试举两例说明。第一例是张五常(Steven Cheung)在20世纪60年代末有关佃农制(即农民与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的研究,他对交易成本对不同合同形式的选择作用提出开创性论说([5])。后来,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1974年的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激励与风险分担的交换对农民与地主在土地租赁合同选择的影响。一方面,张五常的想法是开创性的,后来的数学模型中相当多的成分都与那些想法有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后来的数学模型,人们的认识不仅只局限在农业土地问题上,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论说也只是一种不大精确的概念。正是后来的数学抽象使得激励理论与合同理论迅速发展到其他领域。比如,詹森(Michael Jensen)和梅克林(William Meckling)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债权和股权的分配问题([14]),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开创篇,公司金融中对激励的研究从此起飞。地主租赁土地给农民和投资人雇用经理看上去不相关,一旦上升到数学模型,便都是激励、信息和风险分担的问题,它们原来是相通的。第二例是法玛(Eugene Fama)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经理市场竞争作为激励机制的开创性想法。法玛认为,即使没有企业内部的激励,经理们出于今后职业前途考虑及迫于外部市场压力也会同样努力工作([9])。后来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等人用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经理们的职业生涯考虑(career concern)对他们的激励影响,发现法玛的猜想的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不完全([13])。这才导致了经理的职业生涯考虑和经理市场竞争这一课题成为目前公司金融学中的热门研究课题。以上的例子说明,将经济问题转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可以使分析变得具体,知道利弊得失所在,而且还可以把貌似不同但实质相近的问题连接在一起,从而把研究从初步的想法推向深入的探索。

二是经济学家经常在理论或实证结果用数学模型推导出或用统计方法估计后,再用非数学语言来概括。这可视作"后期产品",比如综述性、介绍性的论文和政策性的文章,特别是后者必须用非数学语言表述并落到实处才有受众,才可能有政策影响。但是需要强调指出

的是，虽然这些文章是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是其中的视角、逻辑推理过程和对经济现象和政策含义的解释，都是与作者经过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特别是数学模型的训练分不开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是原创论文，而该学会的《经济文献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和《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的文章则都是综述性和介绍性的论文。后者虽然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都基于已发表的有数学模型的论文，而且通常还是由在这一领域资深的权威经济学家撰写。有经济学系统训练的读者可以将这样的论文“还原”成数学模型。

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经济学不是数学。这里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在绝大部分论文中，经济想法(idea)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靠数学取胜，最终是经济学想法决定一篇文章的贡献，而不是数学推导。我们不能将经济学家与数学家混同，就像我们不能把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混同起来一样。经济学家的工作毕竟不是为了开拓数学理论前沿，那是数学家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更深的一层涵义是，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因此，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的理论的创立和旧的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现代经济学非常重视实证分析。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或对已有理论的检验，或发现新的、已有理论尚不可解释的经验证据，都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出发点和导向来进行的。这与其他的一些社会科学中的实证分析不尽相同。比如在社会学中，许多实证分析并没有一致的理论基础，像通过估计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了解事实。而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大都是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

因此，在本质上经济学不应同数学相类比。经济学同物理学相类比则更为恰当，因为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的经济世界，两者都是科学，其理论都必须经

过经验数据的检验。而数学理论是不需要用数据来检验的。当然经济学与物理学很不同的一点是，除极少数的情况外，经济学无法像物理学那样做可控实验。因此，相对于物理学而言，经济学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假定和数学推理来推断。这可以解释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两个特点。其一，经济学对假定的现实性非常关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名的有关假定不重要、只要预测正确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其二，这也说明为什么经济学中超越现实的数学推理有相当大的空间。但是最终而论，由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经济学作为整体必须瞄准事实，与经济现实相关。

以上讲的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是一般而论，但是特例总是存在的，两个极端的例子便是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Ronald Coase）和纳什（John Nash）。在一个极端，科斯定理是一个被称作定理但是并没有数学模型的原理。虽然它没有借助任何数学模型，但是逻辑推理步步严密、丝丝入扣。科斯定理改变了通行的观察问题的视角，建立了分析产权和政府干预的新的参照系。在另一个极端，纳什是一个数学家，“纳什均衡存在性”（[18]）和“纳什谈判解”（[19]）都是数学定理。但是它们在经济问题上应用广泛，成为博弈论的基本分析工具。有趣的是，科斯一直在法学院任教，而纳什从未离开过数学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两个极端的特例，不能任意推广，事实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情况并非如此。本文所引用的三十几篇参考文献中不少是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中的经典论著。我们从中不难发现，第一，除个别外，这些论著都运用数学（或基于运用数学的论文）；第二，除个别外，它们都是论述经济学而非数学问题。

## 现代经济学在发展

除了抱怨它的数学化，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还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批评是认为它的研究领域狭窄，并由此把它归为一种或一类观点。比如，认为现代经济学只研究市场运作不研究非市场组织（如企业和政府）的行为；只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只探讨效率不注重研究平等。现代经济学起源于新古典经济学，侧重的是市场中的资源配置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当然是市场经济中

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其本身的研究范围并不包含经济学的其他许多领域。现代经济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扩展到经济问题的几乎所有领域。我们从当前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些热门研究课题便可见一斑。比如，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设计、经济政策的形成与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演变的关系、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经济行为的作用、收入分配如何影响效率，等等。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正在迅速扩充。

第一个例子有关公司金融学（corporate finance）内容的大幅度扩展。在20世纪50年代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公司金融学中的主要内容——公司融资结构的确定——不外乎是取决于公司和个人的不同税率以及公司破产（包括濒临破产）成本。直到70年代中，詹森和梅克林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股权和债权的结构问题，使得公司金融学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一方向性转变的核心是经济学超越传统上只研究市场的局限，把公司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组织来进行研究。由此便引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代理人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等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信息与合同理论就成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到了80年代中，格罗斯曼、哈特和穆尔又进一步运用不完全合同理论这一新的分析工具来研究公司融资和治理结构问题，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在经验实证方面，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和维什尼（Robert Vishny）在八九十年代对公司的融资结构、经理行为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实际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不少经验实证论据（[27]）。比如，他们发现，现实中重要的代理人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发生在股东和经理之间，而是在于大股东伙同经理一起侵犯小股东们的利益。90年代末，他们及其合作者又进一步从经验数据中比较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研究各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在保护小股东方面的差别，并由此确定法律对公司融资的影响（[15]）。最近，他们正在比较法庭裁决和行政监管这两种执行规则的方式在维护金融市场有效运作中的利弊。由此看出，近二十年来，公司金融学深受微观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其内容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个例子是现代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作为经济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在兴起。新古典经济学为了集中探讨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撇开了一切对政治因素的考虑。但是人们在实际中发现，脱离政治因素是无法解释许多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特别是那些明

显低效率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比如,经济学理论早已论证了关税保护的低效率性,但是许多国家仍然高筑关税壁垒。经济学家们很清楚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造成不稳定的危害性,但是不少国家的宏观稳定政策却不断被拖延。经济体制的改革、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常出现的放慢、停滞甚至倒退,都很难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理解。于是,经济学家们把政治因素引入他们的经济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治经济学或称现代政治经济学至少在两点上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它的出发点不是"规范的"(normative),即研究"应该怎样",而是"实证的"(positive),即先研究"是怎样"。具体地说,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先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决定的形成和实施。第二,它的分析方法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体地说,它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引入政治因素的。

现代政治经济学有两大类分析工具。一类是基于"选举"(voting)的、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经济政策的模型。在这类模型中,政治家的利益是为了赢得选票,经济人根据自身利益投票,而经济政策的确立由多数人的利益决定。另一类是基于"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竞争从而影响经济政策决定的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不同利益集团动用可支配的资源游说、影响甚至贿赂政治家,而政治家的决策确定经济政策。这两类模型以不同方式引入政治运作机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经济决策确定的原因。布莱克(Duncan Black)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证明的"中位选举人定理"(the median voter theorem)为选举模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4])。而奥尔森(Mansur Olson)在60年代中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20])。但是直到八九十年代,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才突飞猛进,并在经济学科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刚刚出版的两本新书:一本由珀森(Torsten Persson)和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合著([21]),另一本由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合著([10]),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这期间的新进展。

第二种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是关于其模型中的假定。任何理论都要做假定,因此任何理论的成立也都会有局限条件。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如此,社会科学(如经济学)也是如此。历史表明,任何科学都是在对现有理论的批评中发展的,但是历史还表明,建设性的批评

最有价值。仅仅指出和批评已有研究中的某些假定与现实的差距是不够的,关键的是看能否提出新的体系,不仅它的假定与现实更相符,而且还能解释更多的现象,并能够包涵已有理论。举一个物理学的例子。当年人们之所以接受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因为它既能比牛顿力学解释更多的现象,而且还能把牛顿力学作为它的特例。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断发展和扩充。下面我举两例说明,在过去 30 年的历史中,现代经济学如何不断修改基本假定使之与现实更接近,同时修改后的理论不但能更好地解释现实,并且能够包涵已有理论。

第一个例子是 20 世纪 70 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原本都是假定信息是对称的。1970 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发表的关于"次品市场"的论文开创性地把非对称信息引入对市场的研究([1]),带来 70 年代信息经济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有趣的是阿克尔洛夫在完成该文后向经济学期刊投稿,连续被四五家杂志拒绝,包括美国经济学会的《美国经济评论》、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欧洲的《经济研究评论》等一流经济学杂志。几经周折终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立刻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引入非对称信息改变了不少已有的结论,但是阿克尔洛夫的模型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下发展的,并将对称信息作为一种特例。而且,它的结论可以用实证方法检验。事实上,在不同市场,非对称信息的程度不同,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也不同。在对称信息假设下的理论并不是被推翻,而是被扩展和补充了。因此,非对称信息的理论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并成为其一部分,为信息经济学作出奠基性贡献的阿克尔洛夫、史宾斯(Michael Spence)([28])和斯蒂格里茨([24],[29])一起荣获 2001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便是明证。

第二个例子是 20 世纪 90 年代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起步。心理学的经验结果发现,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经济学的理性假定有系统性偏差。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吸收现代心理学中的经验证据,修改经济学中某些有关人的理性的基本假定。它研究在这种修改后的理性的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并能够解释一些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行为经济学之所以正在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也正是因为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通常的理性假设在某

些情况下是合适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修改后的理性假设下的理论更能解释现实。90 年代，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行为金融学方面，塞勒（Richard Thaler）（[30]，[31]）和施莱佛（[26]）对人的有限度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在行为经济学方面，阿克尔洛夫又有新贡献（[2]）。但最有意义的事件是 2001 年美国经济学会将该学会的最高奖——每两年一次、授予对经济学发展影响最大的 40 岁以下的美国经济学家的克拉克奖章（Clark Medal）——颁发给为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雷宾（Matthew Rabin）（[22]）。这是该奖在过去 12 年来首次授予一位研究基础理论的经济学家，它说明了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的一种认可。同时它也表明，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恐怕是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历程中最有意义的事件。

## 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之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各国具体经历和路径会表现出不同。这些年来各国在转轨和改革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和采取的类似的或不同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不少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改革时期的中国，但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在成熟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常识”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甚至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比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的生产大衰退和中国在产权尚未规范化前的经济持续增长便是已有经济理论事先没有预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并不奇怪，一来现代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问题，二来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规模的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什么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准中

国的现实,经济学家要懂得中国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就很容易产生困难:第一,很难识别和确定改革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第二,不易做出与现实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因此,懂得中国的事情是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懂得中国的事情是不够的。为了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还需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它们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知识的结晶。方兴未艾的转轨经济学正是如此来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中的新现象。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罗兰(Gerard Roland)的新书《转轨与经济学》概括了在这一领域中到目前为止的主要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23])。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正是在对新的经济问题的探索中发展的。前面论及的公司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是这样,转轨经济学也是这样。

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什么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使我们在分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时能够站在这一参照系的高度来观察貌似纷乱无序的现象。有了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一参照系,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情况放在国际比较中合适的位置上,以便准确地识别中国的情况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否则,无论是对现实的分析还是对政策的建议,我们在研究中国改革时就会缺乏方向感,丧失大视野。

进一步说,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框架适用于研究中国的改革。这可以分别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来看。第一,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家、经理和政府官员同其他国家的经济人一样,在资源、技术和制度的约束条件下受利益驱动。用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视角看问题,我们可以在分析中国正在经历的复杂的转轨问题时,对人的行为作出一致的和合乎实际的假定。第二,由于中国的改革大趋势是纳入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参照系作为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理论参照系不仅合适而且必要。第三,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引用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概念和结论的确能帮助研究人员扩展思路。但是,由于改革是错综复杂的过程,任何比较系

统、深入、精细和经得起推敲的研究都必须超越概念的解释和措辞争论的层次。深入的分析需要借助前人制作的工具，而现代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各种数学模型提供了这样的分析工具。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是为研究中国改革而发明的，但是其中一些模型经过适当的修改，考虑进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是可以被运用来分析中国改革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的。

下面从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个不断深入的改革层面来具体说明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个例子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它是改革中“计划”与“市场”之争中的基本问题。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市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理论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受管制的价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自利经济行为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可以达到社会的经济效率。它对于以市场取代计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无论是评估以往改革的路径和目前的改革措施，还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凡是探讨资源配置问题，这一理论都是讨论的基础。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认知，单纯强调行政性放权，结果导致改革尝试的失败。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之后的今天，各种扭曲价格、限制竞争、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层出不穷。诊断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进的方法，都离不开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看上去尽管很抽象和不现实的理论参照系，在研究中国的改革时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第二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深层次改革热点问题的企业问题。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价格的理论，不是关于企业的理论。7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对企业的产权、所有权和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现代的企业理论以激励问题为出发点展开对企业内部经理层、大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调节机制的分析，而基于这一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很多现实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律。这些现代经济学中正在蓬勃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结果以及分

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及时地介绍到中国，对于研究中国的企业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改革方向是同发达经济中的现代公司模式接轨，所以现代经济学对发达经济中公司的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发现中国企业改革中的问题，并提出具有远见的政策性建议。另一方面，考虑到转轨中的企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在自身特性和所处环境上的重大差别，而这些差别又不易在短期内消除，已有企业理论中的现成结论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为它们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业问题的本质。运用这些工具，对已有的模型作出修改，加入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业所有者不全是私人，产权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合同和法律无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执行），就会得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有分析深度的结果。这样就可把对转轨中的企业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对症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建议。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关于成熟市场经济的研究结果，对研究中国的改革或可被直接应用，或可被修改和发展后运用。

第三个例子是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及其对经济影响的问题。这是较前两例——市场和企业——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因为政府的行为对市场功能的发挥和企业活力的展现都有着基本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不同于前两例的是，现代经济学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的研究相对有限，远不如对市场的资源分配和企业问题的研究那样深入和成熟。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以法治为基础，政府的任意行为受到法律约束，使得它不易侵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而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责是提供公共品，如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而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情况非常不同：通过建立法治来约束政府行为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在完善法治之前，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对经济影响最大和最突出的方面还不在于提供传统的公共品，而在于政府对待本地新兴非国有企业的行为是“养鸡生蛋”还是“杀鸡取卵”，这往往决定了某地经济活力的程度。哪些因素决定地方政府的行为并进而决定地方经济的盛衰无疑是转轨经济提出的新问题，而现代经济学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现代经济学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即地方政府官员同其他经济人一样，其行为与所提供的激励紧密相关。同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业组织内部管理中的集权、分权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来研究政府组织内部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关

系，以及它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行为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评估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并进而解释在转轨过程中各地甚至各国经济表现的不同。

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权和财政包干制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它们所管辖的地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众所周知，财政包干制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伴随中央财政收入下降等问题。但另一方面，它给予地方政府很高的边际财政留成率。实证研究发现，在实行财政包干制期间，地方政府的边际财政留成率越高，其财政激励就越高，它们的自身利益与本地的经济繁荣就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表现出更愿意帮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杀本地有活力的非国有经济，结果本地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这与90年代俄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俄国的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与本地的经济发展几乎不挂钩，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激励发展本地区经济，相反却不断骚扰、掠夺新兴的私有经济。俄国地方政府的这一行为被认为是阻碍新兴私有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①。

这一例子说明了即使是研究那些中国改革中特有的问题，也可以借用现代经济学中为研究其他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反过来，不仅转轨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状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意思的素材和经验数据，而且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转轨和中国改革还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经济学。由于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是转轨经济中最突出的和最受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深层次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自然而然地成为近年来转轨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内容。而转轨经济学的这一研究也影响和刺激了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它对发展经济学有直接的影响——毕竟在制度环境方面发展中经济与转轨经济有相似之处——比如推动了研究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关系。它还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一些新的经济学（包括金融）的研究热点，比如比较世界范围内（包括发达国家）的财政体制、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体制并分析它们对政府行为、企业融资和经济表现的影响，而这些都不是以往研究的焦点。由此看

---

① 有趣的是，与当前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权、税收不断提高的情况相对照，最近俄罗斯的财税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实行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都因政治原因无法实行的单一税率的个人所得税制。中国的财政收权是否加速了它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减缓，俄罗斯的财税改革对个人的激励是否有助于它当前的经济复苏，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出,对转轨经济和对中国改革的研究的确也会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 注　释

[1] Akerlof, George.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3), pp. 488-500, August 1970.

[2] Akerlof, George. "Procrastination and Obed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Richard T. Ely Lecture. 81(1), pp. 1-19, May 1991.

[3] Arrow, Kenneth, and Frank Hahn.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1.

[4] Black, Duncan. *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5] Cheung, Steven N. S.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6] Coase, Ronald.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pp. 1-44, October 1960.

[7] Debreu, Gerald. *Theory of Valu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8] Diamond, Douglas, and Philip Dybvig.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1(3), pp. 401-419, June 1983.

[9] Fama, Eugene. "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8(2), pp. 288-307, April 1980.

[10] Grossman, Gene, and Elhanan Helpman.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11] Grossman, Sanford, and Oliver Hart.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4), pp. 691-719, August 1986.

[12] Hart, Oliver, and John Moo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6), pp. 1119-1158, December 1990.

[13] Holmstrom, Bengt. "Managerial Incentive Problems — A Dynamic Perspectiv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6(1), pp. 169-182, January 1999.

[14] Jensen, Michael, and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4), pp. 305-360, October 1976.

[15] 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

ny.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1), pp. 1-25, October 2000.

[16] Laffont, Jean-Jacques, and Jean Tirole. "Using Cost Observations to Regulate Firm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3), pp. 614-641, June 1986.

[17] Modigliani, Franco, and Merton Miller.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3), pp. 261-297, June 1958.

[18] Nash, John. "Non-Cooperative Games." *The Annals of Mathematics*, 54(2), pp. 286-295, September 1951.

[19] Nash, John. "The Bargaining Problem." *Econometrica*, 18(2), pp. 155-162, April 1950.

[20] 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1] Persson, Torsten; and Guido Tabellini. *Political Economics: Explaining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22] Rabin, Matthew.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s Literature*. 36(1), pp. 11-46, March 1998.

[23] Roland, Gerard.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Politics, Markets and Fir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24] Rothschild, Michael, and Joseph Stiglitz. "Equilibrium in Competitive Insurance Markets: An Essay 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Inform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4), pp. 629-649, November 1976.

[25] Samuelson, Paul. "An Exact Consumption-Loan Model of Interest with or without the Social Contrivance of Mone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6(6), pp. 467-482, December 1958.

[26] Shleifer, Andrei. *Inefficient Markets: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Finance*. Clarendon Lectures in Econom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 Shleifer, Andrei, and Robert Vishny.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52(2), pp. 737-83, June 1997.

[28] Spence, Michael.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3), pp. 355-374, August 1973.

[29] Stiglitz, Joseph. "Incentives and Risk Sharing in Sharecropp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2), pp. 219-255, April 1974.

[30] Thaler, Richard. *The Winner's Curse: Paradoxes and Anomalies of Economic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31] Thaler, Richard(editor). *Advances in Behavioral Fina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3.

# 经济学家市场在美国[①]

钱颖一

我在“经济学科在美国”(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2001年第6期)一文中介绍了经济学科在美国的四个方面的情况:美国大学中经济学科的设置;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在欧洲;以及中国学生申请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学位时应注意的事项。在某种意义上说,那篇文章提供了经济学科在美国的“前半段”的信息。本文介绍的是经济学科在美国的“后半段”的信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学博士毕业生求职论文的准备;第二,经济学博士毕业生的求职和招聘过程;第三,经济学家的学术职业道路;第四,经济学家的非学术职业道路。它是有关在美国经济学家市场的制度和运行的介绍,既可以看成是一篇独立的文章,也可看成是一个续篇。

本文特别涉及即将毕业的经济学博士的就业市场在美国的运作,包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即他们如何找工作和用人部门如何招聘。美国具有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运作效率最高的经济学家就业市场。了解美国的这一市场的运作情况,不仅很有趣,而且对于思考中国如何与国际市场接轨也很有必要。美国的经济学家就业市场是非常有组织的(金融学的情况与经济学相同)。这一市场的运作,每年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并且遵循既定的方式。即将毕业的经济学博士若想在美国找到第一份学术工作,都会参加到这一过程中。

我于1990年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在美国三所

① 作者感谢(按姓名拼音为序)白重恩、陈旗、姜纬、李稻葵和肖梦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建议。

大学的经济系任教,对美国经济学家的就业市场的运作和他们的职业道路的历程有不少亲身感受。美国经济学家的就业途径包括学术职业和非学术职业两大类。由于我的自身经历主要在学术界,所以这里的介绍以学术就业市场和学术职业道路为主。

## 经济学博士毕业生的求职论文

即将毕业的经济学博士要想找到一份学术工作,如大学教授职位(faculty position),他最重要的准备是一篇"求职论文"(job market paper)。这篇论文通常是博士论文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分。也许一个人已经写了多篇论文,但是就业市场只在乎这一篇。因为招聘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只可能从一篇代表作中摄取信息。

求职论文的最低要求是通顺流畅,有意思,有新意。论文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理论的(theoretical),一类是实证的(empirical)。如果是以理论为主的论文,应有新模型、新结果;如果是以实证为主的论文,应有新方法(或新数据)、新发现。如果既有理论又有实证,既有新结果又有新发现,当然更好。仅仅有新观点、新思路还不够,必须要有逻辑推理出的或实证的具体结果。

什么样的论文是好论文呢?经济学论文的目的是为了改进人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通常在一篇论文中,经济想法(idea)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是为了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具体来说,一篇论文好坏与否至少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看问题(issue)是否重要。二是看论理(argument)过程(包括逻辑和证据)是否巧妙(clever)、严谨(rigorous)和可信(convincing)。三是看结果是否正确、显著。如果论理和结果先是"令人惊讶"(surprising),而后"激起共鸣"(resonant),进而又使人感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便会引起较多读者的兴趣。

在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学生在初写论文时会犯几种常见的错误。一是论文题目不够集中(focus),论述泛泛。比如,有些学生思维方式偏于抽象的大框架,写出的文章宽而不深。另一些学生长于旁征博引,但论说的细节却较含混。在美国,学术论文要求具体,题目要窄,但论述要深和细。

二是论文的书写不够清楚,很难被导师读懂。论文应该直截了当,开首几段以后要表述出属于自己的新想法。如果导师看了几节后还不知所云,就会问:what's the point?(你想说什么?)如果看完全文

后仍不知所云，教授就会得到一种印象，即(s)he does not know what (s)he is doing(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也反映了一个人对经济问题的思维和论述方式中的问题。

三是论文不能被合适地定位在文献之中。这往往使得读者看不清你的新贡献，也看不到你的工作与已有文献的联系。由于科学研究奖励的是“边际贡献”，因此论文中必须把自己的新贡献与文献中已知的结果分得一清二楚。

现代经济学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写博士论文是写论文而不是写书。即使当了教授，学术贡献也主要看论文而不是书。现在经济学家出书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在某一领域成为权威后将自己的论文与观点整理成册；二是将自己的学术论文以较通俗的语言串写成书以得到更大的读者群；三是写教科书和畅销书。这是经济学科与其他一些社会学科不同之处。比如，政治学里相当多的领域的博士论文要写成书。经济学里几乎没有将博士论文写成书出版的。这恐怕是经济学科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吧。写书需要自己来定义新概念，引进新框架，这就需要好几章的铺垫。但是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有大家共知的概念和框架，不需要铺垫，可以直接上来就论述自己的贡献。

求职论文通常是博士论文的核心，而博士论文通常由两三篇相对独立的论文构成。如果是考虑某一年秋季开始的工作(通常学术工作从秋季开始)，那么这篇求职论文必须在前一年的 11 月 1 日前准备好。不然的话就来不及找下一年的教职了。需要说明的是，学术就业市场非常看重求职论文的质量，远高于毕业生所在学校的名气。因此，并不是名校的博士毕业生都一定可以找到名校的工作的，另一方面，只要论文质量高，非名校毕业的博士也能找到名校的工作，事实上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 经济学博士毕业生的求职和招聘过程

经济学的博士毕业生可以同时在学术和非学术市场上求职。但是，指导教授总是希望最优秀的博士生去学术界工作，这是因为在美国，衡量一所大学博士教育水平的主要标准是看该校的博士毕业生有多少去学术界，特别是主要研究型大学就业。虽然在同等学历中，学术界的工资收入平平，但是学术界有一些独特的吸引人的地方，包括

从事学术工作在选择研究题目上比较自由，学术界聚集了很多“智识”(intellectual)取向的人才，因此具有浓厚的智识气氛，以及学术工作在时间安排上比较灵活。这就使得美国学术界得以吸引许多最优秀的经济学博士毕业生就业。

在美国，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是不留校的(特殊情况除外)，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习惯。有时虽然留在本校，但也不留在本系，而是去本校的其他学院如商学院或公共管理学院。这样做可以促进学术交流，有利于学术发展。但这并不排除毕业几年后从其他任教的学校再回到母校经济系任教的可能性。事实上，这种情况不时发生。

经济学新博士的就业市场，从头一年 10 月开始到第二年 3 月市场出清，历时约半年时间。这其中可分为五个步骤。

### ☞ 第一步：内部分类(ranking)

经济学家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美国每年新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估计有一千以上。如果有一千人去申请一个职位，那么招聘单位的工作量就太大了。这么大的市场如何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呢？美国大学培养博士的经济系有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每年 10 月，经济系教授要开一次会，对本年度有意在美国找工作的博士候选人作一个内部分类，即根据学生的求职论文的质量以及其他因素，把他们按不同的就业目标分类。这些目标包括：研究型大学经济系或职业学院(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独立的文科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其他大学、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商业(包括金融)机构，等等。对于研究型大学，还可细分为顶尖大学(约前 10 名)、领先大学(约前 25 名)、主要研究型大学(约前 50 名)，等等。

一个系负责毕业生就业的教授(placement officer)在 11 月间同各用人单位电话联系时，将根据系教授会议的这一分类向招聘单位推荐学生。比如，某某被列入顶尖大学经济系一类，那么他就会被推荐到这些学校。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排名只对争取得到面试(即下面说的第三步)有用，而对以后的几步就没有什么用了。可见，这种分类机制大大减少了招聘单位的工作量，因为它们只需看少数被推荐的人的申请材料就可以了。

### ☞ 第二步：寄出材料(mailing out)

通常在11月、12月间，招聘单位会根据负责安置毕业生的教授的推荐，向学生索取材料。学生寄出的申请材料一般包括如下三项：简历(c.v.)、求职论文和指导教授推荐信。一般来说，学生若自己寄出申请材料而无系里的推荐，找到学术工作的机会比较小。

招聘单位收到这些材料后，其“招聘委员会”成员分别阅读申请人的求职论文，并根据论文质量和本单位的需求，决定是否面试。通常每一空缺要面试10人以上。论文质量是决定是否面试的最关键的因素。一个寻找工作的博士候选人在12月底以前若有10个以上的面试的预约，那么机会就不错。

### ☞ 第三步：面试(interview)

每年1月初，美国经济学会召开年会。这个年会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提供一个全美国的经济学家就业市场运作的场所。起初，参与这一市场的只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校和机构。由于非常成功，后来便不断扩大，目前已经包括了不少欧洲、亚洲和拉美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我国的北大和清华也开始参与。在会议召开的3天内，全世界几千名经济学家和即将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学术和非学术的招聘单位在会场外面试候选人，众多的供求双方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见面交谈，效率非常之高，场面十分壮观。由于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很多面试，往往到最后双方都筋疲力尽。

面试通常持续半个小时。面试的人包括3至5名招聘委员会的成员，和某些同被面试人相同研究领域的教授。面试的人通常会问三个问题：论文要点是什么？有什么其他研究计划？能教什么课？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被面试人要在5至10分钟内概述其论文要点(这被称作“spiel”)。参加过面试的人发现，开始的一两分钟给人的印象最深刻，因此也最为关键。面试后，招聘委员会决定是否邀请该人到本校来演讲论文。通常一个空缺要邀请3至5人来演讲。因此，如果面试后，一个人得到三个以上这样的邀请，那么最终得到至少一个工作聘用的机会就比较大了。语言表达能力欠缺的人，在面试时会比较吃亏。

### ☞ 第四步：校园访问(campus visit)

每年的一二月是经济学家就业市场的繁忙季节。如果某系有两三个空缺，那么就要邀请十名左右的博士候选人来校访问。每一个候选人的访问通常是一整天。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论文演讲(seminar)，也称求职演讲(job talk)。在演讲的一个半小时中，将全面考验演讲人各方面的能力，包括将来的教学能力。校园访问的另一项内容，是候选人与系内教授的个别谈话，交流各自的研究兴趣。因此，一个人与同事的交流能力是校园访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就业是双向选择，校园访问也是候选人了解该学校和系(院)的好机会。系主任和院长会借此机会介绍该校工资、福利、教学负担、科研支持等具体事宜。

面试时，参加的人有限，而论文演讲时，参加的人就较多，包括那些研究别的领域中的教授。因此，候选人需花很大精力准备这场演讲。不仅要使你的研究领域里的人欣赏、喜欢，而且也要能与那些在你的研究领域之外的人沟通，引起他们的兴趣。

### ☞ 第五步：受聘协商(bargaining)

各校在接待完所有的访问后，由全体教授表决给出聘用信(job offer)。这通常在2月份。一般学校会给半个月到一个月的答复期限，特殊情况可延长。因此在3月份的时候，候选人将权衡各个职位的利弊，并与各个单位讨价还价。一般来说，对新毕业的博士而言，在薪水上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可讨价还价的主要是头几年的暑期补贴(在美国，教授的工资通常只是9个月的，不包括暑期)、头一两年的教学任务、科研经费等。到3月底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学家学术就业市场就已基本上出清。

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遍布各州，只有少数城市内有两家或以上的主要研究型大学。在许多大学城内，非学术就业机会不多。近十年来，由于职业女性，特别是女博士的大量增加，学术就业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即“显著另一方”(significant others)的工作问题，比如配偶的工作。“双职工”问题成为决定经济学家人员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美国，过去是没有的。

# 经济学家的学术职业道路

经济学家的学术职业(academic career)通常指的是大学的教授职位(faculty)。经济学科同一些自然科学学科(如物理、生物)不同,没有"博士后"的制度,博士毕业后直接进入教授职位,而博士学位是取得教授职位的必要条件。在美国,教授职位分为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和正教授(full professor),在日常称呼中都可称为教授。美国的大学中没有"博导"这一称呼,所有的教授都有资格指导博士论文并担任博士论文委员会主席,只要该校有该学科的博士项目(Ph. D. program)。有没有博士项目标志着一所大学在该学科领域内是否是研究型大学。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助理教授不是国内的"助教"。事实上,在研究型大学中,助理教授是名副其实的"博导"。

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学术生涯的开始。在开始工作的前一两年,需要把毕业论文修改、送交学术杂志发表。经济学的论文发表周期很长,从提交到发表需要两至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学术杂志的文章采取同行评议(peer review),经过匿名审稿(anonymous refereeing)。

新博士找到学术工作后,在经济系的第一个工作合同通常是3至4年的期限,职称是"终身轨"(tenure track)的助理教授。第二个合同是又一个3年,通常仍然是助理教授。终身轨是说校方必须在第二个合同终止之前,决定是否给予"终身教职"(tenure)。这可以防止校方无期限地拖延给予终身教职。

终身教职的含义是,学校不能辞退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但有一种情况除外。在美国大学,聘用的单位,和给予终身教职的单位,是系(或院)而不是学校。因此,如果学校决定关闭整个系,那么即使你是有终身教职的教授,学校也无法律责任留用你。但是,在任何时候,有终身教职的教授自己总可以另觅高枝。

在绝大多数学校的通常情况下,副教授是有终身教职的,但有特例。比如,个别大学第二个合同给予的都是无终身教职的副教授职称(associate professor without tenure)。又比如,在有些大学,虽然大多数副教授是有终身教职的,但不排除无终身教职的副教授。特别是某人在获得终身教职前转换学校,新的学校会给予一个无终身教职的副教授职称。需要指出的是,有终身教职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with

tenure)不应翻译成“终身副教授”,后者容易被误解为终身只是副教授。如果继续保持研究和教学的水平,经过五六年时间可从有终身教职的副教授升到正教授。在美国,所有的正教授都有终身教职。把有终身教职的正教授翻译成“终身教授”一般不会引起误解。

评终身教职(tenure review)是学术职业道路上最为关键的一环。它的过程复杂,不确定因素很多。评终身教职时,通常系主任先指定一个三人“临时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由它拟写一份详细的评审报告,提交系的全体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们讨论、表决。投票规则不是按照简单多数法则,而是要求几乎一致同意,有个别人反对即可否决。系通过后,由系主任拟写一份综合全系意见的报告送交院和校。这两级的评审委员会中的任何一级都有否决权。只有当这两级的评审委员会都通过后,校长才正式发出聘书。

评终身教职时,对待研究和教学的权重在不同类型的大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研究型大学的经济系重点是看被评人的研究水平。职业学院(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对教学非常重视,但领先商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评终身教职也主要看研究水平。在独立的文科学院那里,教学则是最重要的。

系临时委员会的评审报告,对被评人的研究水平作出评价,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由委员会的成员分别阅读被评审人已发表的和已完成但尚未发表的论文,对主要论文写出详细的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研究工作的整体水平作出评价。这可以被看作是“内部评价”。另一方面,是由系主任出面索取校外教授的评审信(outside letter),通常在5至10封之间。这些教授,必须是同一领域或相近领域中世界范围内的权威,往往是顶尖大学或领先大学中的教授。这些信被认为是学术领域内、学校以外的专家的“外部评价”。这些信的内容,除了对被评人的研究的创造性、重要性和影响力作出评价外,还拿被评人同其他的,在同一领域内、同一时期毕业的人(same cohort)作比较,包括判断被评人是否有资格在写信人自己所在的大学被评为终身教职。这种“相对比较”,往往包含很多信息,对最终决定有较大影响。如果评审人说,被评人比某某还要出色,而某某已在与被评人所在的学校相当或更好的学校拿到终身教职,那么这就是一封有利的信。如果某封信说,被评人不太可能在写信人的学校拿到终身教职,而该校并不比被评人所在的学校好,那么,这就是一封不利的信。

由此看出,无论是内部评价还是外部评价,都是主观评价。在美

国的学术界，由于“职业标准”（professional standard）已趋完善，这种主观评价方式通常来说运行良好。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系评终身教职时，美国的顶尖大学和领先大学，并不采用任何一种论文发表的数量指标，也不按照某种公式计算分数（比如以刊物质量加权的论文发表的数量和）。原因是，虽然这些信息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但在衡量论文质量上都过于粗糙。还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在经济学学科内，单个作者的论文已经越来越少，甚至博士论文的部分章节都允许与其他人合写。一篇论文若是多人合著的话，按惯例，署名的顺序是按照姓氏字母顺序的排列。因此，在美国，经济学论文的署名顺序不包含任何有关作者贡献程度的信息。

## 经济学家的非学术职业道路

非学术职业（non-academic career）是经济学博士的重要就业途径。非学术机构看重博士生所受训练及本身素质的价值。经济学博士毕业生流向的非学术职业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非营利机构，包括国际经济组织（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政府机构（像美联储、财政部）、智囊库（像兰德公司）。另一类是商业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咨询公司（consulting company）。经常雇用经济学博士的咨询公司有管理咨询公司（management consulting）、经济咨询公司（economic consulting）、法律与经济咨询公司（law and economics consulting）等。在这些机构中，经济学博士开始时通常做经济学家或经济师。一般来说，商业机构的工资比非营利机构的高，但后者往往比前者的工作稳定，福利更好。

与学术职业不同，求职论文在找非学术职业的工作时并不十分重要。非学术机构在选择面试对象时，主要看重毕业学校的名气和学生掌握的技能（比如计量经济学的训练）。求职者一旦获得面试机会后，则完全就要凭自己的知识、表达和应变能力来过关斩将。要进入一些著名的投资银行（如高盛、JP 摩根、美林、摩根斯坦利）和咨询公司（如麦肯锡、波士顿顾问公司），竞争者不仅有其他博士，还有 MBA，往往需要通过三至四轮面试，包括最后一轮，由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亲自把关，因此非常不易。近年来，美国的主要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雇用经济学博士的比例在上升。

在学术机构中，博士学位是工作的必要前提，而非学术机构看重

的是博士所受的训练和博士的素质而非学位本身。在商业机构,博士通常和 MBA 在同一起跑线上。博士在公司的研究部门,相对于 MBA 有优势,但他们的职业道路并不局限于研究。近年来,经济学博士就职于公司职能部门(如证券交易、咨询)和经济学博士在公司职能部门晋升高级管理层的人数都大为增加。

在美国,由学术职业转换到非学术职业比较容易,也很常见。比如,常常听说,某某教授到政府部门或国际组织任职,或到金融界下海。但是,由非学术职业转换到学术职业,已经越来越难了。这在经济系,几乎见不到。商学院由于注重实用,经常从商界和政界聘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来任兼职教授(adjunct/clinical professor),但是也很少有从非学术职业转到"终身轨"教授职位的例子。

# 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①]

许成钢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 经济学家需要具备的能力

如何培养最好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具有哪些标准和条件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怎样才能在应用经济学或在经济学上作出贡献？这些问题似乎近来常常被提及。我以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方面能力：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

一是观察能力。很自然地，这是指经济学家要有能力在现实中观察出重大问题，以及规律性与决定性的问题。这既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问题，也包括历史问题。人们是否能够发现和解释历史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是否有能力解释现在。如果没能力解释历史，往往也没能力解释现在。现实问题总是非常复杂的。从学术上来说，如何找出现实或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提出一个解释，这是很大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学者与非学者是如何区分的？什么是经济学者心里特别重要的东西？我想，区别他们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们心里有没有一个理论的基准（benchmark）。好的经济学家要能在观察现实的时候发现问题，提出疑问。也就是说有洞察力。好的社会科学家一定要有能力找到问题。提出一个好的问题相当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所谓的问题，即是疑问。他所产生的疑问、看到的现象，有没有什么规律，能不能解

① 作者感谢李稻葵、黄海洲对本文的修改意见。

释。如果没有什么规律，那就谈不上是经济学问题；如果这个规律能够被已有的理论所解释，也谈不上是问题。观察到现象，且能发现里面有什么问题，这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心里存在的理论基准。一个学者能抓到什么样的问题，就基本上决定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家。重要的经济学家抓到的是重要的问题。有理论素养的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理论基准。

经济学教育中大量的内容是机械的，问题在于，怎么培养人的观察能力。这是教育中的重要问题。观察能力中，有一部分是可以培养的，有一部分是不能培养的。从经济学教育的角度，我们现在只讨论可以培养的部分。要培养出观察能力，其核心就是要透彻理解经济学理论基准。当一个好的学者对经济学理论中提供的基准吃透了，这个基准就能帮助他判断什么地方是有疑问的，什么地方并不是疑问。为了讲得更通俗，可以比喻为结晶。基准就相当于一种结晶的基本结构。它是反映现实的一种理想的、简化的结构。有这样一个结晶在脑子里，在观察现实的时候，就能依据它来判断什么问题是原有的基准解释得了的，什么是解释不了的。解释不了的问题，就可能成为好的问题。这就是好的经济学家所要做的事情。

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人们很熟悉的科斯定理，这是科斯暑期在美国打工时发现的。他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认为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念本科的时候，学到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形成了他头脑中的基准。经济学告诉他，市场在理想竞争状态下是最有效率的。在理想竞争状态下，企业应该是无限小的，经济行为是由市场价格来协调的。可是，科斯观察到，在通用汽车公司，大量的交易不在市场上完成的，不靠市场价格机制来协调和运转，而是在企业内部协调的，是上下级调动的关系。什么是企业的边界？是什么决定了什么应当在市场上交易，什么不能在市场上交易？当时学到的经济学不可能给他好的结论。科斯虽然只是本科生，但他脑子里有这样一个经济学理论的结晶，这就是相当于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里的厂商理论的基准。没有这个基准，就没有后来的发展。头脑里没有好的基准，就很难发现问题，可以说有好的基准对观察能力很重要。

一个好的基准一定是抽象的、简单的。所以，当我们讨论经济学的限制和经济学的指导能力时，绝不应该只由于某个理论有“不符合实际”的什么假设，就断言它是不真实的、不适用的。实际上，往往正

因为好的理论做了好的、重要的假设，才给了我们重要的分析力量。

二是分析能力。分析能力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是理论的——其中包括数学类型的分析能力和使用自然语言的分析能力。二是实证的——其中包括案例（收集材料）分析和数学统计分析。经济学大部分使用数学统计类型分析工具，虽然用非数学工具分析并非不可。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使用数学工具呢？其原因是，当人们不用数学工具时，推理、分析的能力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当问题相对简单，或者人有用自然语言进行分析的天才时，才有可能不用数学进行分析。当然并不一定数学的分析永远是最高超的。科斯对数学一窍不通，高中数学考不过。但他有超凡的能力使用自然语言进行分析。为什么今天的经济学主要使用数学分析能力，那是因为语言的能力非常难以具备，使得只有少数天才方能达到深入。科斯是天才，马克思亦然。这样的人，不使用数学工具，用哲学性方法思索也能把问题想透。但是，只有天才而且碰到的问题相对简单，才有可能不用数学工具。如果要求学生都有科斯这样的分析能力，可能一千个学生最多只能出一个经济学家。

在讨论到经济学家的培养的问题时，运用数学工具的分析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如果是实证工作，除收集数据、案例之外，往往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数据处理，所以要有数学能力。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经济学需要有数学的帮助，需要进行微观、宏观、数理、计量等一系列基本训练，才能帮助学生掌握分析的手段。这些是当今成为经济学家的基本条件。但是，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要两者并重，必须同时强调观察能力，而不能只强调数学，两者是互补的。

三是创造能力。将创造能力从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中独立分离开并没有很好的道理，我这样表述只是为了更强调创造力。前两者都要创造力，之所以要分开，是想强调创造力的重要性，是因为只有具有创造能力，才能成为好的经济学家。创造力指有创造性的观察能力和创造性的分析能力。创造性的观察力是提出疑问，找到现有经济学中不能解释的主要规律。首先，有没有创造能力去进行观察，能否在观察中发现问题、发现基本的挑战。其次，有没有能力创造性地进行分析，要有能力处理现有的分析工具没能处理的问题。德布鲁和纳什其实是数学家，对经济问题并不十分熟悉，但对经济学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经济学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学科，有众多的分工。他们二人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分析上，帮助经济学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有创

造能力的经济学家可以运用他们的分析工具，从而帮助他们进一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

总的来说，创造能力是最难培养的，因为这往往是不能训练的。可以训练的一般是规则的、机械的。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中大量的训练是数学性的，以及应用数学解决问题。数学可以训练，但创造力是没有系统的方法可教授的。一般来说，创造力不能训练，只能培养。而培养大部分靠着环境的熏陶，没有机械的办法。

## 经济学的不同教学方法

经济学教育如何培养和训练观察、分析和创造三方面能力，不同西方国家的重要学校和教育制度的安排是不同的。为了把问题看清楚，帮助理解，先看两个极端。

一端是传统的英国教育，它是精英教育的代表，其中又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美国的教育制度是从中衍生出来的，哈佛的制度起源于剑桥，耶鲁也是仿剑桥。牛津和剑桥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其教育特点是培养天才。培养方法是师傅带徒弟，很多人中偶尔会有天才产生。由于天才是不可训练的，而英国传统制度是培养天才，所以不侧重训练，而是侧重创造一个环境，让天才脱颖而出。这个制度强调的是识别和创造天才的环境。英国的传统是一种宽松和充满闲情逸致的学术环境，每天有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喝茶的时间、喝酒的时间。识别的方式不是考试，而是看人有没有能力和别人辩论，表达出新意。谁来评判？委员会。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例如，牛顿出名之前，当时物理还不是科学，而是属于哲学。在哲学的范畴内，他很难说服年资者。当时，在剑桥三一学院中，他很难说服年资者关于他通过光学实验而得到的对光的认识。他们用古希腊的哲学与牛顿辩论，从哲学上驳回牛顿对光学的认识和实验结果。但是实验的结果怎能用哲学驳回呢？当时学者们没有科学的头脑，不懂得科学最终的标准是实验，不是古希腊传统的辩论！虽然微积分是牛顿发明的，是牛顿的重要贡献，但那基本上是从他的直觉中产生的，而不是从数学推导出来的（是莱布尼兹推导出来的）。这些重要的贡献跟英国的教育制度有关，跟他们培养观察能力、把握事情的基本规律的能力有关。在这之下是导师制，没有系统课程，不强调训练。优点是，因为特别强调环境，所以特别能识别天才，也产生了许多天才，如牛顿、凯恩斯都出自

剑桥。历史上,英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人类都有极其重要的贡献,原因与此传统密切相关。缺点是,学生的质量很不稳定,学生好坏之间的差别很大,天才在此制度下可以快速成长,但由于大部分人不是天才,没有训练,水平就会很差,天才与非天才之间会有巨大差距,很多毕业生素质并不好。

另一端是法国的教育方式,强调系统训练,拿破仑时期推广到全法国甚至全欧大陆。拿破仑本人是炮兵学校毕业的,是个很不错的应用数学家,可以根据具体的地点和环境在很短的时间内计算出炮弹的弹道轨迹和距离等等。他很崇拜数学能力,仗打到哪里,就在那里建起理工大学,也就是 polytechnic。所以,和英国传统教育制度比较,法国不是寻找天才。它并非不要天才,而是寻找的方式完全不同,法国式的 polytechnic 是培养精英的制度。其数学训练非常强,给学生进行非常大规模的数学训练,用很严格的考试淘汰的办法来寻找最强者。强调训练,可以产生大批训练有素的人,这一批人都有很强的技术能力。由这些人中产生一些人做经济学。但这种训练方法使得人们比较缺少观察能力和想象力。可以有技术上的创造力,但与技术无关的创造力会有所欠缺。同任何科学相似,经济学的发展很重要的是学者的直觉,而法国式的教育方式往往会缺少直觉。而那些在技术上缺乏能力的天才,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培养体系。比如科斯,在法国式的教育制度下,可能第一轮就被淘汰掉,不能生存。到底是淘汰制还是训练过程扼杀天才呢?更大的可能是过早地被淘汰的方式。

当今学术上占优势的制度是美国顶尖学校经济系及个别欧洲的经济系的教育制度,它介于两种极端之间——一方面侧重系统的数学、理论、方法论的训练,但也不单纯靠考试;同时也提供一系列的环境,刺激学生发展观察能力、创造力和批评能力——观察力包括非常关键的批评能力。批评并不是指负面的意思,而是正面的意思。比如,发展任何一个新的东西,要到处开研讨会演讲,目的——或者说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宣传、鼓吹自己的新观点、新东西,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寻找批评。最好的演讲的地方,最值得做的地方,就是能找到最好的批评的地方。如果无人能提出批评,那么从做研究的角度来说,演讲往往就不是最成功的,不是最有效率的。学术界中,别人对自己有否帮助,也取决于他或她能不能提出好的批评。这是西方学术界的传统,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太一样。批评能力也是观察能力,观察到什么东西是有疑问的、不能自圆其说的。欧美最好的学术机构强调

系统训练，同时也提供环境刺激。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英美体制下产生的经济学家和法国体制下产生的经济学家，一方有想象力，另一方有技术能力。目前在世界上占优势的、最流行的培养经济学家的方式主要集中在美国的经济系，个别的在欧洲的经济系。他们把两种极端组合在一起，对研究生进行数学、统计学、微观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学理论、计量经济学理论的系统训练，以及实证，加上历史和现实经济政策的混合训练。然后，创造环境——用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来激发学生，增强其观察能力和想象力。

## 中国经济学教育——“眼高手低”

对我国的经济学教学怎么培养研究生，我滥用一个词来概括——“眼高手低”。“眼高”，即目标和眼界要高，盯住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要培养出最好的经济学家，能找到最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发现最重要的挑战，鼓励我们的研究生能独立观察的能力，有批判和创造的能力，要发现天才。“手低”，就是说要从做得到的事情做起，尤其是培养学生。什么是做得到的？需要认真讨论。简单地说，中国现有的高考制度严格筛选出来的学生是非常棒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国内最强的，比如北大、南开、复旦、清华等学校的学生的背景和接受的训练可能很接近法国制度。学习法国的训练方式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比较容易做到。这就相当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这一步应该可以做到，至少可以训练。给定中国特点之下的另一条件：经济学仍很落伍，怎么赶超、培养？中国经济学教育应该更侧重严格的数理训练，培养出一支整齐的队伍。从目前具备的所有条件来看，目前阶段最容易做的是偏向法国式的强调训练，特别是数学和统计学。因为中国这方面有足够好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当然，我们还要“眼高”，不应限于这些，要把目标放在培养出有观察能力的经济学家上。

## 经济学的五个“不相关性”理论基准

我把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的最重要内容概要为五个关于“不相关性”的理论基准。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因此不一定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我的全部说法。但是，我表达的精神是很多经济学家广泛共

有的。

如前所述，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具有好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力的核心条件（必要）是要非常清楚地把握经济学的理论基准。经济学最重要的关于制度的内容有如下五个基准：（1）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2）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M 定理）；（3）科斯定理；（4）卢卡斯关于货币中性的理论；（5）贝克尔—施蒂格勒关于司法制度最优阻吓的理论（这是我的见解，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司法制度的理论基准）。把这五个基准弄懂之后，经济学的精华大体就把握住了。这五个基准的共同点是“不相关性”（irrelevant），即每一个都是关于某种制度的不相关性。当然，把经济学概述成五个不相关性的基准是我个人的见解。

第一个理论基准，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个理论意味着经济体制同经济效益不相关。这个理论讨论市场经济时有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一是市场完备；二是不存在不对称信息。在以上条件下才有这个不相关性。这实际上已经远超出一般均衡自身的内容了。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阿罗和德布鲁自己并没有讨论过计划经济，但文献中有在阿罗—德布鲁条件下分析计划经济的，结论是在阿罗—德布鲁条件下，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结果是一样的。阿罗—德布鲁的两个基本社会福利定理实际已经包含这层含义。实际上，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互相关系并不是一个单纯技术上的结果。它们说的是经济制度同效益不相关。即在阿罗—德布鲁的条件下，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并不一定必需用市场经济，用别的体制也可以达到。为了证明需要的技术条件，对于计划经济同对市场经济也是相同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典范，虽然这个定理的假定和现实并不正好是一回事，但它提供了一个基准，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是：任何解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基本差别的理论一定要超出阿罗—德布鲁模型的范围。

第二个理论基准，默迪格利安尼—米勒（MM）定理。金融工具同效益不相关。公司不论用发债还是发股票的方式融资，从利润的角度来看其结果是一样的。MM 定理所设定的基本假定条件是——厂商与投资者间没有不对称信息；股息与资本所得都不征税；买卖证券是无成本的。MM 定理为人们认识金融工具、金融体制提供了理论基准。当金融工具同利润不相关时，金融体制同效益而也就不相关。为了认识为什么现实中不同的金融工具收益不一样，以 MM 定理为指

导,就要寻找现实中是什么违反了这一定理的假定的条件。MM 定理的重要性远超出了公司金融的范围。实际上,货币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工具,因此它同时指导我们认识货币的功能。

第三个理论基准,科斯定理是指导我们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它的结论是:只要交易费用趋近于 0 ,法定产权的最初分配方式同效率无关。科斯定理说,只要定义好所有制,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在现实中,产权的所有制是同效益有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导我们寻找答案的路:什么重要的现实因素违反了科斯定理的前提,使得产权与效益相关。

第四个理论基准,卢卡斯的货币中性理论。这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基准之一。货币中性从狭义的角度看,意味着从长远来说货币政策同经济效益、经济增长无关。从广义看,它意味着金融工具、金融体制同经济效益、经济增长不相关。这是理性预期模型中推导出的重要结论。实际上理性预期理论的假设同阿罗—德布鲁模型是相似的,而阿罗—德布鲁模型中根本就没有货币。卢卡斯模型为理解货币及金融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准。至今经济学家们在为理解货币与金融体制而努力奋斗。有了这个理论基准,人们知道,货币的功能以及金融体制的功能一定在于现实中什么地方违反了卢卡斯模型的基本条件,寻找这个条件就是指导人们寻找理论突破的道路。

第五个理论基准,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BS 模型指导我们认识司法制度。该模型的基本推断是:除法庭以外的执法体制同效率不相关。该理论的直接结论是,一个好的司法体系只要有法庭执法就足够了,寻找其他执法方式没有意义。前提是法律要把什么是犯法定义清楚,把对犯法者的惩罚设计为最优。在这种最优的法律下,假定所有人都是理性的,都懂得最优法律的惩罚,都会推理,所有的人在可能犯法前要计算,比较犯法所得的预期的好处和可能的坏处。最优法律制定得有最优的阻吓力,使犯法对所有人都是坏处大于好处,结果这个社会中人们就不犯法。只要制定的法律是最优的,法律是由独立的法庭执行的,就不存在其他更好的方式。也就是说,执法体制同执法的效率不相关。但是在现实中在最有法治传统的国家也存在着与法院并行的其他执法形式,如政府监管。为了认识它们,我们要寻找哪些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的基本条件在现实中被违反了,这就是基准的力量。

按照我的见解,经济学结晶的内容就是这五个基准。它们以“不

相关”的形式提供了理论基准，指导我们认识现实中最重要、最相关的社会、经济、法律制度。

不熟悉经济学的人们可能会对这五个理论基准产生两种极端误解：第一，误认为理论可以为现实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但是，事实上这些关于不相关的理论并不能提供现成答案。所有这些理论中说的不相关的东西在现实中都是特别相关的，甚至是最相关的。理论的作用是指导性的，理论不是提供现成答案的，简单照搬理论到实际，绝大多数情况都会失败。第二，认为经济学理论完全不现实，或认为理论是依赖假定的，而那些假定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好的假设是理论分析的力量所在，而不是弱点。因为靠发展了这些理论基准才能帮助我们判定在碰到问题时从什么地方入手。比如看到经济体制问题时，阿罗—德布鲁模型告诉你经济体制不相关，它就帮助我们寻找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之外，是什么东西影响经济绩效，比如是否合同不完备、是否有不对称信息。为了研究为何所有制是相关的，我们要寻找是什么东西违反科斯定理的条件。这就是理论基准的力量，理论教给人们的主要就是这个。观察能力中，能够训练的部分主要就在于理论基准，有了“基准”，就知道寻找问题的方向，这就是理论的帮助。

## 经济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人们普遍关注经济学在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经济学的普遍性和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的关系。这里面有两个极端的看法都是不利的。一个极端是完全忽略中国的特殊性，认为经济学是普遍适用的，可以到处照搬。这是对经济学的误解。经济学寻找的是普遍规律。作为理论，一定是抽象的，“抽象”意味着理论必须要离开许许多多经济现象的细节。一个普遍的理论只是给人们提供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思路。所以经济学是为重大问题提供线索的，而无法对所有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另一极端是认为中国是特殊的，所以经济学没有办法应用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但如上所述，经济学提供的是思路，尤其是提供理论基准，用基准帮助我们分析问题。

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什么样的工作是好的工作？大体上有两大重要标准。如果是政策性工作，那么标准是对政策是否有帮助；学术标准则是有无能力解释有疑问的规律性

现象。从学术上讲,标准是在解释中国的现象时,能否给经济学自身带来什么贡献。好的经济学研究,不仅限于研究中国的事情,而是要通过解释中国事情,帮助世界上的经济学家理解新的东西。这是对经济学的贡献。换言之,通过解决特殊的问题,找到普遍解,这是很高的标准。中国是特殊现象,要在这里找到普遍内容,把它上升到经济学,反过来又发展了经济学。这是很重要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另一个问题是跨学科的研究。例如,经济学与法学。经济学与法学看上去可以是根本不同的学科。但在实际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上,两者从来就不是分立的。比如在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只讨论市场怎么运行得好,完备的竞争,从来不讨论完备竞争背后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什么是社会条件呢?所有的合同都能执行,所有分配好的产权都能受到保护。古典经济学根本不用担心这些事,因为假定已经有人在干这些事。这是古典经济学能使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分开的重要假设(条件)。当面对经济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转轨经济的问题时,从一种经济体制向另外一种体制转变,忽略市场以外的因素,当没有这些条件时,古典经济学所提供的结论都变了。再比如说法学,为了定义清楚,往往把经济问题定义出去,假定经济上的东西都能自我运转完美,收窄讨论的范围,只关注法学。每个人都假定对方是完美的,什么样的制度能够运转,一定要别人的条件满足,这是经济学与法学通常分开的历史情况。现在产生了新的学科:法和经济学,帮助两者合在一起。

经济学有好多领域,由此产生了专门化和经济问题的整体性的矛盾。现代经济学专门化趋势的发达,同进入经济学的人数增多是相关的。人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分工。这个专门化对学科的发展往往是有好处的。但同时人们必须认识到这里有代价。代价在于领域的专门化本来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是人为的划分。但是,现实世界不是这样人为分开的。许多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原本是不便分开的。于是专门化可以带来很不好的后果。例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分开的,但现实不是按照宏观和微观分开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货币制度,什么是货币,货币的功能又导致怎么去选择金融制度。在经济学的分工里,讨论货币的叫做宏观,但制度是属于微观的。那么到底金融制度是属于宏观还是微观呢?如果一个学者的领域很窄,所有的人都很窄,微观的只知微观,宏观只知宏观,那么没人能弄懂货币和金融制度。这实际上真有讽刺意味。事实上至今经济学家对货

币的功能是什么仍没有好的理解。经济学家至今还在寻找货币功能和它之所以存在的道理。由此自然可以想象,如果对什么是货币都没有好的理解,又怎么解释什么是好的货币政策和好的金融体系呢?传统上,货币被理解为交换媒介、记账的媒介,这是古老的解释。但这样古老的理解,古老的货币和今天的货币就没有差别了。任何对货币的好的理解要能解释今币和古币的重要的区别。从今天看,货币的重要、核心的功能是在整个经济里帮助解决"广义流动资金"(liquidity)的问题,这是一个决定现代经济能否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由此才导致对货币政策的理解。货币政策是试图调整货币供给来影响整个经济中的 liquidity。如果对货币的功能不清楚,怎么能通过中央银行调节经济中的 liquidity 呢?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把货币供给的变化传递到经济中去?这些至今是经济学中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大量的宏观经济学家把什么是货币这个问题跳过,假装不知,或者从来不知。但最好的宏观经济学家都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要去理解,是不可能用微观、宏观分开的专家做到的。给学生教学时,分开各个领域的好处是可以帮助训练。但帮助面对观察、分析重大经济问题时,这个界限经常要打破,包括做研究工作。研究工作是否定义在一个专门领域里,要看什么性质的工作。究竟是领域内的贡献,还是对整个经济学有基本影响的重大贡献。如果是领域内的贡献,可以遵守界定好的领域,但如果是对整个经济学有基本影响的,界限就要打破。

## 理解比较经济制度的重要性

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如何理解比较经济制度是理解经济学特别重要的方面。当人们谈到比较经济制度的时候,往往以为这个领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比较,而缺少对制度的总体的了解。然后,与之相联的就是如何去改革计划经济。所谓的休克疗法,正是由这种对经济制度无知而产生的。当我们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时,有人说,因为经济学中有很强的假设,经济学是否适用于中国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将此问题返回去看看美国。在美国的经济学家最多,只要返回去看看经济学在美国的情况,就可以帮我们更好地了解经济学和经济制度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最近刚发生的重大的安然事件。经济学家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然事

件？我最近刚参加一个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联席的会议，议题之一就是安然的情况。会议讨论到公司治理结构。经济学提供了许多东西帮助我们理解公司治理结构，其实已经提出了非常好的分析思路，但直接套用，距离还是很远。安然事件表明，简单套用经济学理论解释美国的经济是行不通的，即使讨论美国的企业亦然。所以很难简单地说，经济学是否适合中国，是否因为有经济学中的假设，经济学不适合中国。实际上，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提供的是思想方法、分析方法，帮助我们分析问题。如果人们不去分析问题，把教科书上的经济学搬来作为政策，就糟了。休克疗法就是典型。只要看看休克疗法的提倡者是什么背景就知道了。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研究过比较经济制度，没有研究过中央计划经济，根本不知道中央计划经济是怎么回事，只是从教科书里搬来了经济学结论。这并不是经济学本身造成的。在任何一门学科里，如果只去照搬结论，一定搞得乱七八糟。比如说物理学是最成功的科学，但将其简单地搬到现实工程中，一定也搞得乱七八糟。因为任何一个工程问题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物理学为工程科学提供了基本分析方法，但并不提供现成答案。

无论是公司治理结构课题还是中国经济改革，每一个特定的问题，都有一些重要的特殊因素需要讨论。当经济学家面对特殊问题时，往往没有现成的结论可以从经济学中照搬的。有无经济学头脑，关键在于有无能力去面对问题进行分析。而观察和分析，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了解制度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从中去寻找什么样的假设是合适的，用什么办法去分析它。理解比较经济制度是帮助我们观察、分析问题的重要方面。

# 科学研究的目标:市场竞争还是认识世界
## ——专访许成钢教授

**肖梦**:你的文章"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在《比较》第一辑发表以后很有影响。在我们刚刚出版的《理性的激情——16人访谈》一书中,你的自述特别谈到爱因斯坦的思想对你的影响不只限于方法论,还有他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和职业等问题。其中很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关于致力于科学研究的观点。你认为,深刻的学术发展最需要的不是竞争。为什么?我们如今面对着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一切都在市场化、产业化和商业化,你却告诉我们学术探讨不是在竞争中取胜!请把你的观点说得详细一些。

**许成钢**:我想,爱因斯坦所说的"看灯塔的职业"有利于青年科学家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对科学有真正贡献的总是那些特别能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的人。说到底,什么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必须搞清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认识世界,而不是追求功名利禄。中国在这么一个转轨过程中,都是希望学到最好的东西,这时候也往往容易迷信,在学术领域,简单地把顶尖杂志和一流大学作为竞争或评价的标准可能误导中国的科学研究。这时,我们希望对有心向学的人指出来。

市场在什么时机,在哪一类的问题上,产生的效果特别好;在哪一类问题上,市场产生的效果不一定特别好。其实经济学对这一问题能讨论得比较清楚。一般来说,市场本身能够产生特别好的效果,有这样几个条件:一是没有特别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二是没有市场失灵;三是第三者能确认的情况;四是市场参与者都有无限的认知能力。所以,凡是碰到的问题符合以上条件,在市场上解决,总是效果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讨论到学术、艺术、思想等这些问题,往往严重违反上面

所说的这些条件。比如学术，尤其是最有创造性的那些贡献，一定意味着在它刚出来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作判断，大多数人即便是所谓的专家也没有能力去判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不能很好地运作。

市场特别重要的运作方式是排序和评比竞争的机制，通过评比和竞争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给工作最有成效的人最高的奖赏和回报。但这往往与最需要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有冲突的。因为可评比的、可排序的、可竞争的内容通常是相似的，非常不相似的东西之间很难竞争、很难排序。但是“创造性”的基本含义就是要多样化，要有不同。最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其基本性质就意味着跟别人不相似，如果把科学研究都压缩到相似的领域，或者类似的领域来竞争的话，会引导许多人做相似的工作，做低水平的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和人家比。

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说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对自由有压制的社会里，什么是自由无需解释。专制压制自由，当然会扼杀创造。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对于什么是自由，人们就不是认识得很清楚。在竞争特别激烈的情况下，竞争可以变成限制自由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因为把研究的目标定在竞争取胜上，就意味着你不是以探索的兴趣决定你要研究的问题，而是要做别人都在做的事，努力在别人都做的事上做得比他人好。既然竞争的一个条件是能竞争的东西一定是相似的，创造性是很难竞争的，因此，当一个机制特别依赖竞争，就一定特别引导人们去做相似的、趋同的东西。所谓的顶尖杂志、顶尖大学等等的排序就意味着竞争。研究领域划分过细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领域分得细，人和人之间才能评比，论文之间才能竞争。宽了以后怎么比啊？跨了学科你不就不能跟别人比了吗？不好比了，你就不参加竞争了，只有参加竞争才可能得第一，不参加竞争就一定输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当竞争机制在研究领域里变得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它会很伤害创造性。在创造性工作无所谓的社会里，竞争可能会增加效益，会让大家工作努力，但这个社会的学术会下降，长远的发展会受影响，会变得特别单调，没有色彩。

**肖梦**：对于国内青年学子来说，是否更重要的是要认真地做基本训练？能够在一流大学毕业，在一流杂志发表文章，这毕竟是能让别人承认的一种参考标准。难道你们不是如此吗？

**许成钢：**单纯以杂志的排名和学校的排名作为竞争目标或工作目标，这正是我所说的迷信和误导。学生入学一定要上排名靠前的学校，文章一定要发表在排名第几的杂志上，用这个来证明研究水平和学问高低，都是把研究性工作、创造性工作和知识性工作庸俗化。这种庸俗化实际上是极其有害的。害处之一是它的反映不真实。历史上的例子太多了。就讲最近的例子，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弗农·史密斯，他的研究从未在所谓第一流大学，而一直是在亚利桑那大学，退休以后到了华盛顿附近的学校。为什么所谓第一流大学看不出他这么重要的、可能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呢？没有人能看出来啊，对不对？因为他与当时的主流不同！怎么能用学校的排名来说明人的真实水平和能力呢！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当年爱因斯坦毕业的那个学校也不是最了不起的学校，他做出“狭义相对论”及“量子论”等重要贡献的“奇迹之年”，根本不在大学里，而是在专利局当小雇员的时候。爱因斯坦离开专利局以后在几个并非“顶尖”的大学教过书，然后才被普朗克看中挖到柏林去了。因为他有了成就普朗克才把他挖过去的，不是因为他的学校好他才有了成就，正好倒过来了。普朗克是位了不起的物理家，在物理学上影响特别巨大。量子力学是玻尔为中心的哥本哈根学派的贡献，那个学术机构原本也并不特别重要，最后变得重要是因为他们有这么了不起的革命性想法。最杰出的研究贡献与研究者是否在第一流的机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紧密的。经常是因为某个杰出的学术领袖使得追随者聚集，使其机构变得重要。另一个例子是卢卡斯，卢卡斯革命的起源在卡内基—梅隆，并不是最顶尖的学校。后来是芝加哥看出了这个凯恩斯以来宏观经济学的“卢卡斯革命”，把他延揽门下。如果再说清楚一点，顶尖大学是可以培养和训练出好的做积累性工作的人，这的确有影响，你可以从周遭的人那里学习，并再做一些积累改进。但是重大的革命性的想法，并不一定从这里出来。

所以，学校的排名次并不能简单说明其中某个人的水平，杂志排名也并不能说明其中某些论文的研究水平。

历史上不同领域里就有许多例子。就拿经济学做例子。阿克尔洛夫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是被最好的经济学杂志拒绝了好几次的，我的印象里是他第四次投稿才被接受的。阿克尔洛夫当时还是一个没有拿到“终身”教授的人，由于他的这篇论文反复被拒绝，严重打击了他的信心，使他几乎要放弃这个研究方向了。这些所谓的最顶尖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根本没有能力判断这项研究工作的价值。因此，这也

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的顶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并不一定是第一流的。还有一个例子是罗伯特·卢卡斯，他得诺贝尔奖的最主要的工作，也不是发表在最顶尖杂志上的，而是发表在《经济理论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ies)上的。我们还可以举比这个更让人感到震动的例子，比如说，科斯没有一篇论文是发在顶尖杂志上的，要是按照如今通常学校的评终身教授的标准，科斯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好学校得到“终身”教授位置。再往极端来说，他甚至不可能在一个好的学校得到一个教书的位置。另一个和他有点相似的就是诺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也没有一篇文章发表在顶尖杂志上。科斯的文章贡献特别巨大，但是他的影响却是经过几十年后才显现出来的。他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文章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杂志上，从来也不是最有名的杂志。如果用简单的杂志的等级来判断的话，就会发现有这么多重要的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的重要文章，当初是不能发表在顶尖杂志上的。这本身说明了评审人没有能力及时地识别出一流的研究工作。之所以他们不能识别，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因为这些是创新，这些创新与人们已经认识的东西不一样，同人们已经习惯的不一样，所以没办法评估。

其实我们离开经济学看其他的领域，情况也是一样的，甚至包括艺术。美术领域评比的重要机制是定期办画展，在巴黎，只有被评选进某些画展才被认为是最好的画家，否则就不可能被承认。科尔奈跟我讲过一个很著名的事件，由于画展评选制度挑选很严格，许多作品被淘汰了，因此有人办了一个被淘汰作品的画展，其结果那次被淘汰作品的画展远为成功，远为有影响。道理很简单，由于评审者很保守，只有平庸的作品才能入选，结果是具有新想法的、前卫的被淘汰作品的画展必然超过思想平庸者的画展。

当年爱因斯坦的文章都没有发表在同行审稿制的“顶尖杂志”上。但他的工作的影响是那么巨大，是他改变了人们对整个物理世界的看法，至今人们还在追随着这个，至今那些最顶尖杂志所发表的文章大都是追随他做详细而细致的研究。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到了美国以后的故事，1936 年夏天他提交给《物理学评论》一篇论文，按制度他的论文要接受匿名评审，评审人要求他大幅度修改他的论文，他很生气，他说评审人根本没有看懂，为什么我要按看不懂的人的意见修改我的论文呢？然后他就写信给编辑说，你或者就按原样接受我的论文，或者我撤出我的论文，我不改。因为是他，编辑就发表了，否则一般人就

不可以发表了。评审人制度要求你改，你就得改，其实许多评审人可以是水平很低的人，说的话可能是很荒唐的，但是在这种制度下作者必须尊重他的意见。科尔奈本人也有一例，两三年以前，他的一篇论文提交给《欧洲经济评论》杂志，评审人要他大幅度修改，他给编辑写了一封信：你或者听他的，或者听我的。你要听他的，我就不发在你的杂志上，我为什么要同意他的意见呢？我不会改，因为原则是文责自负，他又不负责任，我是要负责任的，那为什么要按他的意见改呢？

**肖梦**：爱因斯坦和科尔奈都是大名人了，他们可以对一流杂志的编辑这样说话，但对那些还没有出名的人来说，不就意味着不委曲求全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吗？

**许成钢**：的确如此。在西方学术界，在没有成名之前，拒绝评审根本不能生存。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你想不想这样做，有没有胆量这样做，而是能不能生存。你这样做了就意味着你一篇文章也发不出来。在我看来，这是当前学术界所面对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之所以现在的学术界和过去的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差别——所谓过去，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那时候学术中心基本不在美国，而在欧洲，大多数学术杂志也没有这种性质的评审制度——之所以后来变成这样子，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规模培养博士造成的。大规模培养博士以后，使得从事职业研究的人数突然大幅度上升，如果杂志没有相应增加比例的话，每一个杂志突然面对投稿量增加太多，因此，如何保证稿件质量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件大事。为了保证稿件质量，寻找到的一个办法就是评审制度。这就像考试制度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同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受高等教育相关。现在不但受高等教育，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念高等学位，这么多的人要去念Ph. D，导致了需要考试。比如，在没有美国大规模培养博士之前，英国的制度并没有这么多人要念博士，而是已经从事了多年的经济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后，有了成绩，再去拿一个博士学位。只有那些认为自己可能会有成就的人才去从事职业研究行业，否则他不从事这个行业。这样，他可以有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自我选择的结果是只有比较少的人，事先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才去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现在的制度和过去相比顺序倒过来了，如果拿不到博士学位就不可以从事研究工作，不可以教学。因此，特别多的人在研究什么都不

清楚的情况下，就选择了要做研究的职业生涯，其实他是否适合并不清楚。但是受了大量训练以后，就变成好像所有人经过训练都可以写论文，写出来的论文质量当然参差不齐，挑选自然就变成非常严重的问题了，于是评审制度就变成一个重要制度了。实际上，大规模培养博士和杂志的评审制度两者是相互联系的，是造成评审制度的条件。

使用了这种评审制度之后，会反馈回来影响科学研究的质量，它对科学研究最关键的影响就是特别鼓励那种在大量积累基础上改进性质的工作，不鼓励特别创新的工作。如果我们把20世纪50年代以及以前的科学和50年代以后的科学放在一起作比较，我们就能看见，20世纪前半叶科学的重大突破远超过1950年以后，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是如此。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测，虽然我没有做过系统的调查，也没有系统的证据。物理学就不用说了，50年代以后没有一件性质上可以与此前相提并论的突破。比如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所有这些都是20世纪早期的。生物科学最重大突破就是双螺旋结构，也是在50年代及以前。人们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有突飞猛进的重大发展，是的，但是什么性质的呢？基本是改进性质的，大量的积累前提下的大量的改进。认清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就是整个学术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研究的制度也随之变成以美国为中心。原本科学研究的中心在欧洲，欧洲有自己的传统，英国有自己的传统，它都有历史上积累的几百年形成的传统，传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德国在它过去的制度下产生了那么多哲学、艺术、科学各个方面的杰出学者，现在怎么几乎全没有了？所以，我有一个很重要和很有意思的问题，当年爱因斯坦的时代，那个制度下，产生的伟大科学家不是他一个人。如果人们去洪堡大学看，那么小的学校，四五十个得诺贝尔奖的人同时在那里工作，满墙挂的都是得诺贝尔奖的人的相片。当然，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之间也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只有少数是重大的开创性的。而当年在洪堡的这些获奖者中许多是贡献巨大的。我关心这制度是怎么回事。从表面上看，当时德国的科研制度与现在相似，那种制度与美国是非常不一样的，每一个教授都有很大的权力，都掌握着很大的资源。当年这个制度的好处现在可能变成了坏处：当年因为每一个教授都很强，他一定要找强的人到他的团队里去，于是就导致了其制度变得很强；现在由于教授的权力很大，他自己水平却很差，所以专门找水平比他还差的人在他的实验室工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大量优秀人才出走或遭受毁灭，德国把它已有的

传统打破了，一旦传统被打破就很难恢复了。英国的学术制度也是如此，英国当然不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面对美国的竞争造成的。美国学术机构提供的钱太多了，于是有能力的人都离开去了美国了。原本英国的学术制度下不是所有人必须念博士才可以教书和做研究，直到我到伦敦经济学院教书的时候，我们系里还有若干教师是没有博士学位的呢！他们现在逐渐退休了，你可以看到过去运转得其实挺好的。

当然，我没有简单地得出结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的科学研究比以前差了，但是特别大量的积累性工作做出来了，这样的工作是过去那种研究制度下很难做出来的，要有许多人一起来做，就只有培养这么多博士。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样一种制度更强调的是“因循守旧”——这词也许有点太强，沿着已有的东西走，不是最鼓励革命性的创新，因为很难发表。人最有创新能力的时候是年轻的时候，而这个制度不鼓励创新，如果你创新就很难发表，很难发表就不能在学术界生存，这人就出局了。只要你想在学术界生存，就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沿着别人已经有的东西做一个巧妙的改进，而不是重大变化。这就造成了巨大差别。所以，如果是一项技术上改进性的工作，在大量的积累上的改进，这就很容易被评论。这样的制度更鼓励做积累性的改进，而对重大的创新的工作，这种制度就不是好的制度了。

**肖梦**：太有意思了，你的话让我想起科尔奈在“制度范式”一文（《比较》第一辑）中提出的美国一流大学所训练的人的局限：他们不存在睁大眼睛的惊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他们也不会自愿开阔这种知识，因为这样做不会有很大的价值和回报。所以对于如此巨大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他们基本上没有兴趣，以致错过了最大的实验室。他们只是关注着自己的所谓主流的惯例。这是否也就印证了你所说的美国的学术制度不鼓励做开创性工作而只重视做那些积累性工作呢？

**许成钢**：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分工过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分工过细本身是和大量的人进入科学研究，以及和大规模地培养科研人员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制造东西也好，还是制造人才也好，只要是大规模制造，为了提高效率，为了保证质量

标准，一定要细分化，生产要专门化，生产产品要标准化，生产知识要标准化。但是，产品标准化也就失去了个性，所有的产品都长得一个样，没有艺术的特点。生产知识标准化以后，与此一样！也是没有特点的，也许产品没有特点人们还可以忍受，可是如果知识都是标准化的，到底这个知识意味着什么？问题就出来了。从某种意义上，由于要大量生产，就需要标准化，但是把知识标准化，就和需要知识的创新自相矛盾了。尤其当我们讲的不是中小学教育，不是普通大学本科教育，讲的是高级人才，目的是为了让他能创造。由于培养的方式是标准化的，由标准化的方式培养出来的人去做杂志的评审人，杂志也相应地标准化了，这意味着整个制度是与创造性相矛盾的。我希望人们能够看到这个问题所带来的后果。虽然，我们尚没有能力设计出一个更好的制度，但这里我所强调的是，为了要设计一个更好的制度，要先看到问题。人们应该去想，为了要去想，就要先知道现在这个制度里面存在什么毛病。

科尔奈所批评的美国一流大学出来的经济学家到转轨国家去如同“客座明星”，我劝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不要迷信美国的顶尖杂志及其发表的所有论文。这都是基于我观察的实际情况。绝大多数的顶尖杂志都在美国。因此，一篇论文如果讨论的是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中国特点的问题，就常被认为是特殊的地区问题，而如果你讨论的地区问题有很强的特点，往往就被看作是一个更小的问题了，就有相当多的在美国的经济学家会认为这不是重要的经济问题，也不是普遍的经济学问题。所以你要花很大的力量来为自己辩护，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这些所谓的顶尖杂志由于其评审人普遍持这种观念，针对中国的重大问题，即便是深刻的讨论，也常常难以发表，虽然，必须承认我们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还做得不够好。举个具体例子，软预算约束其实是所有计划经济和所有转轨经济都面对的重大问题，把这些经济加在一起，比美国经济大，而且这些现象在美国也是存在的，但这个问题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眼里不被认为是普遍的经济学问题。软预算约束问题在转轨经济以来，虽然已经开展研究并被普遍化很多了，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顶点，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不愿深入研究它。所谓的顶尖杂志其实有很大的偏颇，认为什么是重要问题，什么不是重要问题是随大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立足于中国的中国经济学家，如果眼睛只盯着那几个所谓的顶尖经济学杂志，那么他对经济学的认识一定

特别偏。如果这边中国的学校在评他们职称的时候，还要求他们一定要在那种顶尖杂志上发表文章，其结果就把对中国的研究搞坏了。因为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很难在西方顶尖杂志上发表，逼着许多经济学家不研究中国所面对的重大问题，而被迫去研究西方的经济问题。这是很糟糕的。举个例子，以色列的经济学家，普遍在美国的顶尖杂志上发文章。这些以色列的经济学家，人坐在以色列，研究的基本都是美国问题，他们用业余时间做一点点以色列的事情。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有这么多天才的经济学家在那里，所以利用他们的业余时间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够了。但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又没有这么多的天才的经济学家在这儿，而我们这里的经济学家，需要用主要的时间研究中国经济中所碰到的重大问题，不应该让我们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最强的人，都去研究美国的事情。如果非要让他们都在美国顶尖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们就必须要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美国去了。这是现实情况。所以，我们国内看待所谓西方顶尖杂志的时候，一方面要学习它里面好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还要看出这个制度里面存在的问题是什么，里面存在的问题尤其不利于中国的学术界。

我发现国内有很强的关心排名次的风气，尤其面对年轻学者，如今应该及时给泼点冷水，让大家脑子清醒一点。有大量获诺贝尔奖的工作没有发表在排名最高的杂志上，有许多许多最有影响的科学家没有在排名最高的学校教书，不要光看排名，要看学术的实质。要看什么是学术的贡献，哪些思想是重要的，哪些贡献是重要的。因为任何学术工作，归根结底讲的是贡献，贡献的意思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学术工作归根结底不是排名，是不是？

**肖梦**：可是我们面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商业化环境，也许还有个别的艺术家不受影响，在那里守持他们内心的骄傲与寂寞。你让学经济学的青年学子拿看灯塔的人的糊口的工资，去孜孜不倦地追求学术探索，是不是有点太理想主义了？

**许成钢**：你提的这个问题正好是我想强调的，作为科学家，作为艺术家，他们必须有理想，理想主义是能够做好科学工作和艺术工作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和素质。对于没有理想和激情的人，追求的是立即出名、立即挣钱和立即得到社会地位，或混日子，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讲，理想主义是一个必要条件。虽然

不是对于每一个人它都是必要条件，但是对于科学和艺术，要想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理想主义是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一点理想主义，对科学和艺术的伤害就很大。如果周围的许多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那么他会得到启发和熏陶，就会发展科学。中国历史上为什么科学家那么少？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学术变成了追逐名利和功利的工具。任何人在开始做学问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不是认识世界的兴趣，而是为了升官。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的时候反对科举制度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科举制度跟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非常像，念书的最终目的是要做官，念书的第一直接目的是要考试，考试才能考出一个官来。在这种制度下，人没有创造性。如果整个国家的学问全部建筑在名利上，那么这个国家的学术就很难有发展。讲到反对科举制度，现在似乎没有很大争议，但是单纯强调竞争和通过竞争获得哪怕是学术界的地位，实际上与科举制度很相似。竞争本身可以是一个损坏创造性的机制，这个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现在可以把科举制度改一下，改为得“诺贝尔奖”。科学研究的目的应该根本不是为了得奖，科学研究最终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如果要说竞争的话，那个竞争不应是竞争社会地位，而应该竞争研究的问题更深入。所以人们根本不需要迷信得诺贝尔奖，榜上排多少名。

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个好的学者，他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刚才讲的那些都属于现象，最终的实质性问题是追求什么。作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追求的是对世界的认识，对经济现象的认识，而不是在什么地方教书，不是在什么地方发表文章。当然，每人都要面对自己的现实问题，如果你不发文章可能你的教职就要出问题。所以，我想强调的另一个要点是，对于年轻的学者，对于有可能将来成为以研究为职业的人，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好的制度、好的机制，来帮助我们中国的学术前进。这样的制度或机制第一要强调的是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在哪儿教书，不是他本人的地位，而是他的认识。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提高人们认识世界的程度，贡献指的就是这个。

我想，实际上在任何社会里，真正追求精神境界的，追求学术成就本身的总是少数人，追求真正的艺术，追求对世界的认识的总是少数人。制度本身是很重要的，当制度设计得特别不利于这些人的时候，这个制度会进一步扼杀它。所以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使得这样的少数有追求的人能够生存下去。如果一切都是在竞赛的情况下，逼着所有

人都去竞赛，都去排名次，最后就把这些人都扼杀掉了。科学归根结底不是竞赛而是认识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是要说清楚的。比如，国内人们经常议论哪位小提琴演奏者在国外比赛得了第一，哪个钢琴家比赛得第一，但是最好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之所以“最好”不是因为他/她比赛得第一，归根结底是艺术上的成就，是艺术上的理解和艺术上的造诣。曾经比赛得过第一会有一些帮助，帮助别人认识他，但最终靠的不是这个。科学家更是这样，绝对不是说，哪个人在第一流杂志上发表了多少篇的数量，由数量推出谁是世界第一。如果我们计算发表论文的数量，过去 30 年哪些人发表文章的数量是第一的，实际上都有记录，所有这些在顶尖杂志上发表文章数量最多的，没有一个得诺贝尔奖。相反，多数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在顶尖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字是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的。在学术上有重大贡献，和在第一流评审杂志上发文章最多，是不一样的两回事。看问题是不是深刻，对世界的理解是不是深刻，与发表文章数量多少不是一回事。

当然，我需要指出，在任何成熟的学术领域，如经济学，创造新的和批判已有的必须是基于对已有的文献、已有的理论事实的透彻的理解。没有这个基础去“创造”或“批判”，则很难成为科学研究成果。

理想主义的精神是必须发扬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能否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让那些追求理想和探索世界的人生存下来。就拿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哥白尼的例子来说，中世纪的意大利之所以可以产生哥白尼，是因为教会办的研究机构把一些科学家、艺术家养起来，由于有这样一个专门养一帮人来研究天文学的制度，这些人并没有商业上的压力，他们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理解世界的目标。一方面因为哥白尼的学说颠覆了那个时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而受到了教会的迫害，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样一个制度，让他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去做研究。当然这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哥白尼的价值观念是追求名利，他就不会安心坐在那里研究，他要追求地位的话，就应该赶快想办法变成牧师或教主，因为他有追求理想的价值观念，所以才坐在那里冷静地思考和研究，创立了《天体运行论》。

**肖梦**：与上个世纪前半叶来比较，对那些有学术追求的人来说，环境是今不如昔。我特别羡慕哈耶克的那个时代，他常常参加跨学科的沙龙，讨论的都是实在令人着迷的大问题。现在商业化深入到我们

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让人的心灵有所安静。它不仅扼杀天才产生，同时可以把天才断送。我甚至认为，商业化对思想的迫害要大过专制，在专制的苦难之下，天才和执著的思想者，不肯放弃压制而不断追求，越压迫越勇敢。

**许成钢：**只不过你这话要讲到这个程度了，经济学家会说，“拿证据出来。”我们说，学术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任何一个民族在精神上健康发展的基础”（引号内是爱因斯坦语），专制对个人自由表达意见的压制和摧残一定会对整个社会发展造成巨大伤害。对于非专制的国家，实质上对创造性也会造成伤害，只是方式不同，你还有选择权，就是这竞争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可以不参加竞争。反正商业化和竞争对思想和创造性的破坏是可以从根本上避免的。如果一个艺术家，一个学者年岁很轻的时候，就上了竞争的轨道，脑子里的兴奋点永远在竞争，永远在于他要和别人比第一，而不是考虑深刻的问题，就不会有了不起的创造。我已经反复讲了好几遍了，创造和竞争不是一回事。爱因斯坦在晚年曾经有过一些精彩的谈话，与你说的内容直接相关的。爱因斯坦说过，“青年人被灌注过分渲染的竞争精神，被教育成贪婪地渴望成就，并且以此来准备他们以后的职业生活”是“资本主义带来的最大的祸害”。他非常憎恨年轻时在德国的教育，这个教育制度特别强调竞争，给学生特别重的压力，他那个时候要窒息了，几乎都要丧失了对科学的兴趣。这很重要，像他这么天才的人，在巨大的压力下也会丧失对科学的兴趣，那世界就没有相对论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他打了个比方，一个年轻人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就像一头捕获猎物的野兽，如果拼命给野兽喂食，它就不会有兴趣捕获猎物了。

实际上，现在学生面对的竞争和压力远比爱因斯坦的时代大，所以我觉得他讲的其实给我们一些启发。为什么那时候出的科学贡献比现在多，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有心向学的年轻人的科学研究最终的动机是为了理解，科学研究的价值是让探索的热情驱动自己。

**肖梦：**那会不会造成这样一个悖论：科学和研究不就成了自娱的东西，而不是造福于人类？

**许成钢：**科学本身并不总是直接从物质上造福于人类，而主要是

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任何做科学研究的人，脑子里要清楚，你对认识世界的贡献最终会帮助大众，有的也可能有物质上的贡献，可是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不总是立刻就能被人接受的。科学和市场的目标可以是非常不一致的，甚至是可以有冲突的。市场要追求大众所喜欢的东西，而科学研究追求的是深入和彻底。我这话讲得很抽象，实际上历史上的例子就多得很了。一个好的例子是哥白尼，他是冒了危险来理解世界的。如果科学家的目的是为了立即讨论大众的话，那么科学根本不会走上今天这一步。在市场上运作的东西一定是可以在市场上拿来卖的，大众立即喜欢才有商业价值。好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虽然最终会对大众有益，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被大众接受。而在市场上，为了追求商业价值，所以要见效快。但是快，对科学研究并不总是最重要的。

在现实中，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对最深刻的研究结果，或伟大的艺术作品也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认识其价值。例如，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在活着的时候其价值都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死了以后才被认识。如果这些艺术家，追求市场价值，服从市场竞争的压力，他们就只好放弃自己所追求的美的目标，那么我们就永远没有这些艺术瑰宝了。比如梵高，当时他所处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富有和市场最发达的国家，当时的艺术品交易在欧洲已经是洲际范围的了，但是没有人欣赏他的作品。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市场在这样的领域并不能判断出最好的东西。如果艺术家、科学家脑子里想的都是商业价值，想的是立刻要出名，要和别人竞赛，等等，当发现他的东西不被大众接受，没有市场价值，就会放弃，就会去做容易被别人接受的东西，那么最后剩下的能够被人接受的都是商业性的“艺术”品，研究都是立即有实用价值的，那么，像梵高这样伟大的艺术家和像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就不会产生了。实际上导致我们人类最伟大的科学研究成果、最伟大的突破都不是从立即的商业价值引发的。这些科学成果的商业价值的实现来自人们对世界的深刻认识。

说了这么多话，听上去好像我特别反对竞争，反对排序，如果这对于科学研究这么不好，为什么现实中又用得这么多呢？特别是在西方，以美国为首的社会里，为什么竞争、排序和评比这么重要呢？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通过竞争、排序和评比为外界提供信息。本来科学研究自身的性质并不是这样的，但由于它面对资源限制，包括学生的质量和物质资源等问题的时候，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就启动

了。虽然科学研究本身的价值不是为了立即讨大众欢喜，学术机构却需要大众关心，需要金钱，所有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的。怎么能够把人们不熟悉的东西传到外界？市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找到的一个办法：用评比、排序和竞争为学术以外的社会提供信息，实际上其质量可以是非常低的，经常是不可靠的。而且这样的方式经常误导人们过于依赖这样的信息，误导年轻一代学生或研究人员研究问题的动机。

我之所以特别要强调竞争和评比可能带来对学术研究的伤害，原因在于，在这里我们讨论的不是面对如何把科学研究的信息传递到外部和外行，而是讨论怎样培养新一代的、年轻的科学家。对于打算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引导他们该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工作。这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因为竞争、排序等等实际上是面对外部的，不是对内部的，内部和内行本来不需要凭着排序来告诉他，什么人什么研究工作是最好的，如果他是专家，应该凭他自己对于本领域的了解作自己独立的判断。因为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发展，如果大家都是一窝蜂去排队，或者如果研究机构和大学都把排序作为评判研究者唯一的标准和指标，那对科学的发展会非常不利，会严重影响科学工作者做研究的动力。

我认为，有没有一个追求理解和认识世界的目标的价值观是很本质、很主要的。缺乏学术兴趣是学校里以及研究机构里最大的麻烦。学术兴趣当然同制度有关。中国过去的制度是科学院制度，从苏联学来的。苏联科学院制度是从欧洲大陆学来的，有很多有益的成分，而这样的制度和过去教会研究机构的制度有相似之处，由政府出一笔钱，养那么一批科学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科学院的制度过去也不是很有用，这里，重要的原因跟价值观有关系。这个制度里有晋升制度，当然还有政治运动等等。这就打乱了人们追求理想的观念，扭曲了追求真理的行动。但是，自从政治运动过去后，出了新的麻烦：研究机构变成了半商业的机构，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扭曲了科研工作者的动机，人们都去找挣钱的项目，研究变成了“准商业项目”！另一个重要的制度是西方大学的终身教授制度。其实大学里的终身教授制度有可能把人养起来，使他没有竞争的压力，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仅仅依靠这个制度本身是不够的，现在西方的研究机构都是在市场上运行，每一个得到了终身职位的教授仍然面对着市场，对于没有探索热情的人来说，这样的制度并不能引导深刻的科学研究成果。

对于任何人，如果他对科学有强烈的兴趣，他想要做科学研究，在他脑子里要建立起来基本的科学探索的价值观。价值观到底是为了理解世界，还是在市场上赢，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我想这是很基本的东西。此外，杰出的科学家总产生在大批对科学有狂热兴趣的年轻人当中，所以必须在年轻的时候使这样的价值观在一部分人中生根，鼓励、培养他们的好奇心，探索的兴趣，批判的精神，树立“为了认识世界而不是为了市场价值”的价值观。

总之，深受爱因斯坦学术精神的影响，我认为，最深刻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动力，是研究者对学术探讨的无止境的好奇心，而不是在竞争中取胜。实际上这是个普遍的道理：竞争并非对所有的领域都是最重要的。经济的发展需要竞争。但历史上绝大多数最伟大的科学、艺术的成就不是受竞争所驱使。相反，庸俗化地全面推行市场会误导年轻人。

#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田国强
（德克萨斯 A&M 大学经济系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近些年来，不时看到有人从研究方法到结论对现代经济学大肆进行批判，否认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并宣称要创造出自己的经济学。但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往往只给出了观点，既没有明确的前提假设条件和分析框架，也没有逻辑推理和严格证明；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数据作依据，又不引用基本的经济理论，随随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将所谓“自己创新的观点”的作用无限放大。另外，我们还不时听到有人耸人听闻地宣称：自己或某人的理论对现代经济学造成了冲击，他们往往用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来否定现代经济学。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大众以及学生。

不少人还以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只能用来研究规范市场制度安排下的经济问题，从而对现代经济学以及它的分析框架和适应范围持怀疑、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认为不能用现代经济学来研究中国经济及其转型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西方经济学”一直是“现代经济学”最流行的代名词。许多人直观地认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仅适用于“西方”社会，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研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东方”经济学，甚至“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持有这些观点和说法的学者中还有一些著名的“海龟”经济学家，由于他们的海外留学背景，使得他们的观点更具有误导性。笔者认为，其实是这些人对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还没有弄清楚，不知道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

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这些观点和说法误导了不少人,特别是对现代经济学还不太了解的人。并且,由于相对其他学科,经济学与经济社会更休戚相关,甚至会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制定,因而非常有必要正本清源,讨论清楚。

当然,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现代经济学主要研究现代市场制度,而大多数外文教科书的作者和读者对象都生活在市场经济制度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中,这些教科书一般也不讨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另外,由于现代经济学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理论,许多理论似乎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其中不少理论还用到了高深的数学,这些让不少人感到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难以把握,从而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误解或畏惧。在他们看来,现代经济学似乎高深莫测,难以理解其中许多似乎不一致的理论结论。

笔者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学习、讲授以及研究现代经济学的一名学者,经历了对现代经济学从无知到有所悟的过程。写作本文的动机就是为了澄清对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一些误解,帮助读者理解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讨论它们在学习、研究乃至日常工作中所起的现实作用。它们看似简单,但人们对现代经济学的误解,往往正是没有弄清楚这些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包括钱颖一、林毅夫及笔者本人,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作过一些讨论。但谈及分析框架的,笔者只见到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这是一篇非常值得一读的文章。尽管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与钱文所讨论的问题基本相同,但侧重点不太一样,分析框架的划分也不太一样。本文特别对现代经济学中每一个理论基本上所共有的分析框架作了较详细介绍,并且讨论了其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现实作用。钱颖一教授和笔者的两篇文章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可结合起来看。另外,文中有些内容在笔者的讲义、书和一些文章中也零散地讨论过,见田国强、张帆( 1993),田国强(1996)及 Tian( 2004)。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节讨论掌握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第二节介绍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基本组成部分。第三节讨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所要注意的要点。第四节讨论现代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的具体现实作用。第五节总结本文,并给出结束语。

## 掌握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及人们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问。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的欲望的无止境性这一对基本冲突才产生了经济学，逼迫人们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资源，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而现代经济学则按照科学的方法并运用分析工具——通过观察、理论和再观察——来系统地探索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它是一门科学，代表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种系统探索，既涉及理论的形式，也为经济数据的考察提供了分析工具。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通过60年的蓬勃发展，现已成为一门规模庞大、分支众多、体系严谨、模型化的社会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了解并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正确理解和学好现代经济学以及对现代经济学的创新和应用都十分重要。它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不同经济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及不同制度安排下的各类经济问题。经常听到有人批评现代经济学存在着太多不同的经济理论，觉得经济学流派观点各异，不知道孰对孰错，甚至有人借此讽刺经济学家，100个经济学家会有101个不同的观点和说法，从而否认现代经济学及其科学性。其实他们没有弄清楚，正是由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才需要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模型和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学家之所以对于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恰恰说明经济学的严谨和完善，因为前提变了，环境变了，结论自然就要相应改变，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的“好”结论，否则就不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在这里请读者注意：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绝不是不同的“经济学”；创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所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现代经济学中的不同学派、不同理论本身就说明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由于不同的理论采用了不同的假设和不同的具体模型设定，它们可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并能在接近理论假设的各类经济环境下，给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或进行

科学的预测与推断。因而，要批评现代经济学中某个理论，就需要指出理论中所刻画的经济环境和人的行为假设中哪些地方不合乎实际，模型设置中有哪些地方不甚合理，所实施的经济机制或经济制度安排存在什么问题，逻辑推理又有什么问题。即使如此，这样的批评也不能导致对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否定，至多只是需要修正对制度环境的刻画和行为假设条件的设定以及理论模型的设置，但是仍然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并得出新的合理结果或经济理论。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分析原理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从而中国实际经济环境下的各种经济问题也可通过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用来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事实上，这正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威力和魅力所在：它的精髓是要人们在做研究时必须考虑到，并界定清楚某时某地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条件。现代经济学不仅可以用来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风俗和文化的人类行为（无论自私自利与否）下的经济问题和现象，它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甚至也可用于研究其他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决策，特别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与管理方面的决策。事实证明：由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一般性和规范性，在过去的 20 年里，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分析方法和理论已被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人文学科等学科。

本文不想对经济学中的某个具体理论作出讨论和价值判断（这并不代表笔者个人没有这样的判断），只是想指出几乎所有的经济现象和问题都可以通过下面所介绍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和比较①。

---

① 当然，许多经济问题也可以通过经验性的定量分析来进行研究，下面在讨论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的作用时将简要地讨论一下，但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主要讨论对一个经济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时所用到的基本框架。

##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类似于人们处理个人、家庭、经济、政治、社会各类事务时所采用的方式。大家知道，要做好一件事情，与人打交道，首先要了解国情和民风，也就是要知道现实环境和所要打交道人的品行和性格；在此基础上，决定相应的待人处事规则，从而在权衡利弊后作出激励反应，争取达到尽可能最佳的结果；最后对所选择的结果及所采用的规则进行价值判断和评估比较。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完全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研究经济现象和人类行为的。这种分析框架具有高度的规范性和一致性。它首先给出想要研究的问题，或想要解释的某种经济现象，即经济学家首先需要确定研究目标，然后试图回答所要研究或所要解释的问题。比如，下列问题是现代经济学直到现在仍在试图研究或回答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周期和经济衰退？面对经济周期和经济衰退，政府应采用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一些国家非常富裕，同时另外一些国家却非常贫穷，而不是整个世界同时富裕起来？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市场制度安排是如何运作的？它有什么样的优越性？市场在什么时候会失灵，如何解决？如何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是通过政府干预，通过明晰产权的办法来解决，还是通过其他办法来解决？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解决经济人的激励问题？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如何改革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如何解决经济效率与公平的两难，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看起来非常不一样，但研究这些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却可以是一样的。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以下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一篇逻辑清楚、层次分明、论证合理的经济学论文，无论结论如何或是否作者意识到，都基本上由这五部分组成，特别是前四部分。可以说，写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就是对这些部分进行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填空式写作。掌握了这些组成部分，就掌握了现代经济学论文的基本写作方式，更容易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

在对这五个部分逐一进行讨论之前，先对制度(institution)这一术

语进行界定。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组行事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有关,支配和约束社会各阶层的行为(Schultz,1968;Ruttan,1978;North,1990)。由于人们在考虑问题时,总是把一部分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或参数给定,另外一部分则作为内生变量或因变量,这些内生变量是由外生变量所导致的,从而是这些外生变量的函数。于是,按照 Davis-North( 1971,pp. 6-7)的划分方法,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又可以将制度划分成两个范畴: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和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制度环境是一系列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法律规则的集合,它是制定生产、交换以及分配规则的基础。在这些规则中,支配经济活动、产权和合约权利的基本法则和政策构成了经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和竞争的规则的集合。制度安排可以理解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游戏规则,不同的游戏规则导致人们不同的激励反应。尽管从长远看,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会互相影响和发生变化,但如 Davis-North 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通常将经济制度环境作为外生变量给定,而经济制度安排(如市场制度安排)则根据所要研究或讨论的问题,可以看成外生给定也可内生决定①。

### ☞ 界定经济环境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首要组成部分,就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economic environment)作出界定。如前所述,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首先要了解国情、所处的周围环境或现实背景。现代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也完全如此。在作经济问题研究时要从实际出发,对经济环境进行界定。经济环境通常由经济人、经济人的特征、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以及信息结构等组成。对经济环境的界定可分为两个层次:(1)客观描述经济环境和(2)精炼刻画经济环境特征。要做好这两点,前者是科学,后者是艺术。对经济环境描述得越清楚、准确,理论结论就会越正确;对经济环境刻画得越精炼和深刻,论证起来就越简单,理论结论也越能让人理解和接受。界定好一个经济环境,就是要将这两个层次

---

① 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区分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区分,没有严格的界定。当制度安排作为外生给定时,它实质上就退化为制度环境。比如,当考虑经济制度的选择时,市场制度可看成为经济制度安排。但将市场制度作为给定,来研究人们的行为和经济现象时,市场制度可看成为经济制度环境。

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现代经济学大多数问题的研究中,经济环境都假定为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理论模型延伸出来的,否则就无法讨论问题,因为总需要将一些经济因素或变量当作参数给定。

描述经济环境:现代经济学中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对所要研究的对象或问题所处的经济环境作近似的描述。一个合理、有用的经济理论应正确、恰当地描述其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经济环境。尽管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经济环境往往存在着差异,从而所得到的理论结论多半会不同,但是所采用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却是一样的。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共同点就是要对经济环境进行描述。对经济环境描述得越清楚、准确,理论结论就会越正确。

刻画经济环境:在描述经济环境时,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做到既清楚、准确地描述了经济环境,又精炼、深刻地刻画了经济环境的特征,使之能抓住所要研究问题的本质。一个现实经济环境包括众多方面,非常复杂。比如,作为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对象——人类,就有高矮、胖瘦、老少、男女、贫富之分,人的智力有高低,嗜好有差异,品行有好坏,等等。不同企业可能采用不同的生产技术、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生产出不同的商品。如果把所有这些情况都统统描述出来,当然可以说是非常准确而真实地描述了现状或经济环境;但是如果只是将环境的所有要素简单罗列,就抓不住重点,或者说,不知道哪些方面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最重要,就会无法看清问题的本质,而让大量繁杂的事实弄晕了头脑①。

因此,为了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最关键、核心的问题,我们需要根据所考虑的问题,对经济环境进行特征化的刻画。例如,在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为了研究经济人的选择问题,一个消费者的经济特征(characteristic)就简单地假定由经济人的消费集、偏好关系(或效用函数)、初始禀赋和信息结构(如考虑不确定性)来描述②;一个厂

---

① 完全准确的描述甚至也可能是没有价值的。比如,将这个世界看成是一幅世界地图应该是完全精确,但它却毫无价值。

② 由于每个人都对商品的消费具有偏好,每个厂商都采用一定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偏好关系和生产可能集应属于个人的经济特征。然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时决定了经济人的行为方式。例如,假定偏好关系关于自己的消费是单调递增的,这就意味着人是利己的,这个利己性假设就是行为假设。这样,行为假设和经济特征的区分就不是那么明确。不过,如果更进一步假定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那么在现代经济的研究中,就可以将它们看作典型的行为假设。

商的经济特征则由它的生产可能性集合或生产函数来表示;所有经济人的经济特征便组成了经济环境。同样,在研究区域经济的时候,需要描述经济区域环境和刻画其经济特征;在研究转型国家,如中国经济转型问题时,人们也需要刻画不规范经济制度环境下的经济环境特征。这样,对经济制度环境不规范的转型国家,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照搬在规范经济环境下所得出的理论结果,而是需要刻画出转型经济的具体特征,并且仍然是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研究转型经济问题。有人将钱颖一教授所研究的转型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对立起来,其原因就是这些人没有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人们也许比较容易理解,不同的经济环境可能导致不同的经济理论。但不少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即使现实经济环境相同,所要研究的问题相同,还会得出不同的经济理论呢?有些人因此导致了对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其实,许多经济理论间的结论差异往往是经济学家对经济环境界定的差异所造成的。这种差异不仅可能是客观经济环境上的差异所造成的,而且这种差异还可能是由经济学家对经济环境界定的主观判断所造成的。如上所述,由于经济环境十分复杂,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只进行描述性分析,还需要对经济环境行为方式进行抽象式的精炼特征化,找出最主要的特征,这往往会让经济学家带有一定程度上的主观判断。不同的主观判断,就会导致对经济环境的不同界定,从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理论、经济学派或理论结果。现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中有众多的学派: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或称为新古典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等。其实,这些学派之间的对立并不像非经济学家或媒体所渲染的那么大,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基本分析框架相同、研究方法相同(采用经济模型和市场均衡来分析市场)及对象相同(在市场制度安排下研究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变化规律),它们都相信市场制度,相信从经济运作的长期或总的趋势来说,都会趋向最优的市场均衡,这些理论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刻画经济环境时的差异所造成的,特别是对经济系统的冲击或干扰是来自需求方面还是供给方面、关于经济波动的信息是充分的还是不充分的,以及对干扰的时间效应是滞后还是瞬间的等诸多假设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

比如,在回答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周期和经济衰退及应指定什么样的

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时,凯恩斯学派认为关于经济或非经济因素波动的信息是完全的,这种波动主要是来自于需求方面,并且价格在短期内变化极慢,使这种波动会破坏“最优”市场均衡。为了避免或减轻经济周期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损失,政府应对经济施行干预,使用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刺激或控制,从而抵消各种干扰的影响。

而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Friedman)认为,现实经济中对波动存在“信息不充分”及“时间滞后”效应,使得自身趋于稳定的经济在经过政策调节之后,反而变得更加振荡了,因而政府应对经济尽量减少施行干预,只对货币实行控制,保持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而以卢卡斯(R. Lucas)和萨金特(T. Sargent)为代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定义经济环境时却假定:波动的“时间滞后”效应只是瞬时现象;并在经济环境中添加了具有代表性的基本经济单位(厂商和家庭),从而使得整个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经济活动中基本经济单位所需要的经济信息是不充分的。基于对经济环境的这种界定,并在理性假设下,理性预期学派于是认为,凯恩斯理论没有把公众对政府政策以及其他经济信息的反应考虑进去,人们往往会通过“理性预期”的行为方式,使得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效果往往事倍功半。因而,政府应该尽量不干预经济,即使在不得不使用政策去干预经济活动时,要注意政策的信誉,即政策的连贯性。卢卡斯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古典现已成为当今宏观经济学的主流。

而刚刚获得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德兰德(F. E.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 C. Prescott),也是属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在1980年代初期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他们对经济环境的界定又有些不同,他们假定:宏观经济的波动主要是供给方面引起的;价格和工资在短期也是瞬间发生变化。他们进而认为,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是经济对生产技术及生产率变动的自然且有效的反应,正的技术冲击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业、投资和产出也随之提高,总供给曲线上移,经济上涨,反之亦然。他们由此认为,经济周期不是对市场均衡的偏离,而是市场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市场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所以不存在市场失灵,因而政府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尤其是赤字政策一样无效。

这个例子说明了,在一个领域中,即使研究的问题基本相同,但对经济环境的界定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派。像自然科学对自然不断地加深认识一样,经济理论的发展在许多时候也是如

此，并基于人们对经济环境的不断的认识和重新刻画而不断改进，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原有理论或提出新的理论。不像国内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经济理论应全部推倒重新再来，他们今天创造一个理论，明天又创造一个理论，而这些理论根本没有基于前人的工作，请问当今世界上其他学科有这样认可的理论吗？其实，这些理论根本没有生命力，过不了几天人们就会将它们忘记了。

第二个例子是当今流行的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合同理论、拍卖理论及信息经济学。这些理论都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一般会失灵，因而需要设计某种激励机制诱导经济人显示真实信息，从而达到次优结果（second best）。这些理论中关于经济人的行为假设相同（收益最大化），所研究的问题相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分析框架基本相同，研究方法相同［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完全信息情况下所得到的最佳结果（first best）］。但由于对经济环境中参与者的经济特征及信息结构界定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理论结果。这些理论中的各种不同结果主要是对经济环境刻画的差异所造成的，特别是关于经济人的特征及信息结构界定的差异所造成。比如，关于经济人的行动是信息不对称［称之为隐蔽的行动（hidden action）］，还是关于经济人的特征是信息不对称［称之为隐蔽的信息（hidden information）］；经济人是风险中性，还是风险厌恶；契约或机制是在经济人了解信息之前制定（ex ante），之间制定（interim），还是之后制定（ex post）；允许共谋还是不允许共谋（collusion）；允许重新谈判还是不允许重新谈判（renegotiation）；从经济活动中所得结果的价值是私人价值、共同价值，还是关联价值等方面的差异①。

这种研究的好处是，针对经济环境各种特征的刻画，给出不同的最优合同，或激励机制等制度安排。这样，根据现实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在许多情况下，如何界定和刻画一个经济环境，都是给出一个经济理论或决定经济制度安排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和环节。由于米尔利斯（J. Mirrlees）、维克瑞（W. Vickrey）、阿克尔洛夫（G. Akerlof）、斯宾赛（M. Spence）以及斯蒂格里茨（J. Stiglitz）在这些领域中作出了开创性的

① 这里，私人价值（private value）指的是每人知道自己所得结果的价值；共同价值（common value）指的是所有人的结果有一个共同的价值，但他们都不知道价值的大小，但有一个估价；关联价值（affiliated value）指的是：所得结果的价值依赖于经济人的私人信息及某些共同的不确定因素。

工作，他们分别在1996年和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两个例子说明，即使只对经济环境的刻画作出一些改进或变动，也可能产生出重大的经济理论或学派。当今现代经济学中大多数的研究结果主要就是对经济环境给出不同的界定而得到的。总之，由于经济环境的不同或刻画的不同，所得出的理论结果往往会不同。如何清楚、精炼而又客观地刻画所要研究问题的经济现状或经济环境，并建立一个高度概括的理论经济模型，这不仅仅是科学，也是艺术。

### ☞ 设定行为假设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第二个基本组成部分是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这个假设至关重要，是经济学的根基。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

一般来说，在给定现实环境和游戏规则下，人们将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这样，在决定游戏规则、政策、规章或制度安排时，要考虑到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并给出正确的判断，看他们是自私自利还是无私利他，是忠厚老实还是老奸巨猾，是讲究诚信还是谎话连篇。面对不同行为方式的参与者，所采用的游戏规则往往也是不同的。如果你所面对的人是一个老实、做事讲诚信的人，你和他处事的方式或者说你针对他的游戏规则将多半会相对简单。如果你所面对的人是一个雷锋式的“傻子”，你和他打交道的规则也许会更加简单，不需要有什么防备心，不需费什么精力（设计游戏规则）和他处事，游戏规则也许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但如果要打交道的人是一个难缠、狡猾、无诚信可言的人，你和他打交道的方式可能会非常的不同，与他相处的游戏规则可能会复杂得多，需要小心对付，并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这样，为了研究人们是如何作出激励反应和权衡取舍的选择，对所涉及人的行为作出正确判断和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如研究经济选择，经济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和它们的变化规律时，确定经济人的行为方式也非常重要。

一个比较合理和现实而又通常被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人类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即人主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人是自利的”这一人

类行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人不是“自利”的，也许就不会有经济学。因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来最有效地满足人们无限欲望的学问，而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要有一个人是自利的，并且他的物欲是无穷的，就不可能实现按需分配，就需要解决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需要的问题，也就需要经济学。利己性假设即使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政治家也是适应的，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有国家的利益，民族有民族的利益，集体有集体的利益，家庭有家庭的利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举例来说，政治家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当然希望政治家们总是追求整个社会的福利，真正成为人民公仆，但这往往不现实。许多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也像消费者和企业所有者一样地追求着自己的利益，希望长久掌握权力，以此得到好处。如果对此有什么疑问，只要看看现实中的官员以权谋私，甚至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例子何其之多就可明白。

对人类的利己行为假设不仅必要，符合基本现实，并且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一自利行为假设有误，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而相反，如果采用利他性假设，一旦假设有误，所造成的后果要比前者大得多。如本节开头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并不排除在利他行为假设下讨论制度安排和个人的权衡取舍选择问题。事实上，在利己行为假设下所采用的游戏规则多半同时也适应利他的人，并且在利他行为假设下，所采用的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以及个人的权衡取舍选择问题要简单得多。但是，一旦利他行为假设有误的话，所造成的后果比利己行为假设有误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改革开放前所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一大二公”，否认个人利益，在文革期间甚至宣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几乎处在崩溃的边缘。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安排基于人是利他无私的假设之上的。其实，对人的行为作出正确判断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伤害你最深的人往往是欺骗性最强的人——你相信他，他却欺骗你，你认为他老实，他其实非常狡猾。只要想一想在现实中将一个行事自私、狡猾的人看作是一个行事简单、一心为公的“老实人”来和他行事处世，将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会明白这种假设错误的严重性。

在现实中，那些经常唱着高调、宣称一心为公但实质上却是非常自私的人，一旦他们有机可乘，相对于不具有欺骗性的自利人，无论是

给国家还是给他人往往会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将人基本上都假定为“雷锋式”的一心为公的大好人,来决定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给出经济政策建议或作出经济政策,那么你所给出的制度安排、政策建议多半不会成功。为什么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搞不好,大多数的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就是由于大多数厂长、经理和他们的上级并不是“雷锋式”的人物,他们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中大多数的行为方式往往与这些制度安排是激励不相容的,即使能做到激励相容,所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这就是为什么笔者不能同意林毅夫、郎咸平等人认为只要解决公平的竞争环境或让政府监管,国有企业就可搞好的观点。为什么在现实中我们需要“党纪”、“国法”,需要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比如严格的财务制度,实质上是为了预防个人私利膨胀。由于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有私欲,没有严格的财务制度,这些人就会任意拿走公家的财产。总之,尽管现代经济学不排除利他性假设,利己性假设不仅现实、合理,并且假设有误所造成的风险要小得多。

在经济学中,比利己更强的行为假设是人的理性假设,也就是最优化假设。什么是“理性”?理性意味着:每个人、每个企业都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对于消费者而言,理性行为就是用自己有限的收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欲望。对于企业而言,理性行为就是在给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选择最佳的投入产出组合以取得最大的利润或经济效益。尽管理性假设不完全真实,但与现实基本接近,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比如,作为一个竞争性企业,如果总是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终究它会被淘汰的。另外,前面谈到的卢卡斯所开创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经济人行为所作出的理性预期假设:经济人会有意识地搜集一切与自己经济活动有关的经济信息,并对此作出最合理的反应。这一假设意味着大众会有意识地了解经济环境的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即中国老百姓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往往会通过这种博弈行为方式,将政策的效应抹除或减轻。理性预期假设看来在当前中国也是比较合乎现实的。博弈论就是一门专门研究在各种不同行为假设(如纳什均衡行为假设、占优均衡假设等)下人们如何互动,并作出最佳决策的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由 198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 Simon)所提出的有限理性假设并不是对理性假设作完全否定,而只是说明人们有时是健忘的、冲动的、混乱的、有感情的和目光短浅的,不能真正地总是追求其最优目标。尽管如此,有限理性假设仍然是指人的行为

接近理性，是较弱的一种利己性假设，在面对这样的主观局限性约束时，人们仍然是权衡取舍，选择尽可能好的结果。当然，由于有限理性假设与理性假设的差异，经济学家会得出一些不同的理论结果。以前看到国内一些学者，如汪丁丁教授，用有限理性这个假设来否定现代经济学，将有限理性假设与理性假设对立起来，认为有限理性假设对现代经济学造成了冲击。其实这是误解，这些人没有弄懂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真正差别。就像前面谈到的宏观经济学派的例子，由于经济环境假设的差异，导致了许多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派，但人们并不认为新的宏观经济学派的产生会对现代经济学造成冲击。科学总是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和理性行为假设一样，有限理性假设也是自利行为假设的一种，只是后者是前者的推广和延拓，后者比前者更一般化，它包括了前者作为一个特殊情况，根本谈不上有限理性否定或者推翻了现代经济学。这就如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牛顿力学的推广和延拓一样，前者比后者更一般化，但不能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否定或推翻了牛顿力学。

此外，在假设消费者的行为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从最基本的偏好或效用最大化出发。比如，传统的芝加哥学派就假定消费者行为是由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来表示。这也许是为什么张五常教授不承认存在着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的原因。不过，在理论上至少存在着满足所有基本公理（假设）的偏好关系和效用函数（如单调性，凸性及连续性），使效用最大化所导出的需求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并且这些公理假设也比较合乎现实地描述了经济人的消费行为。Mofatt（JME，2002）在最近就给出这样的效用函数。这样，从理论上来说，偏好关系的基本行为假设并不排除会导出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事实上，只要商品是劣质品（即收入上升，消费量反而下降）并且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这在现实中是可能发生的），就会得出需求曲线在某个部分是向上倾斜的。

### ☞ 给出制度安排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给出制度安排，也即游戏规则。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行为方式的人们，往往需要采取不同的因应对策或游戏规则。当情况及环境发生变化时，所采用的对策或游戏规则多半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游戏规则的决定对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重要。不同的游戏规则将导致人们不同的激励反应，不同的权衡取舍结果，从而可能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

这对经济学的研究也同样成立，当经济环境确定后，人们需要决定经济上的游戏规则，在经济学中称之为经济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学的任何一个理论都要涉及经济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学，特别是最近30年发展起来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信息经济学、最优合同理论和拍卖理论等，根据不同的经济环境和行为假设，研究并给出大到整个国家、小到两人经济世界的各式各样的经济制度安排，也即经济机制①。依赖于所讨论的问题，一个经济的制度安排，也即游戏规则，可以是外生给定，也可以是内生决定的②。

从对整个国家经济制度安排的选择来看，经济制度安排可以是市场经济制度、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混合经济制度、转轨经济制度或任何其他经济制度安排。标准的现代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制度安排的。研究在市场制度下人们的权衡取舍选择问题（如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及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研究在什么样的经济环境下市场均衡存在，并对各种市场结构下的配置结果作出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基于资源配置是否最优、公平等等）。在这些研究中，市场制度安排通常假定是外生给定的。将制度安排作为外生给定的好处是将问题单一化，以便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及人们是如何作出权衡取舍选择的。

当然，对制度安排的外生性假设在许多情况下不尽合理。如前所述，经济制度安排应依赖于经济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不同的经济环境和不同的行为方式应给出不同的制度安排。例如，市场制度在许多情况下会失灵（即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市场均衡不存在），这样人们想寻找替代机制，或其他更佳的经济机制，从而我们需要将制度安排看作为内生变量，是由经济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决定的。这样，我们经济学家需要给出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安排。例如，在现阶段转型经济环境下或过程中的经济制度安排应不同于转轨完成后的标准市场经济制度，即转轨过程中所采用的一些制度安排应与转轨完成后的所采用的终极经济制度安排不一样。尽管激进式改革理论和渐进式改革理论的最终目标都一样，但渐进式改革理论的好处就在于

---

① 经济机制、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制度、经济体系这些术语在文献中经常互用。不过，经济体系可能包括面更广，经济制度其次，经济机制包括面最小。赫维兹将经济制度定义为经济机制的集会。在本文中，经济机制等同于经济制度安排。

② 当经济制度安排作为外生给定时，它也可看成是经济环境的一部分；当它是内生决定时，它就是典型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经济环境的一部分。

它考虑到转型期的这种差别，它不仅在意转轨的目的和结果，更在意转轨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即在意如何达到目的和结果的实施过程，给出转轨过程中的各种临时性经济制度安排。

当研究一个具体经济组织或单位的经济行为和选择问题时，经济制度安排更应是内生决定的。新制度经济学、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转轨经济学、最优合同理论、信息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就是研究经济组织及经济制度的设计问题。将经济制度安排作为未定，研究在给定的经济环境下的经济制度安排的最优选择。将经济机制看作内生的好处是，由于经济环境往往在一定时间内是给定的，人们需要给出相应的经济机制，也即制定出相应的游戏规则。那么，在给定经济环境下，人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机制使之达到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呢？这正是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分支——最优合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所想要解决的问题。机制设计理论可研究大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设计问题，也可研究小到个人和部门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研究个体的经济人（消费者、家庭、企业、经济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如何决定经济激励机制等问题。

### ☞ 选择均衡结果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找出尽可能佳结果。由于做任何一件事往往存在着多种可行方案，这样人们需要作出选择。那么人们是如何作出选择，特别是经济上的选择呢？一旦给定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游戏规则）及其他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之后，人们将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作出激励反应，在众多的可行结果中通过权衡取舍来选定结果，称之为均衡结果①。有人认为经济学中均衡的概念不好理解，甚至反对采用均衡的概念。其实均衡概念不难理解，它表示在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式的情况下，人们需要选定一个结果，这个最终选定的结果就是均衡结果。对利己的人来说，他将选择一个自认为是最有利的结果；对利他的人来说，比如雷锋，他可能选定一个有利于他人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均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均衡选择结果依赖于经济环境、自己的行为方式（无论是相对于理

① 当然也会有例外，那就是无法选定结果。这种情况被称为均衡不存在。这时，需要发展出新的经济理论，修正游戏规则，或作出近似选择。

性假设,有限理性假设,还是其他行为假设),以及让他作出激励反应的游戏规则,它是相对这些因素的"最优"选择结果。注意,由于有限理性的原因,它也许不是真正客观上的最优,而是自认为的最优。

以上所定义的均衡应是经济学中最一般化的均衡定义。它包括了教科书中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以及各种技术或预算约束条件下独立决策所达到的均衡。例如,在市场制度下,作为企业所有者,在生产技术约束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生产计划称之为均衡生产计划,从而可导出商品的供给曲线和要素需求曲线;作为消费者,在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消费组合称之为消费均衡,从而可导出每种商品的需求曲线 。从供给和需求曲线又可得出每种商品的市场竞争均衡。它包括了人们在给定的市场机制下互相作用(如不完全竞争和寡头竞争市场结构下),达到某种均衡状态。以上所给出的均衡概念也包括了在有限理性假设下所导出的均衡以及任何给定行为(无论自利与否)假设条件下所导致的均衡。这样,根据以上对均衡概念的理解,可知有限理性假设根本没有冲击或推翻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总之,无论人的行为是理性、有限理性、利己,还是利他,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都可能用来研究人们的经济选择问题和决定均衡结果。

### ☞ 进行评估比较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第五个基本组成部分,是对经济制度安排和权衡取舍后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作出评估比较。当经济人作出选择后,人们希望对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评价,与理想的"最优"状态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资源平等配置、激励相容、信息有效等)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对经济制度安排给出评价和作出优劣的价值判断——判断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是否导致了某些"最优" 结果;还要检验理论结果是否与经验现实一致,能否给出正确预测,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最后,对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作出优劣的结论,从而判断是否能给出改进办法。

在评估一个经济机制或制度安排时,现代经济学通常所采用的一个最重要的评估标志是看这个制度安排是否导致了效率。所谓"效率",就是用最少的成本,达到最佳效果。经济学中所用的帕累托最优(有效)或称之为最佳(first best)意味着:在现有资源约束的条件下,不存在改进的余地,即不存在不让任何参与人受损的情况下让一部分

人的福利有所改进的资源配置方案。

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它意味着如果一个社会资源配置不是有效的,则存在着改进效益的余地。当然,在现实中,由于经济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科学与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精确的帕累托最优也许永远不可能实现,它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只要想提高经济效率,人们就应不断地追求,尽量地接近这一目标。有了帕累托最优这一理想标准,我们就有了一把尺子、一面镜子或一个目标。用这个标准,我们去比较、衡量和评价现实世界中各式各样经济制度安排的好坏,看它们离这一理想目标还差多远,从而得知改进经济效益的余地,使资源的配置尽可能接近帕累托最优标准。

其实,帕累托最优在现实中不可精确达到的情况和许多物理学中的现象相似。像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等,这些在现实中都不存在,但谁又能否定这些物理概念的有用性呢?许多在理想状态下得到的物理理论和概念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但它们却近似地描述了自然世界,因而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的基础。同理,尽管帕累托有效是一种理想境界,不能精确地达到,但可能近似地接近,成为检验社会经济效率的基本准则。

当然,帕累托有效是一种理想境界,对一个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安排,如转型经济过程中的各种临时制度安排,帕累托有效也许是一个太高的标准。于是,退而其次,在讨论制度的演进时,经济学家往往用帕累托改进这一标准来衡量制度转型的好坏。所谓帕累托改进意味着经济社会中所有人的福利或多或少有所改进。帕累托改进较弱的要求是社会整体福利得到改进。

尽管现代经济学对平等结果注意较少,但并不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不能用来研究如何导致平等资源配置。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平等配置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它们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尽管一个资源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的(例如,一个人占有社会上所有资源而其他人不占有任何资源的配置是帕累托有效配置),但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看,却是极端的不公平。"结果平等"(及所有人对资源的配置相等)也是一个社会想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一般来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平等配置

是呈权衡取舍的反向关系。由于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主观努力不同,机遇不同或所面临的风险也可能不同,为了激励人们努力工作从而增进效益,必然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收入结果不平等。如果无论干多干少和贡献是大是小,收入都一样多,那么,会有多少人去努力工作呢?

以上平等配置是一种绝对平均的概念。由于各人的爱好不一样,把棉布和大米平等地分给每一个人虽然看起来公平,但不见得大家都满意。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人们还用到其他意义下的结果平等概念。例如:(1)所有的人在给定的配置下所获得的效用至少与平等配置下获得的效用一样大;(2)在给定的配置下,每个人都满意自己所得的一份,即不认为别人的比自己的好。以上平等配置的概念也许更合理,因为它们考虑到了个人偏好:人们愿意得到他喜爱的商品组合,而不愿意平等地得到他不喜欢的商品组合。并且,现代微观经济理论(参见笔者的《微观经济理论讲义》第九章)告诉我们,只要每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同,在通常市场均衡存在的假设条件下,市场竞争机制将可同时导致帕累托有效和以上所定义的平等配置。这就是说,在理论上,只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给每个国民同等基础教育达到这种起点平等),然后通过市场运作就可以达到既有效而又公平的社会结果。笔者认为,这个结果对解决当今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差别和社会不公,也许有一点现实指导意义。

评估一个经济制度安排好坏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激励问题在每一个社会经济单位中都会出现。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利益与代价(收益与成本),只要利益和代价不相等,就会有不同的激励反应。既然个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怎样将自利、互利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呢?那就是激励相容。所谓激励相容就是使自利的个人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使得每个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时,同时也达到了其制度安排设计者所想要达到的目标。由于每个人从所要做的事中获得利益与付出代价,通过对利益和代价的比较,将会对游戏规则作出合理的激励反应。这样,检验一个经济机制或规则是否运行良好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看它能否提供内在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激励决策者作出有利于他主管的经济组织的好决策,激励企业尽可能有效率地生产。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安排就是要看它是否给主观为自己的个人以激励,使他们客观为社会而工作。尽管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仍然还有许多经济政策和规则不是激励相容的。激励相容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概念,在最近30年已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个核心概念,是任何经济体制都需要具有的性质。能否提供激励相容是检验一个经济机制的基本标准。除激励相容之外,还要看运行经济机制的代价,看是否是信息有效,有较小的制度成本和经济交易成本等。

以上所讨论的五个组成部分可以说基本上是所有规范经济理论一致使用的分析框架,无论其中使用数学的多少、无论制度安排是外生给定的还是内生决定的。现举五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科斯(R. Coase)1960年的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它几乎没有用到任何数学,完全用文字论述。这篇文章主要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以此论证产权的界定和产权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所谓外部性指的是一个经济人的消费或生产会直接影响其他经济人的福利或生产。科斯定理其实分为两部分。他的论断是:只要交易费用为零且产权明确界定,则(1)外部效应的水平与产权的划分无关,这个结论称之为科斯中性定理(neutrality theorem);(2)通过自愿交易与自愿谈判,明确界定的产权将会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利用市场机制,通过自愿交易与自愿谈判,可找寻到使得所有人利益之和最大的契约安排,这个结论称之为科斯有效性定理(efficiency theorem)。科斯更进一步论断,即使市场交易是有费用的,在产权明确界定的情况下,相互作用的各方也会通过合约找寻到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

为了论证他的论断,他所界定的经济环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环境:只有两个经济人且具有外部效用性。所设定的经济人行为假设为:两个经济人都是自利的,追求个人最大收益。给出的制度安排为:产权明确界定,给任何一方都行,并且双方可以通过自愿谈判来决定合约。于是,科斯通过例子和逻辑分析论证:每个人所选定的结果会使自己的利益最大(选定均衡结果),从而使得外部效应的水平与产权的划分是无关的,并且在自愿交易与自愿谈判的情况下,将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作出评估比较)。这样,尽管科斯论文没有用到数学模型,他的分析框架仍然是按照以上五个组成部分进行的。科斯首先讨论了产权制度安排作为外生给定的相对简单情况,然后讨论了产权制度是内生决定的情况。在科斯中性定理中,其结论是外部效应的水平与产权的划分无关,因而制度安排——产权明确界定——在这个命题中是外生给定的。但在科斯有效性定理中,它说的是通过自愿交易与自愿谈判,可找寻到使得所有人利益之和最大的契约(制度)安排,因而制度安排是内生决

定的。

由于科斯假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环境，且只用文字语言讨论问题，没有像用数学模型进行讨论那样清晰，因而一些术语和逻辑分析方面有许多含混不清的地方，使得科斯定理的成立与否存在着很大的讨论空间和许多争议的地方。在许多情况下，科斯定理成立与否依赖于经济环境的界定。例如，除非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准线性（quasi-linear），科斯中性定理不会成立。要知道准线性效应函数对消费者来说，是施加了一个很强的假设：对具有外部性商品的收入效应为零。不知道这个条件就可能误用这个定理。事实上，赫维兹（Hurwicz，1995）给出了科斯中性定理结论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当交易成本为零及产权明晰界定时，导致有效配置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效用函数为准线性函数，即具有外部性商品的收入效应一定要为零。

科斯有效性定理的问题更大。如阿罗（Arrow，1979）指出的那样，由于科斯的自愿谈判假设可以被模型为合作型博弈，这要求假定关于经济环境的信息是完全的。当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时，一般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即使信息是完全的，Aivazian 和 Callen（1981）证明了，合作博弈的经济核（economic core）也许是空集，从而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另外，Starrett（1972）论证了，对具有生产的外部性，它本质上可特征为生产集的非凸性，一旦如此，有效配置也许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达到，理论上可以证明，也许不存在均衡价格来支撑有效配置（即第二福利经济学定理不成立）。还有，当经济环境中不只两人时，如何解决群体行动中固有的搭便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可能会失灵，需要设计出某种激励机制，搭便车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另外，科斯定理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奇普曼（John S. Chipman，1998）对文献中关于科斯定理的讨论作了一个很好的综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总之，关于科斯定理的讨论和争论仍然在继续中，这种争论和讨论带动了产权理论及组织理论的大大发展。科斯定理意义深远，使得科斯获得了 1991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①]。

---

① 类似不用数学，但对现代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前面提到的凯恩斯的工作。凯恩斯的理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起源，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数学家出身的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没有用到什么数学，我们现今看到的形式简洁明了的数学表达，是经过希克斯（J. Hicks）、托宾（J. Tobin）、克莱茵（L. Klein）、默迪格利安尼（F. Modigliani）等许多经济学家逐步完善才得到的。他们四人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第二个例子是纳什(Nash)的博弈均衡存在性定理。纳什是一个纯数学家,他在1951年给出了纳什博弈均衡的定义,并给出了纳什均衡存在性的证明。纳什均衡存在性是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础[①]。从数学原创性及证明的难度来看,这个定理不是太难,只是数学中的不动点定理的应用,但它们成为博弈论的最根本的基础,使得博弈论成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在经济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它可以用来研究经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策略选择问题。由于这些原因,纳什凭这篇论文和1950年关于纳什谈判解的论文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现在来说明,尽管纳什均衡存在性定理是一个纯数学定理,当它被赋予经济涵义后,它的分析框架也包含这五个组成部分。经济环境:由所有游戏参与者及其经济特征所组成,这里每个游戏者的行动集、信息结构、收益函数等构成了他的经济特征。行为假设:每个游戏参与者知道其他人的经济特征,并将其他人的策略设为给定,决定自己的策略使之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游戏规则:由支付函数或支付矩阵决定,游戏的顺序是同时行动,这里游戏规则是外生给定的。均衡结果:所有游戏参与者的最佳策略组成了均衡策略。评估比较:对纳什均衡解进行评价,看是否达到某种社会最优或按某种标准剔除多余的纳什均衡。纳什的论文在非常一般化的条件下,证明了纳什均衡的存在。由于纳什的均衡存在定理是用数学模型表达的,没有不清楚的地方,不像科斯定理,没有什么争议,为研究经济人的决策互动及其选择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平台。

第三个例子是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一般均衡理论,它主要是为了研究竞争的市场均衡。它的一个主要假设,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将市场制度安排作为外生给定。它的分析框架由这五个部分所组成。经济环境: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及他们的经济特征和信息结构(如考虑不确定性)所组成,这里消费者的经济特征定义为消费空间、偏好关系、初始禀赋,生产者的经济特征为生产集。制度安排:私有制下的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行为假设:每个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每个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每个人将价格作为给定。均衡结果:消费者在自己预算约束集中决定偏好最大化的消费组合;生产者在自己的生产可能集中决定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计划;市场自我

① Nash在1950年的另外一篇论文给出了纳什谈判解的定义,它是合作博弈论的基础。

调节决定所有商品的市场出清均衡价格，即对所有的商品，总需求不超过总供给。评估比较：对一般均衡解进行评价和比较。在一般的条件下证明了：每个竞争市场均衡解导致了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每个帕累托最优配置结果都可以对初始禀赋实行再分配，通过市场均衡来达到。

第四个例子是赫维兹（Leo. Hurwicz）所开创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框架是最一般的理论分析框架，可非常清楚地看出它的分析框架典型地是由这五个部分所组成。它提供了研究如何从各种经济制度或规则作出选择的一个非常一般化的理论模型和很好的研究平台，几乎所有的经济制度都可以用这个理论框架来描述、研究、评估比较以及进行价值判断。现今具有广泛应用的许多重要理论和分析工具，如委托代理理论和拍卖理论都是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子领域①。

机制设计者的目标是要设计某种制度安排使之达到某个既定的目标，因而在机制设计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的最大差别之一，是将制度安排作为内生决定的。为此，定义经济环境：由所有参与者及参与

---

① 让人不解的是，应用赫维兹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开创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委托—代理理论的米尔利斯和维克瑞在1996年同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不是赫维兹获奖或至少同时获奖。许多知名教授和经济学大师们都为此感到遗憾和不平，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好比将诺贝尔经济学奖先授予威廉姆森（Williamson）而没有授予科斯一样可笑。当然，获奖与否具有一定随机性。不过，不太遗憾的是，赫维兹教授获得了许多其他重要荣誉，包括美国总统奖，这个奖对美国人来说，比诺贝尔奖还难拿，至今只有4位美国经济学家拿到总统奖，其他3人是阿罗、萨缪尔逊（Samuleson）及弗里德曼。从此点可看出赫维兹的显赫学术地位。赫维兹教授是我至今遇到的最聪明、最有才智的人（其余3位总统奖得主笔者没有机会与之交流过）。

赫维兹还做了许多其他开创性的工作：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对动态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早在1947年就首先提出并定义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概念，理性预期学派已成为当今宏观经济学的主流，使得卢卡斯和普雷斯科特分别获得1995年和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理性预期学派当中的其他几个大人物，像萨金特、巴罗（R. Barro）今后也很可能获奖；赫维兹对如何从需求函数的存在来证明效用函数的存在这一可积性结果也作出了重要工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结果。效用是现代微观经济学消费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是一个唯心的概念，它不存在，在以往的国内政治经济教科书中，效用一直受批判；他和阿罗等人还对竞争市场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当然还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学生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赫维兹今年87岁，身体还很好，思想还异常活跃，还在参加学术会议，直到最近还在写理论性很强的论文，在此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者的经济特征所组成，这里每个参与者的配置结果空间、偏好关系、初始禀赋、生产集、信息结构（如考虑不确定性）等构成了参与者的经济特征。行为假设：每个参与者根据自己的行为对机制以及其他人的选择作出激励反应，以此决定自己的策略使之最大化自己的收益。经济机制：由信息空间，决定信息如何交流的反应函数以及如何决定配置结果的结果函数所组成。均衡结果：所有参与者的最佳策略组成了均衡策略。评估比较：对均衡解进行评价和比较，看是否达到既定的目标，如是否激励相容，是否导致了帕累托最优结果，是否具有最小的机制运行成本等。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中的激励或激励相容现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个核心概念。

第五个例子是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它主要为了分析个人偏好在多大程度上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加总成社会偏好序。他的分析框架也可以看作为由以上五个组成部分所组成。经济环境：参与者、参与者的偏好序，及备选方案集所组成。行为假设：理性经济人，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制度安排：决定加总规则。社会偏好序由个人偏好序来决定，社会偏好序决定加总规则。这样，制度安排在阿罗的分析框架中是内生决定的。均衡结果：所有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决定最佳备选方案，最佳社会备选方案由社会偏好序决定。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结论是，当假定社会偏好序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时：(1)备选方案的数目至少有三个；(2)由个人偏好序组成的区域无限制；(3)满足帕累托原则，即一个方案对所有人是最优的意味着相对于社会偏好序也是最优的；(4)满足无关备选方案的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或称之为成对独立性条件，即社会对于任意两个备选方案的偏好，只取决于个人对这些方案的偏好，则唯一的社会总加偏好序是独裁制度安排，即某一个人偏好决定了社会总加偏好①。评估比较：这一定理告诉我们的是，人们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称心如意，总要进行权衡取舍的选择。当经济环境的区域充分大及要求人们真实地显示自己的偏好时，则唯一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是独裁制度。它也说明了，没有一个经济理论对所有的经济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都成立，需

① 成对独立性条件本质上与正确引导个人真实显示其偏好的问题相联系。这样，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本质上是与 Gibbard-Satterthwaite 的不可能性定理是等价的。Gibbard-Satterthwaite 的不可能性定理是激励机制设计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定理，阿罗不可能性结果的分析框架由以上五个部分组成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要对不同的经济环境和行为方式给出不同的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

##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注意要点

以上讨论了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基本上都是由这五个部分组成的。对这五个部分的讨论自然会引申到如何按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可以逐步深入地研究各种经济现象,发展出新的经济理论。这就是本节要讨论的现代经济学中通常所采用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和注意要点。它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提供分析工具,注意经济理论的适应范围,区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重要性,以及弄清数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关系等。

### ☞ 研究平台、参照系和度量标尺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首先提供各种层次和方面的基本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 ,从而给出度量均衡结果和制度安排的优劣度量标尺。提供研究平台和建立参照系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提供研究平台和建立参照系有利于:(1)简化问题,抓住问题特征;(2)建立评估理论模型和理解现实的标尺,以及(3)理论创新。

研究平台:现代经济学中的研究平台是由一些基本的经济理论或原理组成,它们为更深入的分析打下了基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类似于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即先将问题简化,再抓住问题的核心部分。当有众多因素形成某种经济现象时,我们需要弄清每个因素的影响程度。这可以通过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研究其中某个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影响来做到。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而微观经济学中最基础的理论是个人选择理论——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它们是现代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研究平台或奠基石。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从讨论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着手的。它们为个人作为消费者和厂商如何作出选择给出了基本的理论,并且为更深入地研究个人选择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平台。

一般来说,个人的均衡选择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而且也依赖

于其他人的选择。为了研究清楚个人的选择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个人选择在不受他人影响时是如何作出决策的。现代微观经济学中标准的消费者理论与厂商理论就是按照这样的研究方法得到的。在这些理论模型中，经济人被假定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制度安排中。这样，每人都把价格作为参数给定，个人选择不受他人选择的影响，并且每个人的效用或收益只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而不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于是消费者的决策就是在给定的价格参数和收入的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从而个人的最优选择是价格和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通过完全竞争市场制度安排假设及没有消费外在性假设，可使得我们先考虑最简单的个人选择问题，而先不需要考虑自己的选择对别人的影响，也不考虑别人的选择对自己选择的影响。厂商理论也是从研究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企业是如何做出权衡取舍开始的。

刚开始学现代经济学的人往往会对这种研究方法感到不解，认为这种简单情况离现实太远，理论中的假设和现实不太相吻合，从而认为现代经济学理论没有什么用。其实，这样的批评表明这些人对科学的研究方法还没有什么理解。这种将问题简化或理想化的研究方法为更深入地研究建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研究平台。这就像物理学科一样，为了研究一个问题，先抓住最本质的东西，从最简单的情况研究着手，然后再逐步深入，考虑更一般和更复杂的情况。标准的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就是按这个思路进行的，先研究最简单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问题，以此建立一个研究个人选择的基本研究平台。从这个平台出发，人们可以考虑经济人之间相互影响这个更一般情况下的选择问题：个人效用或利润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也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从而个人的均衡结果是他人选择的函数。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垄断、寡头、垄断竞争等市场结构的理论就是在更一般情况下——厂商间相互影响下——所给出的理论。为了研究经济人相互影响决策这更一般情况下的选择问题，经济学家同时也发展出博弈论这一有力的分析工具。

一般均衡理论是基于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之上，属于更高一层的研究平台。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为研究在各种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研究平台，一般均衡理论则为研究在各种情况下所有商品的市场互动如何达到市场均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平台。例如，前面谈到的宏观经济学中大多数学派就是在一般均衡理论这个平台上展开的，用市场一般均衡来分析市场和研究宏观经济变量的相

互作用关系和变化规律。

最近30年发展起来的机制设计理论又是更高一层的研究平台，它为研究、设计和比较各种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机制（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还是混合所有制）提供了一个研究平台，它可以用来研究和证明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和利用信息方面的最优性及唯一性。完全竞争的市场制度安排不仅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且从利用信息量（机制运行成本、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它利用的信息量最小，从而它是信息利用最有效的。研究平台也为评估各类经济制度安排提供各种参照系创造了条件，为衡量现实与理想状态的差距制定了标尺。

参照系或基准点：参照系或基准点指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它导致了理想的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等。参照系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一般均衡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参照系，它主要论证完全竞争市场的最优性，认为它将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将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系，人们可以研究一般均衡理论中假设不成立（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具有外部性、非凸的生产集、不规范经济环境等），但也许更合乎实际的经济制度安排（比如具有垄断性质或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制度安排），然后将所得的结果与理想状态下的一般均衡理论进行比较。

通过与完全竞争市场这一理想制度安排相比较，人们就可以知道一个（无论是理论或现实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在资源配置和信息利用的效率方面的好坏，以及现实中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与理想的状态相差多远，并且提供相应的经济政策。例如，宏观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古典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都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研究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变化规律，讨论和辩论这些宏观经济理论和学派的优劣，评价所给出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从而改进这些理论，给出更有效的经济政策建议，甚至发展出新的理论学派。这样，一般均衡理论也为衡量现实中所采用的制度安排和给出的经济政策的好坏建立了一个标尺。如钱颖一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除了一般均衡理论，产权理论中无交易成本和无收入效应的科斯定理，以及公司财务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等也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或参照系。

度量标尺：尽管作为参照系的经济理论可能有许多假定与现实不符，但是它们却非常有用，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建立经济学中的参照系就像生活中树立榜样一样的重要，它们是建立评估理论

模型和理解现实的标尺。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就像"学习雷锋好榜样"是给出做人的标尺,将雷锋作为学习榜样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不是雷锋,如果都是雷锋,就没有必要学习雷锋了。树立雷锋作为好榜样就是树立了度量人的道德规范的一杆标尺,看每人离雷锋这个榜样有多大的差距,在哪些方面有差距,从而使人们有了一个追赶目标。因此,参照系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进一步为解释现实的理论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由于经济学中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似乎懂一些经济学,都想在上面发一番议论,然而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非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总是用一些经济理论作为参照系,从而在分析问题时具有系统性和一致性。

### ☞ 分析工具

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研究,光有分析框架、研究平台、参照系和度量标尺还不够,还需要有分析工具。现代经济学不仅需要定性分析,也需要定量分析,需要界定每个理论成立的边界条件,使得理论不会被泛用或乱用。这样,需要提供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数学模型,但也有的是由图解给出。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比如,需求供给图像模型、博弈论、研究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理论、动态最优理论等。钱颖一教授还指出了另外一些具有分析工具的经济模型。由于钱颖一对这些分析工具的作用作了较具体的介绍,笔者在这里就不多讨论了。当然,也有不用分析工具的,如科斯定理,只要语言和基本逻辑推理来建立和论证所给出的经济理论。

读者看到这里,读过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也许会看出钱颖一教授和本文对现代经济学中分析框架的划分不太一样。按笔者的理解,钱颖一教授是将整个现代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它的分析框架,并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由视角、参照系及分析工具三部分组成。他所指的视角基本上就是本文所定义的那五个组成部分,只是他没有展开讨论。而本文所给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是

现代经济学中每一个理论所具有的。一个经济理论基本上由以上五个部分组成，但它不见得提供了参照系或应用了某种分析工具。这样，将参照系和分析工具看作为属于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范畴，而不属于分析框架的范畴也许更合理。

### ☞ 经济理论的作用、一般性与相对性

经济理论的作用：经济理论至少有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它能够用来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这是现代经济学主要讨论的内容。第二个作用是，它能够对给定的现实经济环境、经济人行为方式及经济制度安排下所可能导致的结果作出科学的预测和推断，并指导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这个作用也许更重要。只要理论模型中的前提假设条件大致满足，它就能得出科学的逻辑结论并据此作出科学、正确的预测和推断，而不一定需要用实验就能知道其最终结果。例如哈耶克关于计划经济不可行的理论就有这样的洞察力。笔者 10 年前在《经济研究》上曾发过一篇文章，论断中国的经济制度平稳转轨要经过三个阶段：自由化、市场化与民营（私有）化，并给出了每个阶段的大致时间长度。经过 10 年时间实际检验，文章中所给出的论断与中国经济转轨的方式基本一致。

一个好的理论不用实验也能推断出最终结果。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不能拿社会作实验的问题。人们需要做的只是关于检验经济环境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假设是否合理（近些年来非常热门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就是从事检验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假设等理论基础性方面的研究）。例如，社会不允许为了研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关系，而乱发货币。像天文学家和进化论生物学家一样，经济学家大多时候只能利用世界碰巧向他们提供的数据来发展理论和检验理论。第三个作用是，许多理论上的不可能性结果可以用来避免实施许多现实中不可行的目标和项目。这是因为如果一个结论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只要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符合现实，这个结果在现实中也一定不可能成立。

经济理论的一般性：从以上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的讨论可以看出，经济学中每一个理论或一个模型都是由一组关于经济环境、行为方式，制度安排的前提假设以及由此导出的结论所组成的。一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越一般化，理论的作用和指导意义就会越大。如果

一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太强，它就没有一般性，这样的理论也就没有什么用处。这样，成为一个好的理论的必要条件就是它要有一般性，越具有一般性，解释能力就会越强，就越有用。一般均衡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在非常一般的偏好关系及生产技术条件下，证明了竞争均衡存在并且导致了资源的最优配置。笔者之所以在2002年所编的《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前沿发展》的前言介绍中批评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理论，就在于在他理论框架下所定义一般均衡模型需要施加一些非常不现实的假设，而不像一般均衡理论那样能在非常一般和现实的条件下成立。小凯等人在证明均衡存在性定理、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以及核和均衡集等价定理时都用到一个假定：决策人集合是无穷不可数的。对有限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经济环境来讲，一般均衡解一般不存在。它只对个别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参数都要具体给定）才能存在。换句话说，它只可能在一个勒贝格测度为零的经济环境集合上存在，这就意味着在他的模型下的均衡解对所有生产技术和偏好关系几乎处处（按概率1）都不存在①。

经济理论的相对性：在希望一个理论具有更大一般性的同时，也必须要注意到它的适应范围、边界以及局限性。这样在应用一个经济理论时便可避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高估理论的作用。经济学中的所有假设与结论基本上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无论一个理论多么一般化，它只是相对正确的，并且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和适应的范围。在讨论问题和运用某些经济学原理时，要注意这些原理后面的前提假设条件和它的适应范围，不能泛用，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记住了定理的边界条件，你就不会轻易地下结论，否则就会误用某个定理，像误用科斯定理，弄不好会带来重大的政策失误，如俄罗斯激进的私有化产权改革。

许多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忘掉了这一点，他们往往把自己的结

---

① 需要指出的是，我批评小凯的超边际分析中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不表示我不欣赏小凯的学识和人品。相反，我认为小凯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有学问、具有非凡道德勇气、正直、敢于说真话的、具有中国典型士大夫气质的一代学人。我和他相识22年，与他的私交也不错，他喜欢和我讨论他的经济理论，我也不时对他的理论给出我的看法和批评，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三四个月，我和他及他夫人小娟交往较多，主要是为小凯联系来美治病及住宿的事，我还历历在目2004年6月21日从中国飞达美国芝加哥机场最后一次和小凯通电话的时候，可能我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最后与他通话的人。想不到，17天后，小凯于2004年7月7日去世，实在让人痛惜！

果或某个原理的作用无限扩大,结果使本来具有新意或正确的东西成为错误结论或误用。张五常教授经常将现代经济学的一两个经济学原理的作用绝对化,将其无限扩大,而不太考虑理论后面的基本假设;不了解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就随意否定一门学科(如博弈论)的作用;更误导学生的是,他最所得意的地方是向学生宣称自己 30 年不读书,还要学生少读书,所有的学生都能像他那样是天才吗?又有几个人能像科斯那样,不用数学模型就能发展出那么深刻的经济理论?即便如此,科斯的原定理还有那么多含糊和争议的地方。一个人不如先踏踏实实地学点现代经济学,然后再去给出一些让人信服的批评。在海外学习,从事研究与教学二十多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许多大师级的学者们(如赫维兹)在论述他们的学术观点时(即使是口头发言),往往会非常注重于强调结论成立的前提假设及具体的约束条件。这样,在讨论经济问题和给出经济结论时,非常重要的是注意理论的边界、局限性,以及这个理论的应用范围。

另外一个错误是低估理论的作用。不少人经常以现代经济学中某些假设或原理不太适合中国国情为理由而否定现代经济学。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门学科的所有假设或原理完全地合乎现实(像上面提到的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等物理概念)。我们不应根据这一点来否定一门学科的有用性。对现代经济学也是如此。我们学习现代经济学,不仅仅是了解它的基本原理、它的有用性,更重要的是学习它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些经济理论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发展更新的理论提供研究平台和参照系。借鉴这些方法,人们可以对如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得到启发。此外,如上节所述,由于环境的不同,一个理论对一个国家或地区适合,不见得对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适合,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而需要修改或创新原有理论,根据当地的经济环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发展新的理论。

经常听到有人宣称他们推翻了某个理论或经济结论。由于理论中的某些条件不符合现实,他们就认为这个理论错了,然后认为他们将这个理论推翻了。一般说来,这种说法不科学,甚至是错误的说法。没有任何一个假设条件完全地符合现实或覆盖了所有的情况,一个理论可能符合一个地方的经济环境,但不符合另外一个地方的经济环境。但是,只要没有内在的逻辑错误,我们就不能说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要被推翻。人们当然可以批评一个理论太具有局限性,或非常不现

实，但我们需要做的是放宽或修改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修改模型，从而改进或推广原有的理论；而不能说新的理论推翻了原有理论。其实更恰当的说法应当是新的理论改进或推广了旧的理论，它可以运用到更一般的经济环境，或不同的经济环境。

另外还有一个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仅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就企图得出一个普遍性理论结论，这是犯了方法论方面的错误。比如，最近郎咸平教授对海尔等几个企业的数据作了一番考证，就得出了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在流失的结论，以此就得出了要“国进民退”的一般性结论，更进一步又得出要搞大政府、要实行中央集权的结论。笔者认为，郎咸平教授的三个结论中至少后面两个结论是得不出的。即使所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在流失，怎么就可以得出“国进民退”的结论呢？是否“国进民退”根本不取决于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从效率的角度讲，在同等的条件下，谁的效率高谁就应该进，而另一个就应退。这样，除非他能证明国有企业一般比民营企业的效率要高，否则就不能得出“国进民退”的结论。从理论到实践，整体上讲，至今得不出国有经济能比民营经济更好的结论，从而得出“国进民退”的结论，结论可能恰恰相反。因而，国有资产流失既不是“国进民退”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而是一个与“国进民退”不相干的条件。另外，即使需要“国进民退”，怎么有可能得出要搞大政府、要实行中央集权的结论呢？有什么理论和什么实践用来检验在经济上实行中央集权，能让国家富强的根据呢？

### ☞ 区分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重要性

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区分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帮助人们很清楚地思考问题和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必要条件是一个命题成立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充分条件是能保证命题一定成立的条件。例如，经常听到有人，比如陈平教授，用印度的例子来否认市场经济，认为印度采用的是市场经济，但还是很贫穷，所以中国不应该走市场经济之路。说这些话的人，就是没有区分出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差别。市场经济是导致一个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就是说，要想国家富强，一定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由于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富裕，但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但走市场经济之路，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也必须承认市场机制不一定

导致繁荣昌盛。其原因是,尽管(根据目前观察到的事实)市场机制是使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必不可少的,但还有许多因素也能影响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比如,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社会结构等,使得市场机制有好的市场机制和坏的市场机制之分。

### ☞ 数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作用

数学现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每个领域或多或少都用到数学、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这一点致使许多对经济学感兴趣但又没有较强数学基础的人望而却步、见而生叹。他们往往抱怨学习现代经济学更多的是学习数学。为什么现代经济学用到如此多的数学,甚至超过了物理科学所使用的数学知识呢?如何看待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呢?

首先,经济学不是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被用来考虑或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经济学家只是用数学来更严格地阐述、更精炼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和理论,用数学模型来分析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由于经济学的度量化、将各种前提假设条件精确化,它已成为了一门体系严谨的社会科学。这是与前面谈到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建立分不开的。由于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和给出分析工具都需要数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数理分析的方法在现代经济学中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如果经济学没有采用数学,经济学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可以说,学好数学几乎是学好现代经济学的必要条件。这个必要性在于,许多经济学概念是需要用数学来定义,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也主要是通过运用数学语言来分析和研究的。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关于经济环境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假设,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每个经济变量和经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并且按照数学的语言逻辑地推导结论。

因此,不了解相关的数学知识,就很难准确理解概念的内涵,也就无法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理解概念是学习一门学科,分析某一问题的前提。因而你如果想学好现代经济学,从事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想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就需要掌握必要的数学。然而,光懂数学还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还要深刻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现实经济环境、经济问题有很好的直觉和洞察力,学

经济学时不仅要从数学(包括几何)的角度去了解一些术语、概念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即使它们是用数学的语言或几何的图形给出的,也要尽可能弄清它们的经济学含义。因而在学习经济学时不要被文中的数学公式、数学符号等迷惑住。

有意思的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两个极端:纯理论和纯应用都用到了最多的数学。理论经济学家主要用的是纯数学作为研究工具。数学在理论分析中的作用是:(1)使得所用语言更加精确和精炼,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2)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应范围,给出了一个理论结论成立的确切条件。否则的话,往往导致一个理论的泛用。例如,在谈到产权问题时,许多人都喜欢引用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易费用为零,就可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直到现在,仍有许多人不知道(包括科斯本人在给出他的论断时也不知道),这个结论一般不成立。如上所述,还要加上效用(支付)函数是准线性(quasi-linear)这一条件。(3)利用数学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观就得到的结果。比如,从直观上来看,根据供给和需求法则,只要供给和需求量不相等,竞争的市场就会由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价格的调整,达到市场均衡。但这个结论并不总是成立。Scarf(1960)给出了具体的反例,证明这个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成立。(4)它可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这方面的例子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太多了。比如,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是一般均衡理论的改进和推广。

实证经济学家主要用的是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我们不是为学经济学而学经济学,而是对所观测到的经济现象和统计资料进行分析、描述和制定政策,并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对经济问题,不仅要作定性的理论分析,还需要有经验性的定量分析。经济统计和计量经济学在这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统计侧重于数据的收集、描述、整理及给出统计的方法,而计量经济学则侧重于经济理论的检验、经济政策的评价、基于经济理论和经验数据进行经济预测,及检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更好地估计经济模型和作出更精确的预测,理论计量经济学家不断地研究出更为有力的计量工具。

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在中国迅速地发展和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想学好数学,但面对数学纷繁复杂的类目,许多学生不知道学什么好。笔者认为,要学好经济学,至少要掌握好工科水准的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及概率与数理统

计的内容。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学好了数学，学起现代经济学来就会感到相对容易，可以提高学习现代经济学效率，并且对进一步学习优化理论、动态最优等数学工具也大有帮助，这些数学工具是学好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不可缺少的数学知识。如想要从事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真正学好现代经济学，最好是学习数学分析。高等数学主要是侧重于掌握数学知识，及其培养应用数学的能力，而数学分析却对培养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大有作用。许多学生害怕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证明，其原因就是没有学过数学分析，学过数学分析的人对证明就不会感到那么困难。其实，即使今后不从事研究工作，提高了逻辑分析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对日常工作也会有一定的帮助[①]。

### ☞ 经济学语言和数学语言的相互间转换

经济学研究的产品是经济论断和结论。一篇规范的经济学论文写作一般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1)提出问题，给出重要性，确定研究目标；(2)建立经济模型，严格表达并验证论断；(3)通俗表达论断并给出政策含义。这就是说，一个经济结论的产生一般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非数学语言阶段—数学语言阶段—非数学语言阶段[②]。第一阶段提出经济观念、想法或猜想，这些观念、想法或猜想可能由经济直觉产生或根据历史经验或外地经验而来。由于还没有经过理论论证，人们可将它们类比为一般生产中的初等品。这一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来源。

第二阶段需要验证所提出的经济想法或论断是否成立。这种验证需要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和分析工具给出严格的证明，只要可能，还需要得到实际经验数据的检验。所得出的结论和论断往往都是由数学语言或专家术语来表达的，非专家的人士不见得能理解，从而不能为社会大众、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所采用。所以将这些由技术性较强的语言所表达的结论和论断类比为一般生产中的中间产品。

学经济学是要为社会服务的，所以第三阶段就是将由技术语言所

---

① 感谢朝镛同学建议加写此段。建议笔者讨论学习现代经济学需要哪些方面的基本数学课程。

② 注意，笔者这里讲建立经济模型一般采用数学模型，但也有例外，如前面讨论的科斯定理。

表达的结论和论断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使得一般的人也能够理解，用通俗语言的形式给出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深远意义及具有洞察力的论断，这些才是经济学的最终产品。注意第一和第三阶段都是用通俗、非技术、非数学的语言来给出经济想法和结论，但第三阶段是第一阶段的一种飞跃、升华。这种三阶段式——由通俗语言阶段到技术语言阶段，然后再回到通俗语言阶段其实也是大多数学科所采用的研究方式。

## 现代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的现实作用

以上介绍了现代经济学的最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笔者试图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并结合现实讨论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尽管这些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看起来似乎简单，但实际上如果要真正领悟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生活、学习、研究中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你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会让你一生受益无穷。因为它会使你聪明、睿智、深刻、思维科学；它会帮助你学习、研究那些“阳春白雪”的纯经济理论；它也有助于指导你在生活、工作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首先，从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方面来看，一旦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你就不会被那些抽象的模型和高深的数学所迷惑，不会被弄得头昏脑涨。无论一个经济理论用到多深的数学、多少的公式、多么复杂的经济模型，它基本上都是采用了以上所介绍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只要你紧紧抓住了这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将它作为一条核心主线印在你的脑海中，你就不会迷失方向、失去重点，基本上知道它在讲什么。你可以暂时将那些技术性的、一时无法理解的具体细节搁置一旁，先弄清理论框架和具体结论，再弄懂那些具体细节。也就是，要先抓文章的主线、大致思路，了解它想作什么，得到什么论断，然后再抓具体细节。另外，一旦掌握了这些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会让你对现代经济学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太可能被误导，从而不会影响自己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经常有人对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进行批判，其实这些人的大多数议论都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上，有的甚至完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断。没有弄清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些言论就有可能会误导你，使你迷失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正确方

向，甚至可能使你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采用忽视，甚至是抵触的态度。

其次，从研究现代经济学的方面来看，一旦理解和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将会有助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许多想做经济学研究的人，尽管他们对现代经济学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读了许多经济学的论文，但仍然感到自己做起研究来很难，不知道怎么做研究，或做不出让别人认可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其实只要你掌握了这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时具有一定的数理基础和逻辑分析能力，那么做起经济学研究就不是那么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做研究就是对基本分析框架的那五个组成部分进行逻辑式的填空写作。这些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可能会有助于提高你的研究和创新能力。例如，如果你想研究某个经济问题或现象，或希望给出一个新的理论，让它具有较强的解释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能力，能够指导现实经济问题，那么你就要比较合理、准确的描述、刻画经济环境和经济人的行为方式，采用已有的分析工具或自己发展新的分析工具，建立一个尽可能简单的模型，然后进行推导论证。

如果你只是想推广和改进原有的理论结果，你就需要分析原有的关于经济环境、行为假设及模型结构是否符合现实，是否能够放宽那些前提假设条件，得出新的或者更一般的结果。对于初做研究的人来说，这一类推广、修正改进的工作也许会相对简单一些。并且你的结果也许会更容易被人接受和出版发表。当然，你也可以对经济环境界定或其他组成部分进行改动，也可能得到非常不同，甚至是重大的结果。比如，前面提到的众多的宏观经济学派和信息不对称下所得到的众多理论就是这样得出来的。如果你想批判某个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话，你应该是批判这个理论分析框架的哪些组成部分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合理、逻辑不正确或不现实的地方，而不是批判整个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因此针对那些批判现代经济学，否定现代经济学，将现代经济学说得一无是处，宣称要抛弃现代经济学，要建立自己经济学的人，笔者希望他们能够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及方法论真正有所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再去考虑如何对现代经济学的某些理论进行批判或冲击，这样便会出言谨慎，不致误导大众。

第三，了解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框架也会帮助你如何思考问题、如何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更好地学会待人接物，会使得你思想更加深刻、更加有见识、工作更加有能力。笔者经常听到对现代经济学这样的议论：经济学看起来就是一些“阳春白雪”、形而

上的东西，用到这么多数学，学起来这么难，离现实感觉有十万八千里，学了对今后有什么用呀？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完全可以被套用。比如，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准备做一件事情，或者需要与人打交道，首先要做的事就应了解当地情况、周围环境及国情（对应着框架中的“界定经济环境”）；然后，也要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尽可能弄清与之打交道人的行为处事的方式，他的品行、性格等（对应“设定行为假设”）；根据这些信息，决定自己与人打交道的规则及自己为人处事的方式（即对应“给出制度安排”）；然后在具有可行性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通过权衡取舍选定一个最佳方案（即选择均衡结果）；最后，对自己所作的决定、所作的事情及所采用的处事方式进行总结反省，看是否是最有效的方法，达到了最好的结果，是否公平合理，是否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让人们作出激励反应，达到了你想要达到的目标，即所谓的激励相容等等（即对应“进行评估比较”）。并且，当环境、情况发生变化，工作的对象变了，要做好一件事情，游戏规则当然也应相应发生变化。我想大家会认同，只要按照这五个方面去做，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游戏规则，就一定会把事情做得更好。笔者认为，这可能是解决和处理日常生活和工作事务的最佳方式之一。并且，经济理论的许多结果也有助于你如何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 结 束 语

总之，要理解和正确应用现代经济学，就需要了解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本文讨论了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及(5)进行评估比较。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及提供分析工具。这种规范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使得现代经济学在过去60年来发展迅速，应用广泛，影响巨大，已成为一门规模庞大、分支众多、体系严谨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专门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也只能了解为数有限的分支中的很少一部分内容。不花一番工夫，是很难真正地理解其中一些经济理论的精髓。实际上，笔者发现对一门学问钻进去越深，感觉自己懂得越少，写东西的时候越发谨慎，很难下笔，海阔天空发议论就更难。现在不少人不管弄懂没有就喜欢胡乱议论，提出一些看似标

新立异、耸人听闻，以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看法，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广识、博学和多才”，当然也许是为了引人瞩目、出名，而夸大自己的结果，这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好像是一种时髦。但不幸的是，这些人即使是学有专长，在没有弄清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往往会说出一些出格的话，更何况是严重地误导了众多的学子。

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要区分价值判断分析与实证性分析、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差别，理解经济理论的作用，一般性与相对性，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学习经济学，不仅仅是了解它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学习它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也有利于从事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甚至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

## 参 考 文 献


Aivazian, V. A. and J. L. Callen, “The Coase Theorem and the Empty Cor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4(1981), 175-181.

Arrow, K. J.,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ssues Pertinent to the Choice of Market Versus Nonmuarket Allocation”, i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s: The PPB System*, 1969.

Arrow, K. J., “The Property Rights Doctrine and Demand Revelation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in Michael J. Boskin(ed.), *Economics and Human Welfare: Essays in Honor Tibor Scitovsk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3-39.

Arrow, K. and G. Debreu, “Existence of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1954, 22.

Chipman, J. S. “A Close Look to the Coase Theorem”, in *The Economists' Vision: Essays in Modern Economic Perspectives*, eds. by James and Buchanan and Bettina Monissen, Frankfur/Mmain: Campus Verlag, 1998, 131-162.

Coase, R.,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960), 1-44.

Debreu, G. (1959), *Theory of Value*, (Wiley, New York).

Davis, L. and D. C. North,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First Step Toward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1970), 131-149.

Davis, L. and D. C. North,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1.

Friedman, M. and R.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HBJ, New York, 1980.

Gibbard, A., "Manipulation of Voting Schemes", *Econometrica*, 41 (1973), 587-601.

Hurwicz, L., "On Informational Decentralized Systems", *Decision and Organization*, Radner, R. and C. B. McGuire, eds., in Honor of J. Marschak, (North-Holland), 1972, 297-336.

Hurwicz, L., "What is the Coase Theorem",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7 (1995), 49-74.

Moffatt, P. G., "Is Giffen behavior compatible with the axioms of consumer theory?"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Vol. 37, Issue 4, July 2002, pp. 259-267.

North, D.,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0.

Nash, J. (1951), "Non-cooperative games", *Annals of Mathematics*, 54, 286-295.

Ruttan, V. W.,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pp. 327-357 in: H. P. Binswanger and V. W. Ruttan (eds), *Induced Innovation: Technolog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1978.

Schultz, T. W., "Institutions and the Rising Economic Value of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0(1968), 1113-1122.

Scarf, H., "Some Examples of Global Instability of the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1960), 157-172.

Samuelson, P., "Some Uneasiness with Coase Theorem",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7(1995), 1-7.

Satterthwaite, M. A., "Strategy-Proofness and Arrow's Existence and Correspondences for Voting Procedures and Social Welfare Fun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0(1975), 187-217.

Starrett, D. A., "Fundamental Nonconvexities in the Theory of External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4(1972), 180-199.

Tian, G., Lecture Notes on Microeconomic Theory, Texas A&M University, 2004. http://econweb.tamu.edu/tian/class.htm.

郎咸平,"中国需要立刻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凤凰卫视8月27日。http://www.phoenixtv.com/home/finance/fortune/200408/27/318836.html.

郎咸平在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讲话,2004年8月28日。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 BoardID = 92510&id = 45788&replyID = 190782&star = 1&skin.

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祝贺创刊40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

第 10 期。

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研究》,2001 年。

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 年第 2 期。

田国强,“中国国营企业改革与经济体制平稳转轨的方式和步骤——中国经济改革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4 年第 11 期。

田国强,“就美国公司变革的理论背景与崔之元商榷”,《当代中国研究》,5(1996),95-106。http://econweb.tamu.edu/tian/mcy96.htm。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发展前沿》,商务印书馆,2002 年。

田国强、张帆,《大众市场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智慧出版有限公司,1993 年。

汪丁丁,“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及其现代危机”,1996 年,http://www.cenet.org.cn/cn/ReadNews.asp? NewsID = 5766。

# 解读经济学在中国的现状[①]

## ——经济学与媒体是如何互动发展的？

陈志武

10年以来，《经济科学译丛》对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使严肃的市场经济学逐步走出“西方经济学”这一“另类”身份，慢慢恢复其应该归属的“正门”。这十周年之际，我们经济学人有责任回顾并反思中国经济学的现状。别的不说，从去年秋天关于产权改革大讨论中，我们看出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是一个世界，而人们心目中从以往政治经济学课程所了解到的“经济学”则是另一个世界，这两个世界间的距离如此之远，如果长久不改变，它必定会在某一时刻导致某种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局，会断送这些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毕竟，大脑中所固有的理解社会的概念框架会决定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评判，缩小这两个世界的距离是我们经济学人无法推卸的责任。那么，如何解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现状？它离现实经济有多远？

过去25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赢得世人瞩目，但经济学教育研究则是另一幅图景。经济学教育当然也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过去十几年里，与经济学相关的学术和非学术活动到处可见，一种更加有利于发展的经济文化正在形成。只是平心而论，虽然正规课堂教育对过去这些年市场经济知识在社会中的普及贡献很大，但唱主角的可能是日益成熟、越来越充满活力的财经媒体以及直到最近才被逐渐认可的

① 作者感谢田国强、文贯中、韦森、李利民、赵晓、汪丁丁、梁捷、皮建才、习天杨、周年洋给本文的鼓励和建议，感谢张善鹏在此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EMBA 教育和各类培训班。为什么财经媒体和互联网这些“非正规”平台在提供“有用的”经济教育，而高中与大学“正规”课堂却没唱主角呢？为什么“正规”经济学这些年落在改革开放的现实之后，而不是为后者领航呢？

在中国，经济学教育平台大致有以下几种：中学到大学都必修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大学经济与管理专业课程（本科和研究生）、MBA、EMBA、培训班，还有大众媒体（包括报刊、互联网和电视）。前四种算是正规教育平台，后面为非正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他们学的是理工科（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更如此），他们在中学和大学上的政治经济学可能是一辈子中唯一正式接触经济学的机会，因此对多数人而言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是关键。政治经济学课的内容今天跟二十几年前相比，当然有些变化，但由于我们所熟悉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原因，其核心经济学理念和框架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对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科的“专业”课程来说，经过《经济科学译丛》和其他同仁的努力已使课程内容的“客观性”与“实用性”增加不少，但这些专业学生毕竟占少数。

虽然正规经济教育如此，现实经济却在风风火火地增长，企业要融资发展；消费者要进行投资与消费抉择；决策者要掌握宏观经济；国际竞争迫使企业家和商人渴望市场信息并能分析把脉各行各业的市场走势；股民要辨别上市公司未来的好坏，等等，快速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使过去僵硬的经济学体系无法跟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大转型产生出对市场经济知识的巨大需求。在正规经济学教育无法赶上的情况下，就只好由财经媒体来“补课”，这些年是财经媒体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明星”公众经济学家。

## 经济学两百年前在英国的兴起

我们已谈到，在中国的正规经济学教育平台不能满足现实经济的需要之时，财经报刊、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便成为人们获得市场经济理念的最重要的平台，也是不同经济学理念交锋的重要媒介。我知道，严肃的经济学人会认为这是“浮躁”的表现，这或许也对。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经济学在中国停顿了几十年的事实，特别是我们还不能说今天的学术环境已离理想很近了。其实，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跟 18、19 世纪的英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尽管当时英国

是在开创经济学，而今天的中国更多则是在恢复）。正因如此，回顾当年英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或许能帮助我们看清中国经济学现状和未来的可能趋势，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大众媒体对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这么重要。

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后，16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便开始了大西洋贸易，开发美洲大陆。英国真正加入海洋贸易、建立北美殖民地还是1600年左右的事。但是，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海洋贸易改变了英国和整个西欧，这些当然是我们以往谈得最多的话题。相对较少谈及的是那时开始的海洋贸易不仅为报纸等大众传媒的诞生奠定基础，而且也为经济学的诞生播下种子。

英国在16世纪末加入大西洋和印度洋贸易后，1622年在伦敦便出现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份报纸——《伦敦报》（The London Gazette），随后也出现了诸如 *Collect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1692年创刊），*The Course of Exchange*（1697年）和至今还存在的 *Lloyd's List*（1734年）这些财经报刊[①]，当时这些报刊的出现完全是出于海外贸易和证券交易的需要，刊登的只是各海港离港航船的目的地、进出口商品种类与价格、股票以及其他证券价格信息等，提供纯粹的商业与证券信息和刊登广告，没有经济评论。当然，到1720年英国的南海股票泡沫时期（The South Sea Bubble），英国已有大量财经报刊，许多人认为那些报纸的过度渲染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那次金融史上的第一次股市大泡沫。那次泡沫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一项著名的"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规定任何企业在没有得到议会的特许之前不能成为股份公司，其股份不能上市交易。该法案在相当程度上使英国股市的发展停顿了长达120年。

那次股市泡沫带来的其他后果姑且不管，其间接效果是使英国从此有了相当规模的财经报刊业，而且也培养了相当大的读者群和报刊销售网。股市泡沫破灭之后，以股票信息为主的财经报刊出现萧条，但已经习惯于每天阅读财经报刊的读者群却仍然存在，成熟的报刊受众的存在对此后经济理念的大众传播极其重要。

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市场扩张已达到相当规模，除了在美国的13个殖民地外，它还拥有加拿大、中美洲众多岛国、印度为其

---

① 参见 Wayne Parsons, The power of the financial press: journalism and economic opinion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989年。

殖民地。在16世纪时英国人还不知道有白糖、烟草、茶叶、咖啡这些东西，但到了1700年英国人均年消费白糖2.6公斤、烟草1公斤。这些都是从美洲和亚洲进口的东西。从印度进口的棉布和印花布也改变了英国人的时装偏好，使其服装业由羊毛慢慢转向棉织品。特别是从1760年代开始的机械化棉纺与织布技术使英国依赖中美洲国家，从那里进口棉花到英国加工纺织，然后又将棉织品出口到欧洲大陆和其他国家。18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贸易规模已相当大，其国内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1700年时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占总就业人口的56%、22%和22%，到1820年这些产业的比例分别为37%、33%和30%①。这些海外贸易以及本国产业的发展也给英国创就了相当大的中产阶级。

到那时，人们不仅已看到海外贸易和本国市场发展的好处，也看到要为海洋贸易付出的代价。为了维护其海外贸易利益，在当时没有成型的世界秩序的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建立并维持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也经常发动或进入战争。到18世纪末为止，英国已多次跟法国、西班牙、荷兰作战，1776至1783年为维护美国殖民地与要独立的美国作战近9年。

那么，这些昂贵的海外贸易到底值不值得？为什么要扩展并维系其海外军事基地网络？市场交易给社会带来的是什么？政府对经济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海外贸易以及英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商业与经济问题，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转型冲击就像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一样，人们渴望有更清楚的理论框架帮助他们理清繁杂的经济现实，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导航。这种对经济知识的渴望尤其在中产阶级中最为突出。可是，到18世纪中叶还并没有“经济学”这回事，更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经济理论。于是，在因海外贸易刺激出的对经济知识的饥渴和“经济学”的不存在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就好像中国过去二十几年所经历的一样）。

就在那个时期，财经报刊第一次成为经济理念的辩论平台。一方面那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较成熟，可担任经济思想辩论的“裁判”；另一方面通过阅读不同思想理念的交锋，报刊读者也可获得正规学堂

① 关于英国的这些资料均来自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2001年。

里学不到的经济理论，何乐而不为呢？第一次思想交锋发生在《重商者》(The Mercator)和《英国商人报》(The British Merchant)之间，在1720年左右《英国商人报》刊登了亨利·马丁(Henry Martin)的一系列专栏文章，大力推举自由贸易的好处，而《重商者》则登文反对自由贸易。当时既然没有“经济学”，自然就没有“经济学家”了。在报刊上登出经济论争的作者一般是具有分析头脑的财经记者或评论员，其中有众所周知的经济学祖师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世界经典《国富论》首先起源于财经报刊的“大众化”经济论争，李嘉图的价值论也是先以“书信”形式刊登在当时的《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上，随后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著名作品——《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穆勒(Mill)以及麦考罗克(McCulloch，人们称他为第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等也是当时著名的由财经记者转变而成的“公众经济学家”。

以大众媒体作为探究经济原理同时传授经济知识的途径，最大的强处是它的灵活性和新闻相关性：根据每天发生的事件和热点经济问题，报刊可以边报道、边评论，同时也讲解其背后的经济道理，或者请有造诣的专家写相关的剖析解释文章。另外，媒体间的竞争是公开的，这也可帮助改进这些评论报道的质量。—— 这些特征是课堂教学与教材难以具备的优势。对于以前经济知识欠缺的大众而言，大众媒体显然是一种最方便的“补课”方式。

1803年创刊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它不仅成为向大众传播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力，而且还倡导了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方法，那时显然还没有“计量经济学”这回事，但它的基于数据的经济分析给人们耳目一新、清晰易懂的感觉，使依赖大众媒体的经济讨论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另一份最有影响的报刊是今天还在的《经济学人》杂志，它创刊于1843年，其宗旨就是向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和商人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输深奥的经济理念与商业知识，“把那些看起来像迷宫的经济理论与理念变成社会大众的普通常识”。《经济学人》的定位是严肃的政经新闻加评论，半学术性和半常识性。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是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时期，也是该学科的黄金岁月，它的发展基地不是大学，也不是正规的研究机构，而是公众报刊媒体。这些报刊和活跃于其中的公众经济学人

一起改变了英国与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他们的努力不仅创立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领域，而且从根本上培养了英美社会的商业文化，使自由市场以及相关理念成为英美大众文化的重要核心，使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对自由市场谈论一二。这种市场文化的培养对随后英美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让社会更能支持建立与产权保护相关的市场制度架构，也为证券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直到1882年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和1888年英国的《金融时报》创立的时期，以大众媒体为平台的经济研究与理念传播的时代才正式告一段落。从那时开始，财经报刊转向以新闻与金融信息为主，经济学则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象牙塔。那一转折的背景大致如下。第一，到19世纪末，英美社会已基本领会并普遍接受自由市场理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深入人心，除了专业人士外，大众对经济理念的兴趣开始减少，远不如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于是大众报刊不再愿意投入太多的篇幅给理念论争性的文章。第二，由于铁路技术在1860年后越炒越热，大众对铁路股票的兴趣猛增，炒股热情远远胜过对经济理念的热情，人们更感兴趣“如何赚钱”、“如何选好股票”等，而不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更好”、“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更好”的问题。第三，经过早年的努力，经济学体系到19世纪末已基本成形，专业化程度已很深，也慢慢建立了经济学自己的一套话语。正是这一时期经济学院系开始成立，比如，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于1890年成立，伦敦经济学院于1895年创立，剑桥大学经济学系于1903年创办。与此同时，经济学专业学报也第一次出现，比如，哈佛的《经济学季刊》于1886年创办，英国的《经济学学报》在1890年发刊。这些专业系科和学报的设立标志着经济学已成熟为一门独立的学术职业。走进象牙塔后的经济学不仅进一步建立自己的一套分析范式和专业话语，其研究主题和兴趣也不再完全受当时当地的热点新闻问题所支配，而是更多由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所推演出的问题而决定。换言之，从此以后，经济学研究的不只是现实问题，而且包括纯学术的问题，以此使经济学理论不断深化。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经济学以及其他许多学科的学术中心基本已从西欧转移到美国。这也说明世界学术强国跟经济强国是极度相关联的。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数理逻辑逐步由美国经济学界引入经济学，成为美国时代的核心经济分析方法，并开始出现“数理”和“计量”实证两类主要“证明”（或者“证伪”）经济理念的研究方

法，使经济学向科学靠近。作为结果，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外行经济学家”与“内行经济学家”的区分也越来越明显。以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大师为例，当年的亚当·斯密、李嘉图、凯恩斯等都是从财经记者转入经济学的，而今天的大师没有一个不是先读经济学或相关博士学位的，过去这些年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者也多是因为其原创性的数理或计量研究，以至于在介绍这些人的研究成果时媒体还真无法用大众语言讲清楚。

## 经济学在中国

经济学先是通过报刊进入中国。中国报刊业开始得很晚，起因是为了传教等原因。1815 年，外国传教士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后即有 1833 年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以及同年创刊的《澳门杂文编》。首批报刊的内容以宗教教义、伦理知识、科学文化为主。基于当时国人受教育面的限制，那时媒体的受众规模可想而知。

财经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最早是 1857 年面世的《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其“内容以船期、货价、行情和广告等商业讯息为主”，是中国的第一家以商业新闻为中心的报纸。从内容和风格上看与 17 世纪的英国同类报刊相似。1861 年在上海也出现了它的分报——《上海新报》（其英文名为 *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直译为《中文船期广告纸》）[①]。这些报刊均为外商所办。

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大约起始于 1872 年由英商美查创办的上海《申报》。为了把《申报》办成适合中国人看的报纸，美查聘请华人主笔，让他们按照中国的文化习俗、兴趣爱好、语言文字表达习惯来办报，这大大扩展了《申报》的读者面和影响力，在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财经读者群。接下来，《申报》在传播经济学知识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 1872 年“轮船招商局”等华人公司股票开始交易之后，《申报》每期刊载股民关心的股市与经济信息，而且不断刊登经济理念和公司

① 参见董锦瑞，“早期中文外报受众意识探析”，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4110/44111/3295990.html，以及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1850—1949》，1996 年版。

经营类的文章,“公司治理”在1880年之后也成为《申报》、《上海新报》等报刊的热门话题。

1902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版叫《原富》),他的工作当然把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向另一高潮。到民国和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总体上进展很快,特别是像《东方杂志》(1904年创办)等报刊贡献非凡。1927年由耶鲁经济学博士何廉先生创建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方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促进了经济知识的传播,另一方面开创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先例(这一工作由方显廷先生带动)。同一时期,章宗元、陈岱孙、巫宝三、马寅初等先生在中国推广现代经济理论。但是,前辈的经济学传播与研究在50年代之后基本停止,《申报》、《东方杂志》等均于1949年左右停刊。直到80年代初期,人们能接触到的经济学知识基本不超出官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改革开放之后,厉以宁、张培刚等教授努力启动经济学的恢复工作,编著出版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其他西方经济学教材,成为“文革”之后第一批“非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早期著作里往往是每介绍一种理论又要先批评一顿,叫你“先花很多时间学习,然后又叫你马上把所学的都忘记”,当然那是时代的特色。尽管如此,这些努力的意义重大,它们实际上是今天许多决策者当年读过的第一批经济书。80年代初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也起到了突破性的市场经济启蒙作用。

此后,陆续有翻译或编著的经济学书籍出版,专著类包括商务印书馆在80年代起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特别是20世纪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名著的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的《当代经济学译库》;1989年茅于轼与汤敏主编的三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1993年由田国强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4集《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等等,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许多同仁的贡献,敬请各位谅解——这些和其他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和编著工作对国内学者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今天,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之后,经典文献和前沿文献的资料可得性已慢慢不成问题。

教材类的翻译出版包括1990年代初期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还有在《经济科学译丛》中出版的斯蒂格里茨的《经济学》(1997年出版)、平狄克与鲁宾费尔德的《微观经

济学》(1997)、多恩布什和费歇尔的《宏观经济学》、曼昆《经济学原理》(1999)以及曼昆《宏观经济学》(2000)等,这些西方大学流行的经济学教材也慢慢成为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主流教材。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著作只是作为经济学专业的教材,而且在许多院校还只是在"西方经济学"名义下出现。

正规经济学课堂在慢慢改进,这些是非常积极的进步。与此同时,现实市场经济生活却不能等待,所以过去二十几年里大众媒体变为"有用的"经济理念的重要来源。实际上,虽然翻译的著作可以帮助经济学专业者的学习与研究,但对于企业界、政府决策层以及社会的众多人士来说,这些著作可能太抽象,也不一定对他们在现实经济中碰到的具体问题有直接帮助。相比之下,大众报刊则可根据今天的热点问题去查找相关的经济理论、采访"公众经济学家",以非常具体的形式和内容边报道评论、边传授经济学理念,媒体成了真正的"社会大学"。

1985 年创刊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经营报》、1989 年创办的《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在改革开放的头期对于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成长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特别是 1990 年底推出中国股市之后,几千万人立即有了对经济学、管理、法律知识的需求,这为财经媒体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展机会。90 年代初出现了第一批证券财经报刊,包括《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市场周刊》等。1993 年 11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接下来,公众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是什么、计划与市场各自的优劣等关系中国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都十分关注,有着强烈的知识需求。在此背景下,一些部委创办的经济类报纸开始出现:1994 年,国家体改委创办《中国改革报》、国家计委创办《中国经济导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市场经济报》。这些报纸当然因为重复而浪费一些资源,但在当时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它们不是以新闻报道见长,而是以理论为主题,刊登了许多学者的激烈争论。到 90 年代末,社会和学界对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达成进一步的共识,大家的关注点基本转移到"如何建立"的题目上。

1998 年推出的《财经》杂志是另一个里程碑,它不仅通过专栏和深度报道给读者推出耳目一新的市场理念,为"如何改革开放"出谋划

策，而且以它的独立调查报道树立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媒体人风格，由此带动财经媒体同上一层楼。2001 年启动的《新财富》则独创另一种风格：以公司案例和数据为基础的深度分析为特点，以务实精神剖析公司“如何创业致富”的策略。《新财富》的风格也影响了其他媒体。2001 年创办的《经济观察报》以理性和建设性定义起风格，为读者提供深度政经新闻、把握新的财经理念潮流。还有《21 世纪经济报道》和《中国企业家》等报刊，通过经济理念与新闻、数据和案例相结合，让国人的经济与商业知识日益剧增，加上这几年风风火火的 EMBA 教育，这些是过去多年里中国现代经济学家传授理念、论争学说的主要平台。他们为培养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贡献非凡。

## 对未来的展望

过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使正规课堂无法为国人提供分析、理解变革过程中的繁杂经济现象，这一局面给大众媒体提供了一次给社会补经济学课的机会，但 EMBA 和大众媒体的补课只能解决“近渴”，并不能从根本上代替正规教育平台。为了满足市场改革的需要，我们必须改变中学和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由于政治经济学是目前大多数人受过的唯一正规经济学教育，而政治经济学课中的概念不外乎是“剥削”、“唯劳动创造价值”，等等，这些概念有必要加一些精确定义和调整。过去二十几年的现实成功告诉我们：市场交易不是像我们以前所理解的“你赚我亏或我赚你亏”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双赢的价值交换；民营化和私人产权也并不是那么可怕，而是一种增加整体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行政管制不是救世主，它们反而会增加寻租机会、降低市场效率，政府越不管的行业往往是越兴旺的行业—— 这些和其他市场经济观念应当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如果过去英国的经历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媒体读者对经济理念的需求和耐心也会逐渐减少，人们对“如何赚钱”和商业信息的兴趣会逐步胜过对经济理论的兴趣。迫于生存的压力，财经媒体会慢慢减少其“经济学教育”的角色，像《华尔街日报》那样选择更侧重商业新闻与财经信息。经济学教育应该回到大专院校和中学课堂上。这也要求调整政治经济学和专业经济学的内容，使未来社会人心里掌握的经济学尽量跟现实经济逼近。

我们经济学人有责任改变目前人们“精神是意识形态化的经济而物质是市场经济”的局面，否则这种“双重人格”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长久因素。

那么，除了经济学教育之外，经济学研究呢？最近20年许多同仁为改变中国经济研究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如果说哈佛《经济学季刊》和英国《经济学学报》当年的创立曾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开始，那么，中国不是已有不少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类学报吗？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只看学报的名称而不看其内容。除了这几年像社科院《经济研究》、北大《经济学季刊》等学报之外（好的学报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一些学报实际上与大众媒体无实质差别。我们大致可从两方面判断一门学科是否达到足够的专业化深度。第一，如果其学报文章是一般受过大学教育的读者就能读懂的，那说明该学科还不具备“专业性”，说明它还没走出大众媒体的范围。第二，看从“外行”变成该学科的“内行”需要多少年的学习与研究，需要的年数越多说明该学科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对其中心问题的研究应该越深。反之，如果一学科的学报跟报刊文章或者政治文献一样的易读，那么该学科的路就还很漫长。按照这两个标准，让我们自己去评判一些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水平吧。

正在中国进行的变革包括三大方面：其一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其二是从国有经济（计划经济）转向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其三是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这三方面的任何一面都可给一个社会带来深度的震荡，何况是三大变革同时进行呢？由此引出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学术创造机会，让我们能得到在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过的经济事实和问题，这无疑有助深化人类的经济学知识。但是，机会不等于必然的现实，关键还在于学术研究能否自由，去意识形态化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能进步、能进化的必要条件。

当然，上面的讨论可能让人觉得我在声称有“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这回事。其实不然，据本人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跟各国人的交往，我不觉得人的本性会因肤色、语言或国界而异，只要人的本性是无国界的，经济学就只有人类的经济学，像物理学、化学、数学不分种族和国家一样。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的不同经济经历应该能帮助我们“证明”或者“证伪”依据其他国家的数据还无法“证伪”的经济理念。如果是这样，通过对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的研究，我们或许能排除掉某些到

目前还无法排除的经济理念，也能推演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历还没能推出的经济理念，但这不是要以“中国的经济学”去替代世界的经济学，而是要对现有理论进行细化和深化。

从经济学史的角度讲，当经济学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从西欧转移到美国之后，由美国学术界把“数理逻辑”和“计量实证”引入经济学研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突破，数理逻辑的引进顿时改变了以往社会科学理念不便于“证伪”的弊病，以往定性的分析使其结论甚具模糊性，使研究者无法将其“证伪”（或“证明”）。但是，数理推论使经济理论的结论便于受到数据的直接检验。而“计量实证”方法又让我们能直接应用统计学等学科的成果，使经济理论服从于更为严谨的科学检验，以免我们接受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论。虽然数理方法不是研究经济学的唯一方法，但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领会过去两百多年在世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在那个基础上去创造，这样中国才不仅有“经济”而且还有“学”。

# 走近"经济研究"
## ——初读《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张　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有人说，研究经济的职业人士也不一定都真的理解经济研究的过程，他肯定会被认为是在口吐狂言。不过，下面这段话多少会让我们冷静：

实际上，我们的确可以从评阅送交刊物发表的原稿中，看出作者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缺陷。笔者为许多杂志的编辑评阅过许多论文。根据笔者的经验，在最初提交的稿件中，有一半以上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存在某些基本缺陷。这些缺陷通常并非出于经验分析或数理方面的错误，共同的问题是，或者对所面对的研究（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对研究目标缺乏清晰简明的理解，或者对有关先期研究未能提供完整的参考文献，或者疏于对有关的概念基础或理论基础给予足够的注意。

这是我最近读到的出现在《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英文原名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Applied Economics*；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年中文版）一书"导言"中的一段话。这部由美国作者唐·埃斯里奇（Don Ethridge）撰写的经济学研究生的教科书，其目的是对经济研究的方法论的程序化方面做出深入的"研究"和叙述。但它显然也是一部研究"经济研究"的学术著作。由于我近年来对经济研究的程序化过程颇为关注，因此这部著作成了今年以来吸引我的为数不多的学术著作之一。

我虽然从事经济研究多年，可是我想我们大多数人至今只是这一课题的学生而不是它的权威。我从来不认为诸如“什么是研究”以及“如何做研究”这样的问题是故弄玄虚。事实上，犹如作者所说：“‘研究’这一术语会激起人们对一些活动的想象，而对大多数一般人来说，这种想象或者说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错误地得到的。这是因为，恰巧有一些专业化活动正是这样的。按照许多人的想象，忙碌于实验室的那些人，身边到处是试管、化合物和正在研究的物体；而在图书馆里，他们则被淹没于堆积如山的文献中。虽然这两种活动正确地代表了一些研究方式，但他们都不能完整地提供经济研究过程的图景。”（第16页）我记得伦敦大学的研究生在注册时都会领到一本关于如何做研究以及如何撰写科学论文的手册，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年之前我就听说，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曾对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缺乏对学生在从事经济研究的程序化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深表担忧，并强调指出，如何欣赏经济学研究论文，如何组织和从事经济学研究，是完成研究生学业和将来从事学术活动的基本要素。

不过，这个话题不仅仅与美国的研究生有关。这部著作对从事经济研究的“我们”也有相当的意义。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谓披荆斩棘。自然，不少人对这一艰难发展的过程有很多的解释，但最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概念的冲突。我们传统上理解的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是不同的。特别是，我们所理解的经济研究在方法论的程序化方面与现代经济研究是有相当距离的，这还不包括我们对现代经济学还存在着一时还难以澄清的许许多多的误解。近年来，我的脑子里常在反省着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刊物所发表的数不尽的文章中，即使“研究”经济的，有多少（包括我自己的）可以算作经济“研究”的呢？我之所以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研究”这一概念有时候在我们这里好像已经被滥用到了完全丧失其含义的程度。事实上，“研究”这一概念的滥用正在使我们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受到更严重的损害。对这一问题的更加清醒的认识会在阅读了这部著作对科学的经济研究程序和制度规则的“研究”之后很快得到。

我不想把埃斯里奇在书中对“经济研究”给出的定义在这里复述出来，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无法将我对作者原义的理解表达出来。我宁可把我的解释融进原作者的定义中，但我将使用原作者所有的“关键词”。于是可以这样来定义“经济研究”：经济研究是寻求经济事件、现象或经济诸现象之关系的可靠的解释，而可靠的解释只有在一个有

计划的、设计得当的并且科学细致的理性程序中才是可能的。这种程序遵从了科学界和学术界的某种公认的规则(我综合了作者第2章和第3章的主要认论点)。也许,人们对这一定义所可能产生的唯一疑问是,经济学研究为什么要对研究的程序作出类似自然科学般的要求,这样的要求很容易唤起人们对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争论的回忆。自然,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以及那些本身不能受控的或不能在实验室进行实验观察的现象。但是,正如埃斯里奇所提到的那样,其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可能仅仅在程度上而已。而且,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经济学有为了找到替代实验室的方法已经发展了更为复杂的多变量概念和计量分析的技术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人由于经济学不能利用传统的实验室或者由于它的研究领域所限而将其排斥在"科学"范畴之外,其实他们只是根据特定的方法而不是根据方法论(即研究的程序和遵从的规则)来给科学下定义的。所以,从经济学所积累的知识基础,它的描述性知识和程序方面看,它当然是一门科学(这是我对第3章前半部分论述的小结)。

可以见得,这样定义的经济研究,作为一种具有严格规范和研究程序的科学探索活动,显然是受到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虽然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全然信奉纯实证主义哲学,但源于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自从19世纪末马歇尔时代以来确实已发展成为经济研究的主要的哲学基础,其影响力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是独一无二的。在此之后,一股实用主义而非实证主义思潮开始对经济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由于实用主义者的主要兴趣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解释"问题,因此,实用主义者并不太关注规则性知识的增长,而仅根据概念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实用性来评价理论。与实证主义哲学在经济研究的专业基础问题上的持久的影响力相比,这种实用主义的影响还主要局限在"非专业基础问题"的研究方面,包括专题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

谈论实用主义,我不得不提到中国经济学界近两年出现的一些值得担忧的倾向。可以说,也许受制度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制度学派被认为带有某种实用主义的哲学基础),以一种肤浅而又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正成为一些学人用来呼唤"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的衣钵。更有甚者,有的人竟把十几年来成长起来的中国新生代经济学用"屠龙术"做了几乎全盘的否定。甚至,还对经济学家做了这样的讥讽:"一些据说曾轰动一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纸上纵马驰

骋之时游刃有余，而一将理论用之于实践则一触即溃，凡‘下海’者大多铩羽而归，偏偏是那些未入流的准文盲在商海中如鱼得水。”“实用主义”的逻辑在某些学者那里发展到如此极端乃至荒唐的地步，我只能感到失望。更让我失望的是，类似这样的言论在今天居然能够赢得不少的轰动和喝彩，这只能是一种可悲了。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水平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但整体来说在国际上还是相当落后的。我特别认为，原因主要是“经济研究”还不被作为一种严格遵循科学程序和规则的寻求知识增长的系统过程。“研究”的程序化还不被广泛接受。结果，实证性的研究难以受到真正的重视，要么用实用主义取代实证主义，要么把实用主义庸俗化，严重影响了经济研究水平的提高。在这种局面下，我们的大量对策研究的凭空想象和粗制滥造就肯定不可避免了。不过，要使这种局面有所改变，我们大家所要努力的不是什么“将经济学重新引回到道德的、政治的道路，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而是脚踏实地树立经济研究中的制度规范，提倡并鼓励经济研究中的逻辑经验主义精神，健全经济学家的理论素养。实际上，我从埃斯里奇的这本著作（特别是第4章）中得到的一个认识是，对经验主义的依赖并不完全排斥实用主义。以计量经济学来说，它的发展不仅为在经济研究中使用数据检验理论假说的有效性，同时也为政策研究和建议奠定基础提供了可能，从而它不仅代表了一个兴旺的研究领域，实际上也构成了每个经济学家的基本分析训练的一个必要知识和技术。因此，正如埃斯里奇所说的那样，“计量经济学包括经验资料和计量，这使计量经济学更具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性质，并使它不再仅仅是数理经济学的抽象逻辑。”（第80页）可是，如果把实用主义“庸俗化”，甚至彻底排斥逻辑实证主义，那么对我们经济学和经济研究水平的提高确实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好的，现在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埃斯里奇的“研究”中去，探寻他所指的经济研究的程序化过程。

那么，研究程序化是指什么呢？埃斯里奇实际上用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从第5章到最后的第10章），也就是在书中的第2篇和第3篇做了全面的“研究”。研究的程序包括研究计划的设计（第5章的内容），研究性问题的提出和表述（第6章的内容），文献的检索、评论和参考文献的注明（第7章的内容），概念框架和理论假说的建立与逻辑检验（第8章的内容），经验方法和检验程序（第9章的内容）以及研究论文的写作（第10章的内容）。接下来让我主要针对第6章关于研究

性问题和第8章与第9章关于概念框架和理论检验的问题做一些评论,因为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在经济研究中澄清一些方法论上存在的误解是有重要意义的。

埃斯里奇把研究性问题与决策性问题作了区分,因为研究性问题需要的是认识、描述和解释,一句话,是知识;而决策性问题则需要知道采取什么行动。他说,"我们所有人都面临决策问题和行动问题,问题在于,对于行动或要做的事情,要在不同的路线之间进行选择。研究可能提供知识和规则,但它不能做出决策和执行决策。"(第112页)在基础的专业学术研究中保持研究性问题与决策性问题的距离并不是说决策问题不重要,而是希望作为决策问题之基础的知识或信息尽可能保持中立和客观。事实上,在政策制定和行动决策中遇到的问题往往并不是基础研究中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专业内提出的问题。这使得经济研究的结果大多数往往仅使专业内的同行感兴趣,而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正因为这样,除了专业基础研究之外,我们还需要专题研究和对策研究。对后者来说,研究性问题与决策性问题被联系在一起。不过,遗憾的是,埃斯里奇的书是一本谈论经济研究方法论的著作,这个问题好像特别由研究性问题所提出,因而对决策性问题没有展开讨论。

研究决策性问题确实是非常难的一项工作,其主要的困难在于,研究性问题的结果并不总是能为决策性问题的研究提供直接的帮助。就其性质而言,决策性问题常常迫在眉睫,这与专业研究本质上是累积性的发展过程形成一对矛盾。在经济研究方面,这种矛盾可能表现为,一方面,经济学家常常基于已有的理论知识对政府的政策持批评性意见;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又在重大的政策选择问题上争执不尽。有很多原因使我相信这对矛盾不会消失,只会发展,正因为如此,经济研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才被格式化了。在一些公共决策问题上,当经济学家经常因之被抱怨、被批评和被怀疑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了一种方式——一种经济研究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式(这使想到了经济研究文献中所谓的"墨菲定理")①。遗憾的是,这种方式(至少在职业经济学家之外)好像还没有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更广泛的认同。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是一门按照模型进行思维的科学。这句话点

---

① 大意是,经济学家们最有发言权和观点最为一致的理论对政策反而最缺乏影响力;经济学家们知之甚少和争论不休的理论,对政策却最具影响力。

出了概念框架在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也是埃斯里奇的第8章所研究的问题。他把经济研究中的“概念”定义为“对一个或更多关系进行思想的逻辑结构。”(第145页)他说,“概念化针对问题而不是目标或方法。它纯粹是概念性的,即不考虑经验证据或资料,它的主要功能是形成有意义的假设并为其正当性提供思想基础,进而,这些假设还要经受检验。”(第146页)显然,概念化的主要功能是帮助研究者形成理论“假说”,即形成有待经验检验的尝试性断言。假说是概念框架中逻辑推理产生的结果,根据我的理解经验,这个逻辑推理的主要方式是尽量道出可检验的命题来(最常见的检验是统计检验)。埃斯里奇转引的古德和哈特(Goode and Hatt)在《社会研究的方法》(1952)中的一段话也阐明了相同的含义:“演绎的系统阐述,……构造出一个假设;如果得到证实,它就成为未来理论结构的一部分。因而,十分清楚,假设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的确非常密切……虽然两者决不可能完全分开是一个事实,但是,将它们视为科学增进知识的方式的两个方面却是有益的。理论阐述的是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这一关系有效,根据这个理论,则可以演绎出应该是真实的其他命题(假设)……假设期待的是,命题可以通过检验来决定它的正确性。”(第153页)

定性的假设,无论是预定假说,还是诊断假说,一般都把“逻辑一致性”作为其合理性的检验标准。为了便于经验检验,埃斯里奇基于他人的研究提出,定量的理论假说则应该具备下列的一般特征,即,假说必须用术语做出具体的陈述;必须具备可利用的或可生成的资料;必须构建得足以运用分析的技术以及必须有一个概念的基础。

对于概念化(理论的构造)的实施程序,埃斯里奇在书中认为至少应包括以下步骤:领会与你的研究有关的研究文献;把问题尽可能压缩到最简单、最有条理的程度;确定可应用的经济理论;用一个基本模型开始分析的概念化过程;将分析模型的分析扩大到问题的其他方面;从概念分析中发展出有关的和可检验的理论假说,并尽量按逻辑顺序给出。

既然概念化的过程往往始于模型,那么一般来说,理论模型的建立是经济研究工作中最难也是最充满想象力的工作。对经济学家来说,模型的建立全部或部分地来自于现有的经济理论,常常是为了解释特定的问题而对现有的理论作出某种改造。模型可以是理论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但往往是借助于数学公式加以表示。埃斯里奇在书中借用布雷迈尔在其论文“农业经济学中的科学原则和实践”中的一段

话表达了对数理模型的基本看法:"数学方法的使用不能替代严谨的理论阐述……相反,它本身要求对其组成的结构作出更准确的理解。"(第165页)

在经济研究中,概念化过程之后的工作就是检验假说的工作。埃斯里奇在第9章作了分析。埃斯里奇提到,在经验检验方法的发展历史上,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作出了重大贡献。穆勒对实验设计进行了形式化,特别是穆勒提出的"一致方法"和"差别方法"对实验科学和实证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同地,穆勒的实验方法的原则在今天仅被视为"相关"关系的证据而不被当作因果性结论。经济学研究的幸运之处在于,随着20世纪初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采用,将穆勒的"差别方法"的思想发展了。统计技术,特别是回归分析的广泛应用,使经济研究在"受控实验"不可能的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控制"不同变量的手段。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更是极大地推动了经验手段的进步。不过,经验观察和统计/计量技术仅能帮助我们建立和确认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或存在相关性,而因果关系的证据只能来自于概念和理论模型的推理。

我相信,许多经济学同行都会对这一理论框架的构建方式表示认同,而且我们很容易在欧美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大量的经济研究论文中找到这一研究范式的影子。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该书的每章末尾都建议读者从近期经济学杂志中选择并仔细阅读论文的理由。事实上,至少我的个人体会是,经常阅读(真正的)经济研究论文是掌握研究规范和改善研究水平的有益途径(我想提及的是,在《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最后附有一篇博士论文的典型范例,值得研读),因为每一篇经济研究的好论文都成为我"走近"经济研究的新起点。

至此,埃斯里奇的这本著作我已经基本读完了,但有关"经济研究"的话题还有很多。我记得1995年我从美国访学回来后曾与《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高小勇先生商讨,决定在"该报"上开避一个栏目,专门为读者就如何做经济学研究提供探讨的阵地。为此我还写了按语,其中提到了克鲁格曼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我是怎样做研究工作的"。这一文章的具体内容我已基本忘却,但现在仍能记起他总结的"研究之规则":①Listen to the gentiles;②Question the question;③Dare to be silly;④Simplify, simplify。我想,在经济学说史上,这四个规则的每一条都可以讲出许多故事来的。我平常喜欢通读很多学问家(特别是从事自然科学的大师)的自传,因为我发现往往从

这些传记中我们才能真正领略到他们身上的科学精神和治学的经验。治学本身是一门更大的学问。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竖立着一块刻着复旦校训的大理石，它上面的文字精炼地记述了中国传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它似乎以更简化了的（借用克鲁格曼的第四条）结构也表现了同样的精髓。不过，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是“行动”。

#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及其现代危机

汪丁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本年度[①]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kas）及其“理性预期”学派获得。关于罗伯特·卢卡斯理论的渊源及其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我已经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 年 11 月的文章中叙述过了。这篇文章进一步探讨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在近百年里，由阿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正式肇端的经济学理性主义，以“均衡分析”为基础，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被几位分别得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包括罗伯特·卢卡斯）推展到了某种极端地步。在我看来，这场“百年运动”正把经济学带到社会思想界自孔德（Auguste Komte）时代就开始注意到的所谓“现代危机”。

##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

阿尔弗莱德·马歇尔在 1920 年第八版《经济学原理》的序言里指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物学进化论的，一个是牛顿力学或机械论的。前者靠了“物竞天择”的假设解释世界，后者则从“理性假设”推导出均衡概念。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们从 50 年代开始不断地论证说，理性假设足以解释那些能够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以家庭选择为例，如果最初有两类家庭：一类是胡乱花钱，随机消费；另一类则遵从微观经济分析，仔细计算每一分钱的最大效用。那么千百年以

① 指 1995 年——编者注。

后，当我们来观察这个社会时，我们还可能看到那些随机消费的家庭吗？他们毫无疑问地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生存环境，这里确实是演进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设他们消失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性。如果两种方法是等价的，那么均衡研究显然有着实证方面的优越性。因为我们可怜的理解力很难把握德莫克利特那条永远流变的河。“稳定”，这是我们人类理解世界的最低要求，我们的头脑实在是太愚钝、太缓慢了，对转瞬即逝的现象我们只能感到困惑和神秘。马歇尔有很强大的哲学训练，但是他选择了均衡分析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从实证角度建立了均衡分析方法的经济学理性主义，其所理解的“理性”与1737年写《人性论》和1748年写《人类理解研究》的休谟(David Hume)一模一样。在后者看来，这样的理性也同样存在于动物身上，因为无非是经过长期条件反射形成的行为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是芝加哥学派，通过1920年奈特(Frank Knight)和扬格(Allyn Young)的连接，直接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但是这个经济学主流和正宗，在其传播过程中，受到其他大学那些强调数学分析的经济学家的(也许是竞争性的)影响，在社会思想方面逐渐远离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如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创的传统。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开始，到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1970年得到诺贝尔奖)为止。第二阶段由阿罗(Kennith Arrow，1972年得到诺贝尔奖)的一般均衡分析开始，到80年代后期止。第三阶段由博弈理论家们以博弈论方法重写经济学开始，至今方兴未艾。

在第一个阶段的发展中，均衡分析受到来自另一方面，即进化论方面的挑战。许多大师级经济学家如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哈耶克(F. Hayek，1974年得到诺贝尔奖)、西蒙(Herbert Simon，1978年得到诺贝尔奖)、钱德勒(Alfred handler)和卡尔多(Nikolas Kaldor)等人的批评。批评和反批评的焦点，我认为集中于对“理性”的理解上。局部均衡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前言中说的，是假定在所分析的事物之外，一切事物都不发生变化(other things being equal)。反对的观点来自几乎全部可见事实：企业家创新(熊彼特)，所有观察到的企业决策者的“有限理性”(西蒙)，工业资本主义组织的“动态过程”(钱德勒)，均衡分析与现实“非均衡世界”的不相关(卡尔多)。而哈耶克自始至终相信“理性”对传统的依赖性。

我想把他的更本质性的批评留到文章最后一节讨论。

不论如何受到批评,均衡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在1947年被一位精通当时数学各种方法的学生——萨缪尔逊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地建立起来。所谓"系统地",是说萨缪尔逊的工作如此彻底,他运用数学工具于经济分析是如此娴熟,以致今天(9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里,这种方法已经被写成可以机械地一步一步执行的"菜谱"和计算机程序。人们可以不用任何思维就从输入一组"数据"得到关于整个问题的解答。使用方便,在各种学术传统的竞争和继承中显得格外重要。萨缪尔逊为此得到了他的诺贝尔奖。

在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二阶段,阿罗领导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并使其成为公认的经济分析的语境(即对话双方得以相互理解的背景环境)。例如,当经济学家谈到"效率"、"福利损失"或"国民生产总值"等问题时,他们往往已经假设了一般均衡的存在,并以所谈论的状态和假想中实现了的一般均衡状态作比较。阿罗的工作基于希克斯(John R. Hicks,1972年同阿罗分享诺贝尔奖)40年代的研究。希克斯在研究中总是注意到在两个商品相交换的市场之外还有另外第三个市场(例如"一般等价物"的市场),正是这三个市场同时达到的均衡决定了每一个特殊市场里的价格。这是一般均衡的思想。

"理性假设"发展到了这一阶段就与博弈论相接了。德布鲁(G. Debreu,因一般均衡理论得到1983年诺贝尔奖)证明一般均衡(即所有市场上的均衡同时实现)的存在性,用的是卡库塔尼不动点定理(Kakutani Fixed-point Theorem)。而博弈论中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的存在性也用到同一个不动点定理(或它的等价定理)。这两者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如果每个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的条件是依赖于其他市场上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时的状态,那么如何保证所有的市场同时达到它们各自的均衡呢?在博弈论里这个问题变成了:如果每个人的最优决策都依赖于他对其他人行为的(均衡的和非均衡的)猜测,那么如何保证所有人的猜测同时达到某种"集体"均衡呢?这类问题由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解决(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初的连载文章)。一般均衡理论是理性主义运动在这一阶段的主流,尽管我们知道同时期还有"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

"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卢卡斯,还有汤玛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罗伯特·卢卡斯在1964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去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至1970年。这一时期他集中于

单个企业和工业的最优投资理论的研究。当时,这是聚集了宏观经济学三大重要问题(凯恩斯政府调节理论及其反对派、经济周期问题、资本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焦点所在(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 年 11 月的文章)。正是这一时期的工作影响了卢卡斯在"理性预期"方面的研究。卢卡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理性预期"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这种影响用一句话说就是:当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决策往往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时,我们根据同样的"对称性"可以推断。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和憧憬也往往影响我们现在的决策。难道不是吗?一个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应当想到未来的工作问题,于是分出一部分时间联系可能的工作单位。父母们总试图设想孩子的未来并且根据他们的设想规划孩子的学校和专业。对核武器的杀伤力的预期使目前的防卫策略变成了真正的预警和攻击策略。卢卡斯进而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企图把私人企业当成机器,通过政府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思想。因为真正在进行的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而不是谁控制谁的问题。我们应当研究的是这场博弈的均衡,而不是什么社会控制过程的"最优化问题"。

理性主义运动同时还在如下领域兴起:动态经济学,如上所述,主要受到资本理论研究,以及 20 世纪 20 到 30 年代拉姆希(Ramsey)最优储蓄理论、侯太灵(Hotelling)资源最优消耗理论的推动;家庭经济学,时间分配与生育率下降的选择理论,这方面,以贝克尔(Gary Becker,1992 年得到诺贝尔奖)为首的研究已经为人熟知;劳动经济学,以信息搜索模型表述的最优寻找理论,以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82 年得到诺贝尔奖,芝加哥学派领袖)为首;公共选择理论,把威克赛尔(Knut Wicksell)的"一致通过"理论结合于"选票市场"的设想,以布坎南(James Buchanan,其新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得到 1986 年诺贝尔奖)为领袖;公共财政理论,先是梯伯特定理(Charles Tiebout Theorem),建立了国内自由移民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后是围绕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o Equivalence Theorem)展开的讨论,与上述卢卡斯的工作有关,认为政府税收(等于政府开支)等价地减少了私人开支,以巴罗(R. Barro)为重要人物;新经济史学派,重新认识"奴隶制度"的合理性,以福格尔(Robert Fogel,得到 1993 年诺贝尔奖)和巴塞尔(Y. Barzel)等人为首的研究;技术进步理论,例如,认为技术与制度进步都可以由市场上要素的稀缺性和市场价格诱导产生,以哈牙密和罗丹(Y. Hayami, and W. Ruttan, the school of "induced-institutionalchange")为首。

在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了用博弈论重写经济学的运动。所谓"重写"其实是重新解释。记得哈耶克在临终前最后一本书中写过,他对博弈论研究方法寄予一定的期望。关于博弈论,香港读者已经不会感到生疏了,因为从 1994 年博弈理论家获得诺贝尔奖以来,本港新闻报章曾经着了魔般地宣传过大约半年吧?! 不论如何,博弈论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使用的最好的工具了。当理性主义运动把经济学家们带到信息社会的 90 年代时,他们发现处理的几乎所有经济问题都应当被理解为理性的人们之间交互作用进行决策的问题。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告诉我们,在后工业社会里,我们玩儿的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the game between persons)。在认识我们社会的现代危机方面,经济学家已经落后于其他领域的学者了!

克莱珀斯(David Kreps),这个年轻的博弈论"四人帮"首领,他应当与宾默尔(Ken Binmore,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弈论基础研究者)并列,成为首先认识到博弈论存在的基本问题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及文章太多,这里不一一列出了,读者可以参看他们最近的著作:克莱珀斯,《博弈论与经济建模》;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在博弈论研究中,诺贝尔委员会实在是忽略了大多的杰出贡献者(例如 Rober Aumann,John Shapley,Herbert Carf,Martin Shubik……)。在三个得奖者中,只有纳什(John Nash)那种真正天才的(具强大想象力的)开拓性的工作(有些仅仅是笔记)使他当之无愧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不过,海深义(John Harsanyi)对政治和道德哲学的关心,使他成为把博弈理论应用于社会基本问题研究的先驱者。

我们看到,诺贝尔委员会把 1995 年的奖项给了卢卡斯及其"理性预期"学派的工作。从上述理性主义运动的广阔意义上看,这只是 1994 年博弈论得到诺贝尔奖的余音。

## 作为"极限"的理性与"理性主义"的极限

如上述,主流的正宗的经济学家们,继承了休谟开创的经验主义传统(以及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把"理性"假设作为一种方便的"工具"推展到了极端的境界。以贝克尔后期工作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为例(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 年上半年连载文章,又载

《经济研究》1994 年 7 月),在贝克尔模型里,第一代家长在决策时使用的是所谓"王朝效用函数"(dynastic utility)。我们可以理解,贝克尔是依据了同样的,上面引述的他反击进化论时的理由——那些能够生存下来被我们观察到的家族或"王朝"看上去一定是理性的,祖祖辈辈最大化他们王朝效用函数的家族。但是当我们在博弈论中试图接受贝克尔的观点时,我们会遇到麻烦。

克莱珀斯和宾默尔详细讨论了纳什均衡的意义,他们的结论,像老前辈阿曼(R. Aumann)的看法一样,仍然是:所谓"均衡"只不过是大家都认为显然的游戏的一种玩儿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大家都认为这同一种玩儿法是"显然"的呢?克莱珀斯在《微观经济学教程》第 410—417 页列举了五种解释。总括来看,这些解释最终依赖于人们共享着的知识传统的特性。这在我自己的研究里称为"知识结构"。

举一个例子说,在著名的"囚犯悖论"博弈里(参见前引的我在《信报财经月刊》的文章),两个囚犯都知道互相信任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他们仍然选择了"不合作"的策略,即纳什均衡。每一个人的推理过程都是无限理性的:假如我选择"合作"策略,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必定是相信他也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根据了什么理由选择与我合作呢?必定是他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为什么相信我将选择"合作"而不是"不合作"策略呢?必定是他认为我相信他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根据什么理由相信我将相信他将选择"合作"策略呢?必定是他认为我将相信他将会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如此类推,以致无限多的"但是"。通过这个过程达到的极限状态的知识在博弈论里叫做"共享知识"(common knowledge)。读者能够想象这个无限的推理过程吗?不仅读者想象不了,连西尔顿(R. Selten,1994 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认为人类理性不大可能完成这么无限的任务。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芝加哥学派的那个著名的理性主义辩护呢?在贝克尔或卢卡斯的理性选择模型里,人的理性只需要计算无限遥远的将来的成本与收益。这在芝加哥学派"理性与演进淘汰过程等价"的道理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时,彻底的理性假设就要求博弈各方做上述的无限推理。那是一种无限的"由己及人,由人及己"的反复过程。如果我们仍采用芝加哥学派的论证说:那些存在的、被观察到的行为,一定是均衡的,看上去一定是理性的结果。那么我们就等于取消了博弈论研究的目的。不是吗?博弈论学家们关心的正是在

许多可能的均衡中，人们将会停留在哪些均衡状态里。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判据来排除一些可能的均衡状态，来认定一些更可能出现的均衡状态。我们完全无法接受“凡是存在的必是合理的”这类黑格尔式的论证。结论：“芝加哥学派辩护”在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博弈论阶段完全无效。

现在让我们站在一个超越经济学的层次来看待这个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困境。早在维也纳小组的核心人物恩斯特·马赫的时代，研究知识论的学者就已经表述了上面那个令读者头痛的博弈论里所谓的“共享知识”(common knowledge)。用分析哲学家魁恩(W. V. Quine)的术语，当我认为“我知道”的时候，我知道了某件事情。当我认为“我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我已经确认了“我知道”这件事。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必要无穷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也就是说，我们说两次“我知道”就算是到达一个“不动点”了，就是均衡了。但是博弈中出现的问题不是重复说多少次“我知道我知道”，而是重复推演无数次“我知道他知道”。这才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困难。用胡塞尔(E. Husserl)的术语，这叫做“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指称一件知识当我认为真确时，是否别的人也认为真确。我以为，由“主体间性”及其缺失所产生的“现代性危机”，是当代社会思想关心的核心问题。

在社会学领域中，孔德(Auglistu Komte)、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和帕累托(Viifrado Pareio)，都已经强烈感受到社会进入现代时的那种“基础瓦解”的失落心态。是什么东西造成社会基础的瓦解？什么是一个社会的基础？这些问题正是早期社会学大师们研究的主题。上述社会思想家们思考得到的结论是：知识的分裂，每个人(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占有与其他人不同的知识，这造成人们价值观念的分野和进一步瓦解了社会的道德共识。我们从美国最近的辛普森审判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律知识的局部化造成陪审团的决定是多么出人意料。事实上你从大街上找不到一个人，他或她的知识结构不使其从其局部的特殊主义的角度(肤色、职业、国籍，等等)来理解原本应当是普遍主义的法治下的法律。这就是我们的危机。

在经济学自己的传统里，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已经说得很明白：“只有习惯可以使动物由刺激它们感官的各种物象来推测其恒常的伴随，并且使它们的想象在所谓信念的特殊方式下根据一个物象的出现来构想另一个。在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事情方面，不论是高等

的，或低等的，它们这种作用，只有这种解释，并没有其他解释。”（中译本95页）哈耶克非常重视休谟的这个思想。在他自己的主要著作《致命的自负》中，休谟的这一思想实际上被表述成哈耶克体系的三个思想来源之一。哈耶克论证了为什么“理性”只能是从传统中习得的理性。不仅如此，哈耶克进一步论证为什么传统常常必须在同当代理性的斗争中才获得继承并建立与之符合的新的理性（“理性在服从传统中变成理性”）。

让我总结一下。我们从非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得到这样的印象：如果均衡（例如纳什均衡）是一群人得以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共享知识上面的。这个共享知识在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中叫做“主体间性”，在社会理论中叫做“道德共识”，在哈耶克看来叫做“传统”，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叫做“知识结构”。不论如何，这是一种“共享的知识传统”，它使得人们在许多可能的均衡策略中一眼就看出哪些是“明显”的玩儿法。博弈论研究交互作用的一群人的均衡的存在性和实现均衡的条件。所以它迟早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是说明共享的知识传统如何影响博弈均衡。我的阅读表明，目前的理论家中只有三个人的著作表现出他们对这个基本问题是意识到了的。他们是宾默尔、克莱珀斯和绍特。为了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经济学必须结束它那种“帝国主义”态度，虚心向非经济学家学习，必须重新了解我们经济学所使用的“理性”的含义，甚至必须先了解“意义”的意义。我们不必从头开始，非经济学的学者们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沿性的思想，我们一直以来的问题是“视而不见”，也许因为我们自己的学术危机尚未降临吧？

目前，由博弈论重写经济学的理性主义运动正在方兴未艾，我不想给读者独断性的结论。我的文章的结论只是勾画出我对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现代批判。这种批判的方向是把经济学带回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去。希望我的“批判的批判”引起更多经济学家或非经济学的学者的兴趣，以便对经济学未来的走向作深入思考。

#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

汪丁丁

理性主义历来是经济学家的信条，“经济人”假设正是以理性算计为基础的。但是这一信条愈来愈受到人类社会实践的挑战。就对社会学而言，源自古典的“社会何以可能”的基本问题，正在与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理性行为”日渐密切地结合起来，融合为一个问题，即“统一理性是否可能”，并以现代性问题的转换形态摆放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面前。这或许为打破18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专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壁垒提供了某种契机。

## 引　言

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经济学的各种现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数学描述，基本上是从阿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作“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①，并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各国经济学家介入政治经济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制度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路行进。除了韦伯研究过的例子外，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过程中迅速兴起的期权交易制度。在期权市场上，人们几乎完全按照伯莱克-希尔斯（两位沿袭了经济学主流学派的金融理论家，1997年诺贝

① 此处只讨论理性主义的“基础”，对一百多年以来的“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可参看汪丁丁在1996年的有关综述（见前文——编者注）。

尔经济学奖得主)定价理论来买卖期权,偏差一般不超过理论价格的5%。相应地,1997年以来,其他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围绕这一理论迅速发展(汪丁丁,1997a)。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他地方。由此可以声称: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大部分制度经济学家,虽然站在经济学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着理性主义信条)。

由于对"理性"一词的诸多不同理解,我必须在阐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涵义之前,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1)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2)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而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统计性的,只能是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事件。(3)在对所有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两种力量是:①人的自利本性;②人的宗教倾向。(4)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A. Smith)《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里程碑的贝克尔(G. Becker)1976年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看法》的核心思想。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类社会的演进发生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大重要变化,迫使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须提出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这些变化是:(1)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知识社会"(汪丁丁,1994)。经济学家必须解释由此而来的问题: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术演变路径,知识产权,等等。(2)前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非洲和亚洲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国普遍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而构成这一"过渡"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结构)的大范围变迁(汪丁丁,1992)。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解释发生于这些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旨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及社会整体变迁过程,必须研究此类问题:新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业家能力的积累,政府

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自组织过程,革命与宗教行为……(3)首先从发达市场社会里提出来的,并正在成为所有市场社会(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不得不思考和处理的"未来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未来)问题,如环境与增长极限的问题(汪丁丁,1991,1997b),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理解这一人类基本生态过程的前景,并研究相关的问题:矿产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际间的"公平",对个体"理性"的重新理解,对"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对"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与道德和审美问题有关的"权利"界定。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超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们的提出或发生是基于上述三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人们自然要求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

当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时,这一解释的实质必须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经济学解释"。于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坚持经济学理性主义,但是也许不得不放弃对上述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要么修正经济学理性主义,而由此不得不导致对经济学基础的怀疑甚至动摇。

对于社会学理论来说,胡塞尔(E. Husserl)毕生与之纠缠而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始终以其社会学形态折磨着社会学家们——"人类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古典社会学家们[黑格尔,迪尔凯姆(E. Durkheim),韦伯(M. Weber),帕累托(V. Pareto)]发现了现代社会(道德共识方面)的危机;近代社会学家们[帕森斯(T. Parsons),米德(G. H. Mead),舒茨(A. Schutz),高夫曼(E. Goffman)]提出各种"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交流主义)以图解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而当代社会理论家们[哈贝马斯(J. Habermas),吉登斯(A. Giddens),以及法国学派诸家]则宣称"本体"消解之后,"社会"(各种制度的集合)本质上应当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其他个体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义宣言"姿态宣称过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对当代社会的人来说不再有效。当我们转向当代思想家们从"认识论过渡到新本体论"的视野时,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批评: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1)亚里士多德传统;(2)奥古斯丁传统;(3)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印度吠

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他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里研究文化冲突固然有意义,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整体性的(卢曼式的但不是"设计性的")解决框架,也许哈贝马斯的"交流理性"显示出最光明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在第三节里要讨论的,社会交往或博弈过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麦金太尔的批评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多均衡"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于是,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至少是那些理论社会学家们,不得不像当代经济学家们(或者理论经济学家们)一样,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

## 经济学"理性"的涵义

在前述已对经济学的"理性"涵义做了简要的推理逻辑的解释后,在此引述结论性的看法如下:(1)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①自利性(self-interest),②社会性(social affectivity)。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J. A. Schumpeter,其巨著《经济分析史》最初是为韦伯《社会经济年鉴》卷一写的社会学论文)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但是,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智仁(A. Alchian)]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the enlightened egoism),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像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2)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表示为"极小化原则")。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参阅冯·米塞斯 Von Mises,《人类行为》)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J. Bentham)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

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相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1902 年《经济学原理》第十版的序言)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在萨缪尔逊(P. Samuelson,1947 年版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3)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经济学由此与社会学面临着共同的基本问题。

首先讨论上述的第一个涵义——自利性假设。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假设,不论是被当成符合众数现象的假设,还是被看做"工具主义"的假设,都与达尔文进化论和后起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当代的"社会生物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并且,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对"自利性假设"的这种看法已经与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

英国经验主义的登峰造极者大卫·休谟(Hume)在《人性论》及《人类理解研究》中都说过: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这种动物的高度想象力所导致的种种欲望,大大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给予满足的程度,所以才发生了"财产权利"这件事。在休谟看来,人类社会界定"产权"关系,是为了给每一个个体那有限幸福的来源提供保护,免于他人无限物欲的侵占。休谟关于动物心理学和动物伦理学的论述,其晚年公开表示的"无神论"立场(即以经验论来检讨"神"的存在性),以及一生坚持的彻底的怀疑论,足以使他成为一百年之后的达尔文思想的先驱。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经济史学家认为斯密的国际贸易和货币流通理论,以及他的道德哲学,都深受休谟经验论的影响)那里仍然不具有进化论的形式。斯密在《原富》中阐释了两个主要思想:(1)一国劳动总量的年度产出可以大致作为一国国民财富的宏观度量;(2)人的自利性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分工演化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解释一切价格(在私有产权制下)的决定过程。其中第一个思想被研究者们公认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魁奈(Quesnay)的"经济表"(被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誉为与文字和货币并列的人类三

大发明之一)。斯密的第二个主要思想——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据考证分析,应当是受到当时不见经传的经济史家孟德威尔(Mandeville)的一本小诗集《蜜蜂传说》(The Fable of Bees)的影响,其中歌咏的是邪恶如何成为维持了蜂巢社会长期繁荣的唯一动力。作者在1714年重印诗集时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增加的部分名为《蜜蜂传说:或私己的邪恶,公众的福利,以及关于慈善和慈善社团的论文,关于社会的本质的探讨》;而在1729年又为这本小书增加了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蜂巢社会的长篇对话。其中明确提出:"……借了这个故事我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既非我们天性中的友爱性情,亦非我们克己所得的各种美德,而是我们在道德世界或自然社会里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首要原则,是一切交易与就业机会的无一例外的坚定基础,是它们的真实生命与护持。正是在那里,我们必须去探究一切艺术与科学的真实确切起源。正是邪恶,一旦消失,我们的社会必然随之瓦解……"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两个相邻的篇章分别批判了他的导师哈奇森(F. Hutcheson)关于人性本善和"仁者爱人"的论说,认为其教导中缺少"己爱"(self-love)的成分;以及孟德威尔的"邪恶"观念,认为其错误在于认"自爱"为邪恶。但是,无疑地,斯密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认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领袖、已故的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G. Stigler),在1976年《原富》发表200年之际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前言中说:"这并不意味着,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事实上,他的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就旨在探讨'同情心'作为美德的涵义……不过归根结底,斯密相信,那个最能贯彻始终的、最普遍适用的,从而也是最可靠的人类行为动机,是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斯密的立场是以人的自利本性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事实上,我们发现,斯密原著在论述人的自利性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隐含着承认当时苏格兰市民社会的种种合理前提(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文化的)作为经济发展的环境。一个刚刚从宗教社会启蒙发端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它的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卫道士的斯密,很自然地要强调人的自利本性,而不是沿袭宗教传统的说教来弘扬人的道德内涵。

斯密对人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首先是理论演化的结果:对立假设之间的争论最终会把对立面推到

极端。在近代学术中,这表现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此外,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是经济学必须走的一步。这在1950年初由两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完成了。艾智仁是最早提出"自利性"做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的经济学家。有了进化论做理论基础,艾智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一群赛车,我们不知道它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从而不知道这些赛车哪些能够到达终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到达了终点的赛车必定是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这些赛车手可以是盲目地选择路径,但是那些到达终点的一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这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假设,它不一定符合现实。这涉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内部曾经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长期的论战,最著名者如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M. Friedman,因货币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华盛顿大学的西尔博伯格(Silberberg)的争论(*The Mathematical Structure of Economics*,"导言")。前者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预测能力。后者则坚持经济学基本假设应当受到现实检验,否则从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来建立预测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就是合理的了(19世纪大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建立太阳黑子变动周期的模型以预测经济波动)。后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R. Coase,因研究社会生产的制度结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采取了西尔博伯格的立场。

不论如何,弗里德曼的立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艾智仁的进化论论据则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辩护。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最终(如果能够生存下来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话)会被迫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上停下来。这说明我们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这样,从进化论的论据出发,经过上述重要的方法论转折,经济学理性主义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或更一般的"极大化原则"。在数学表述上,"最大化"不同于"极值";后者只是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极大化原则使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理性行为的数学描述,并且提出定量命题用于经验检验。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从而都是经济理

论为“真”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坚持西尔博伯格的立场,那么我们的经济理论就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求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现实经验相符合,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正确描述(除非人类思维的逻辑不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在这里,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变成现实。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仅仅要求理论有好的预测能力。你可以观察太阳黑子,只要你能够准确预测经济波动。这种认识论立场包含着深刻的经验主义意识,或者,我可以说,包含着深刻的“怀疑论”意识,即怀疑一切牛顿式的、企图构造宇宙结构的理论努力。这种经验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理性顶多只能从统计方法来预测未来,至于统计关系后面隐藏着的构造关系,那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认知的。这不是说主流经济学没有理论,正相反,主流经济学充满着各种理论,各种以精确数学描述的经济理论。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工具性”的,与现实经验相比,都必须处于被检验的和可以随时修改或放弃的地位。芝加哥学派的这一立场使得主流经济学当代文献中,除了数学模型以外,还充满了统计数字和模型检验过程。从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这一转折(通过“极大化”原则)造成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可能。

我们看到,没有进化论论据,这一转折在认识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在经济学以外的各种社会科学中,进化论立场与理性主义立场几乎总是发生冲突,总是反映着两种相反的认识论。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自利性”假设,其解释力(从而预测能力)的根源在于: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当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非常接近社会学里面的行为学派的方法,后者的极端形式就是把人假设为只有“条件反射”学习功能的动物。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最单纯的假设下,行为学派确实获得了很大的解释力(George Homans,1987)。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到,当预测现实成为对理论有效性的唯一要求时,理论假设可以完全脱离现实,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做出(与现实相比)非常“强”的理论假设,只要它有预测能力。许多反对自利性假设的人,通过对企业家的大量调查提出:这些企业家们很少

承认或认为他们的行为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这不妨碍主流经济学家形式逻辑地从“利润最大化”原则推导出符合现实世界的大量命题。因为那些有效率的企业可以被工具性地认为是在追求最大利润。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命题:一旦群体中的多数人的行为不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能力。这一趋势在“后工业社会”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欧、北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当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进入了波特(M. Porter,1990,*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所论的“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时,人们会追求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追求文化生活的深入发展,而不再主要追求物质生活中的“效率”。换句话说,人的天性中存在这样的可能,当物质生活富足起来的时候,就去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以放弃“效率”为代价(人力资本投资以外的“闲暇时间”的不断增长就是对“效率”的不断放弃的结果)。诚然,这里所描述的是众多个体的行为,不是少数人的行为,绝非早期存在主义者们,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和克尔凯郭尔(《哲学断想》)所指涉的创造性的个体。在我看来,这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面对的第一种“危机”。这与前述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方式有密切关系。

其次,在许多层次的社会进化过程中,“竞争”未必成为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在文化生活中尤其明显。我们对文化“产品”的要求并不主要以“效率”为判据,而是以“多样化”为准则。文化生活越多样化,越复杂化,也就越丰富和具有意义。这里,线性的“进化观”是最为人们所不取的。不仅如此,而且我们发现,太激烈的竞争往往会扼杀了文化的丰富性(M. Feldman ,L. L. Cavalli Sforza, andL. A. Zhivotovsky,1994)。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时代总是与强大王朝的慷慨赞助有关,而香港式的竞争环境则很少产生大师级的作品(masterpiece)。道理很简单,竞争会强化“效率”动机,而注重效率会使人(通过社会分工)异化成为简单操作但规模巨大的机器的一部分。当我们发现不得不“组织起来”才能变得更加富足时,我们就陷入了异化为大机器的简单部分的危险。凡勃伦(T. Veblen,老制度经济学家)说,文化是一种“奢侈品”,需要所谓“有闲阶级”的创造(《有闲阶级论》)。现代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认为,竞争,尽管可以成为人的创造性的激励,但更多地是对创造性的压抑(S. Smith,T. Ward and R. A. Finke,1995)。总之,当竞争不是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时,经济学理性主义的进化论论据便发生了动摇。换句话说,即便是采取工具主义的立场,自利性

假设的进化论论据也难以成立。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发问:为什么要强加给我们这个“自利性”假设呢?它现在完全是多余的了;不仅如此,它甚至使演化成为过分简单的从而最终会消亡的过程。这在我看来,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面对的第二种“危机”。

## 社会博弈以及形式主义作为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最后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在福利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两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阿马提雅·森(A. Sen)曾经说过:经济学“理性”的涵义有两种:其一是指个体追求某种工具价值的“最大化”,其二是指个体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在他之前对经济学“理性”做了更为现代的表述的,是数学家纳什(J. Nash,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 1950 年 2 月写的一篇笔记(参见汪丁丁,1996c),他明确指出经济学家惯常使用的“效用函数”及其理论“需要更正”,并提出选择博弈论作为替代理论。他提出的“选择算子”(choice operators),在我看来,是目前为止对经济学效用理论加以改造的最富现代意义的理论工具。

事实上,我们从上述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或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被诺斯(North,因将交易费用理论用于经济史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称为“一切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同等重要的问题。

仅从最晚近的文献看,首先是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固定的“人性”的否定。这一否定导致社会科学整体性的危机。因为惯常从人性假设出发推导出一套理论体系的社会科学方法,不再是认识论上无懈可击的方法了。例如所谓“社会构造主义”(参阅 Vivian Burr,1996)所强调的 9 点创新之一是:个人特质(personality,翻译为“特质”或“人格”,都不妥当,应当与“characteristics”相区别,同时又不能与“human nature”太接近)与人性(human nature)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个体的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剩下来的,只是“场景”(situations)和与此相应的“身份”(identities)。个体变成了这些社会场景

中各种身份的集合体。这一看法,在社会学的现象学派的文献中得到最彻底的阐述(高夫曼,参阅 C. LemertandA. Branaman, eds. , 1997; E. Goffman, 1974, 1967, 1959)。社会通过语言、家庭、禁忌,等等,施加给儿童的塑造性影响(the shaping of personality)固然重要,但是个体,甚至从儿童时期开始,也对社会规范进行"选择性适应"(selectivity)。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与存在哲学联系着发展起来的(汪丁丁,1998),并通过法国学派[德里达,福柯(M. Foucault),利奥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符号文化批评[马尔库塞(H. Marcuse),本雅明(K. Benjamin)]得以发展。在文化批评领域以外,对"个体—社会"交互作用加以综合的当代理论家,如存在哲学家海勒(A. Heller)提出的"双重历史性"(the dual historicity)概念(A. Heller, 1986),以及世界领先的神经科学与演进人类学学者迪埃肯(Terrence W. Deacon,波士顿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暨哈佛大学医学院脑神经移植专家)今年发表的突破性的重要著作《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1997);最后是社会人类学权威科恒(Anthony Cohen,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关于"自我意识"形成过程的近著《自我意识》(1994)。

与自利性和"社会—个体"交互作用密切联系着的,是晚近围绕"新进化论"争论所开展的诸多研究。其中,包括坚持传统演化论最有力者,牛津大学第一位"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讲座教授理查德·道金(Richard Dawkin, *The Selfish Gene* 的作者),他在 1995 年的著作中,有力地反驳了"新进化论"者主张的革命和无限创新等观点;其他代表作有 1986 年的《目盲的钟表匠:为什么进化论事实向我们揭示出一个没有设计的宇宙》、1996 年的新著《攀登"不可能峰"》。此外,还包括演进博弈论的始作俑者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苏塞科斯大学荣休生物学教授),提出"演进均衡"的博弈概念,开展出一门正方兴未艾的"演进博弈论"新学科,其近著有《进化过程中的重大转折》。最后是所谓"英国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大卫·多尔士(David Deutsch,量子计算机理论创始人之一)今年发表的著作《编织现实的经纬:关于平行宇宙的科学——及其意义》,以及"复杂系统"研究的权威之一,皮尔·巴克(Per Bak),其贡献的新著《大自然怎样工作:关于自组织临界性的科学》。

我 1995 年和 1996 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两篇长文里讨论了当代社会科学面临的关于"理性"的困境。在我看来,走出这一困境的途径很接近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以及"交往伦理"的思路。不过,这相

当于一个多次博弈，其中每一个博弈者具有私人的知识传统，并根据这一“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波兰尼(M. Polanyi)的概念]的传统来阐释其他博弈者的行为。如果基本权利的界定是清晰的话，这个多次博弈应当存在纳什均衡，但纳什均衡的集合，在这些假设下通常会包含许多甚至无穷多的点；这些均衡点不会因为引进更精细的均衡概念(例如“完备均衡”)而减少许多，因为，它们的存在是与社会分工及各项知识的分立状态联系着的。对此，我们必须讨论“知识的互补性”(汪丁丁，1997b)，从而可以把可能的均衡点从本质上加以限制。从知识传统的角度对均衡点的数量加以限制，这需要引进“历史性”。引进这种历史性的方法之一，是让每一个博弈者把过去实现了的均衡，以及其他博弈者对这些历史均衡点的阐释，以矩阵方式排列出来，这个矩阵相当于博弈者的知识传统。据此，下一博弈的策略(基于对其他博弈者的行为的预期)得以制定出来。显然，这只不过是以博弈论的语言把哈贝马斯的思路再解释一遍罢了。但是，这种再解释，使得我们马上注意到“多均衡”的可能性[在哈贝马斯的理论里，“多均衡”是通过所谓“反思性交往”(reflexive communication)来消除的]。

经济学理性主义发展到这一阶段，可以说是走到了尽头。这里，我们看到的理性行为已经不单纯是个人效用的极大化行为了。因为，一次博弈的均衡可以使所有的博弈者都不满意(例如所谓“囚徒困境”)。我们不能再基于上述的工具主义立场，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为都“似乎是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的结果。有人使用“个体理性”和“集体非理性”来描述这种情况。不过我不太愿意使用“集体非理性”或者“集体理性”这类语词，那意味着存在所谓“集体的理性”(这在我看来没有定义)。不论如何，博弈的结局(例如某种社会制度的实现)并不符合个体博弈者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这使工具主义“理性观”很难立足。于是，经济学家必须放弃“作为价值最大化”的理性，而如森那样，把“理性”理解为“作为内在一致性的理性”。事实上，老资格博弈理论家奥曼(R. Aumann，以色列人，是对博弈论发展做了最大贡献的若干学者之一)早就说过：博弈均衡的涵义，归根结底在于参与博弈者在均衡点所采取的行为的“内在一致性”。

我之所以说作为内在一致性的理性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最后形式，是因为不可能存在比一致性理性概念更弱的理性概念。当“一致性”不再成立时，我们怎么能够继续把“理性”行为与盲目的行为区分

开来呢?

但是,接受作为一致性的理性概念对经济学保持"个体选择自由"的立场非常不利。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帕森斯提出"职能"概念的初衷是为了在群体内协调自由行动的个体(整体为自身利益为每一个个体规定一个职能),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对坚持"价格最大化"理性概念的经济学家来说,行为"规范"(norms),由于不是个体(价值最大化)选择的结果,不应当被用来解释个体行为。彻底的经济学总是坚持使用"成本"概念来解释一切现象,并且这里的"成本"总是指行为主体(具备思维能力的个人)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当经济学家试图用主观机会成本的概念来解释制度变迁现象时,危机便发生了(汪丁丁,1995)。

## 制度变迁与理性行为研究方法的转换

制度变迁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是在1989年以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不同,制度变迁的研究注重经济运作的政治法律历史及文化环境,力图从这一环境中抽象出对特定制度的运作成本有重大意义的非经济因素来。在制度与经济史研究领域里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立场:其一以诺斯的观点为代表,认为一个社会可能长期"锁入"贫困状态内;与此对立的是主流经济学[例如巴塞尔(Y. Barzel),华盛顿大学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看法,认为一个社会长期停滞在低水平发展阶段是不可能的事情。后者的论据在于,国际竞争迟早会迫使这一停滞社会要么改革以求发展,要么就消亡;而前者的论据是历史的,即目前所见到的各种社会经济当中,确实存在着长期停滞的经济。诺斯的看法里还包含着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怀疑:尽管我们可以谈论个人决策和个体理性行为,但是我们没有根据认为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的宏观行为必定是"理性"的。"囚徒困境"很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一个社会经济可能长期锁入"低水平重复"的陷阱。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看,人类社会只是到了最近的几百年才有了所谓的"发展"(即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超过每年2%)。在漫长的社会史上,人均收入的年增长速度几乎总保持为零。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西欧社会的崛起,人类的"经济生活"很可能仍然"锁"在一个零增长的状态内。诺斯由此非常关心所谓"李约瑟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在明清以后越来越迅速地落后于西方?

同样的两种立场也可以在中国经济学家们当中看到。例如,盛洪在《读书》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就是持了诺斯的立场。而樊纲在《21 世纪》上发表的一篇讨论"理性制度"的文章,虽然对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非理性方面进行了批评,但基本上还是持了主流经济学的立场。如前述,这两种立场也许都适用,即取决于具体场合下,在一个群体中,"生存竞争的压力"占不占主导地位(以"权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来度量)。我认为(1995),就制度的大范围变迁而言,没有哪一个个人的选择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的大范围变迁基本上是社会博弈的结果,不管理性的个人喜欢还是不喜欢。

制度经济学,尤其是大范围制度变迁的研究所涉及的对所谓"制度非理性"问题的解释,使得制度经济学家们往往不能依赖于大范围的经济统计数据。因为,一个地区或一个群体内部所实行的各种制度(与经济行为有关的),很可能与其他地区或群体不同;而且,这些不同很可能是经济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况且,目前流行的各种类型的经济统计(这些统计指标大多是从发达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借来的),总是倾向于抹杀具体制度之间的区别,总是试图把效率上的差异解释为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投入量上的差异。美国统计学家丹尼森曾经做过大量工作来改进经济统计上的这一"制度取消"问题。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甚至提出"不用任何理论来度量经济增长"(measuring economic growth without theory)的口号。丹尼森独自计算了美国全要素增长率的"要素"变化(所谓生产函数估计的"残余"问题,以及"残余的残余"问题)。靠了引进例如人口转移和教育改善这类"制度因素",他最终得以解释美国经济增长率的 80%,而在他之前,传统的统计方法顶多解释 60%。

传统的、基于主流经济学假设上的经济统计数据,对稳定社会的经济分析很有帮助。而在社会转型期,各种制度的大范围变迁和各个局部制度上的千差万别,使"过渡经济学"的研究者们不能不更多地依赖于"案例分析"的方法。从经济分析史上看(参见 J.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Chapter3),经济学家使用的"案例分析"方法近似于社会学家使用的基于韦伯的"理想型"(ideal type)的研究方法。但是,案例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的背景下,又有了新的涵义:每一个具体案例都获得了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所谓的"微小叙事"的合法性:千千万万个"微小叙事",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

生活世界，构成现代社会每一类现象（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的社会交往“景观”。国内不少经济学家（例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的学者们），在案例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正在成为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目前关于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方面还有待改进。一方面，研究者仍然不可避免地带着主流经济学的“前理解”框架去观察和理解特殊的案例；另一方面，案例所讨论的“地方性知识”传统内的行为到底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是否理性？”而是如麦金太尔所问的：“何种理性？”

在中国以外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们，正在不同方向上改造经济学。我可以简单地举出若干个近年较有影响的流派：（1）诺斯的新制度学派，目前正试图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引入制度演变的微观过程中来。（2）威廉姆森（O. Williamson，新制度经济学家，其思路不同于诺斯，也不同于芝加哥大学的科斯）的新制度学派，大量收集和分析商业案例，从现实中发展制度创新的合理根据。（3）阿克尔洛夫（G. Akerlof，著名的“柠檬原理”的提出者，经济学家）领导的一小群学者，致力于所谓“PSA -Economics”（P，心理学；S，社会学；A，人类学；Economics，经济学）的创建。（4）埃兹额尼（A. Etzioni，乔治·华盛顿大学校聘教授）创立的社会经济学（socioeconomics），试图以康德的义务论道德哲学改造和融合主流经济学所根据的密勒的效用主义道德哲学，重建经济学于人的双重性格（自利性和社会性）之上。

## 结　语

以这篇冗长而又有限的介绍性文章，旨在说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是与当代思想界的所谓“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密切关联着的。现代性问题的现实背景在于人从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中寻求精神自由的努力。当生存竞争的压力逐渐淡出社会生活的时候，当文化的品味和丰富性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的时候，或者，当社会制度发生大范围变迁的时候，经济学传统的“理性”假设开始失去解释力。另一方面，经济学理性主义自身的完善过程，最终也把理性概念带到“社会博弈”的语境中来了。在社会博弈中，理性只能是作为“内在一致性”的理性。然而哈贝马斯的被公认为过分“理想主义”的交往理性遇到了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理

性?")的相当现实的挑战。这一问题的现实性,通过博弈论——作为一致性的理性——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描述——所谓"多均衡"的可能性,构成了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严重挑战。

也许,关于"理性"的理解问题最终不可能有一个"如此这般"的解答。换句话说,我们只能有从各个不同角度出发的对"理性"的理解。也许,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伦理最终得以实现,人们从而可以达成对"理性"及理性行为的共识。也许,如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所见,这个被千千万万"微小叙事"的合法化撕裂了的社会,最终只能达成政治层面上的共识——容忍各种不同的伦理、文化,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不可沟通的巨大差异。也许,如自由主义神学家们努力促成的那样,人们最终在与神的对话中达成人与人之间的深刻谅解,实现康德式的"永久和平"。也许,古典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会有"社会"(how is society possible),正在与当代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什么是"理性"行为,融为同一个问题:作为一致性的理性是否可能?而这个问题正是"现代性问题"的转化形式(汪丁丁,1997b)。也是因为这个道理,我把这篇文章交给《社会学研究》发表,希望以这个纠缠了经济学家多年的问题就教于国内社会学家们。我相信,社会学家们,以及社会科学其他方面的学者,也同样正在受到这个问题的纠缠,如此,分离的各个学科之间的综合也便有了希望。

## 参 考 文 献

汪丁丁,1996a,"'卢卡斯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经济研究》,1996 年 3 月。

1991,"资源经济学前沿问题",《管理世界》,1991 年 8 月。(已收入汪丁丁著《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1992,"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经济研究》,1992 年 5 月。

1994,"近年来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及反思",《经济研究》,1994 年 10 月。

1995,"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经济研究》,1995 年 9 月。

1996b ,"产权博弈",《经济研究》,1996 年 10 月(两文均收入汪丁丁的文集《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1996c,"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涵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 年秋季卷。

1997a,"回顾金融革命",《经济研究》,1997 年 12 月。

1997b,"知识沿时间与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经济研究》,1997 年 6 月。

1997c,“试说‘现代性问题’”,《读书》,1997 年 6 月。

1998,“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通论)”,《公共论丛》,1998 年。

Alasdair Macintyre,1998. *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George Homans,1987. “Behaviorism and After”, in A. Giddens and J. Turner, eds. *Social Theory Toda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 Smith, T. Ward, and R. A. Finke, 1995, *The Creative Cognition Approach*, MIT Press.

Vivian Burr,1996, *Social Constructionism*, Routledge Publishing.

C. Lemert and A. Branaman, eds., 1997, *The Goffman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

E. Goffman,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Harper & Row 1986.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Dell Publish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Dell Publishing.

Terrence W. Deacon, 1997,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 W. W. Norton.

Anthoug Cohen, 1994, *Self Consciousness: An Alternative Anthropology of Identity*, Routledge.

Richard Darkin, 1995, *Riverout of Eden: A Darinian View of Life*, Harper Collins.

1996, *Climbing Mount Improbable*, W. W. Norton.

1986, The Blind Watchmaker: Why the Evidence of Evolution Reveals Universe Without Design, W. W. Norton.

John Maynard Smith, 1995, *The Major Transitions in Evolution*, W. H. Freeman Publishing.

David Deutsch, 1997, *The Fabric of Riality: The Science of Parallel Universes—And Its Implications*, The Pen-guin Press.

PerBak, 1996, *How Nature Works: The Science of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Springer-Verlag.

# 经济学的系统思维

张五常
（香港大学金融学院荣休教授）

科斯九十四岁了。最近动笔写一篇抨击经济学发展的文章。他对此发展感到失望二十年了。大师中可能布坎南被骂得最厉害。对艾智仁、弗里德曼等比较客气，只说他们不懂新潮经济学在搞什么。

两个强烈对比的例子或可澄清一下。一位朋友的儿子在美国某大学上经济研究院，学的微观经济全是博弈理论，什么需求定律、成本理念等一概不懂。另一位朋友进入美国另一家经济研究院，微观经济的规定读物全部是我做学生时读过的。那是四十年前。换言之，这家研究院的老师显然认为四十年来没有什么文章值得读，就连区区在下的几篇得意之作也放过了！一国之内，两家研究院各走极端，是否代表经济学迷失了路向呢？

批评经济学的发展容易，但要指出问题所在是另一回事了。最近在这里发表“经济学需要学吗？”一文，获得很大的回响。该文提到经济学是一套系统看世界的思维，指出这套思维不易在大学课程学得到。同学们希望我能详加解释。想了几天，得到答案，也认为这答案可以解释为什么科斯等人对经济学的发展那样失望。

经济是一门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以理论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的学问。这样看，经济的科学方法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没有两样。后三者被称为“自然科学”，而经济则是“社会科学”了。要注意的，是在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的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完全一样。

方法一样，但实践的做法不同。不是吗？无论是物理或化学或生

物，学子从中学起就要在实验室做实证工作，不断地做实验，到大学到研究院到专业到退休为止。天赋冠于人类的爱因斯坦，搞纯理论，早期也出自实验室，后来关注外人的实验成果。爱因斯坦有资格搞纯理论，后来还是纯理论误导了他。世间有多少人敢说自己有爱因斯坦的天赋呢？

经济学的困难，起于这门学问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没有听过学校里有经济实验室这回事。学经济的读历史，可以有读他人的实验报告之效，但史实往往不尽不实，可以误导，而没有理论基础的历史缺少了系统约束，很有点天方夜谭。在经济研究院写论文，算是实证研究的，其实是拿一些政府或机构搜集的数字，用计算机作回归统计分析。统计技术可以超凡，困难是结论不一定可靠。另一方面，他人发表的数据，不一定代表真实世界的现象。数之不尽搞数字统计的人，不知数字从何而来，或代表什么。

要在经济学搞纯理论吗？天赋高如萨缪尔逊或阿罗，提出的理论往往与真实世界扯不上关系。科斯的观点不一定对，但我是同意的。他认为要解释世事，我们要首先知道世事是怎样的。就是说，要解释现象，我们要先有现象在手。换言之，不管现象的真实性而搞纯理论，是闭门造车。可以命中而解释现象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有名的不用实验室而想出来的伟大例子。我们没有听过经济学出现过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奇才。

不要误会，虽然他们对解释现象的命中率不高，我欣赏萨缪尔逊与阿罗的纯理论：他们的论著与思维给了我不少启发。但我认为要在经济学搞纯理论，有他们的天赋差不多是起码的要求了。三十多年前几位师友认为我应走纯理论的路，但自己衡量，认为这条路走不通。

这就带来本文要说的重点。今天的经济学不重视真实世界。从事经济学的人没有在真实世界这个唯一的经济实验室操作过。虽然生活在真实世界，他们没有视之为实验室地作观察研究。他们没有翻来覆去地把现象与理论印证。统计数字容易错，既不够广，也太轻浮。博弈理论大搞了二十多年，严格地说，到今天还没有解释过一个真实世界的现象。

传统的经济理论多得很，有深有浅，有精彩的也有怪诞的。这一切大学可以教。然而，熟读这些理论，懂得透彻，不等于掌握了一套有系统的经济思维。掌握这套系统的法门，是要天天拿着理论与真实世界的现象印证，正如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或生物学家天天在实验室操作

那样。经济学的理论那么多，世事那样复杂，一个学者不可能全部掌握。有了一般的理论基础，从事的人就要跑到世界实验室试做验证。每个人的际遇不同，兴趣有别，理论的取舍与轻重之分就因人而异了。淘汰或选用理论是在世界实验室的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到了某一个里程从事者会察觉到自己掌握了一套有系统的经济思维。每个从事者遇到的现象有同也有别，而达到了掌握之境的，每个人的系统也不一样。因此，经济学的系统思维不可以在大学课程传授。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对世界的观察是大场面，洞察力强；李嘉图与马克思集中于土地与劳力，忽略了其他资产，也错于成本的理念，理论于是失误频频；穆勒掌握了成本，但对经济现象的划分不够一般性；马歇尔对竞争有深入的体会，明白经济整体的运作，可惜对成本的理念搞不清楚；罗宾逊夫人以理论发扬马歇尔，但对世事知得不多；凯恩斯走货币理论的路，搞起宏观经济，但脱离了马歇尔的微观传统，有所不逮。新古典经济兴起之后的古人，没有瑕疵的只有一个费沙。

还健在的大师怎样看呢？篇幅所限，这里只略说三位自己很相熟的师友。科斯对垄断与广播行业的真实世界知得详尽，对成本理念的掌握有独到之处；艾智仁体会真实世界的生产程序，对竞争与价格理念的掌握前无古人；弗里德曼对不同货币制度与政府管制知得多而深入，是我认识的唯一能把价格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会贯通的人。可见，要掌握一套有解释力的系统思维，从事的人一定要在真实世界的实验室的某方面操作多年。

我自己呢？靠街头巷尾的现象起家，只掌握需求定律的运用与局限条件的变化。雕虫小技，不合大人，但也是一套完整的有系统的经济思维了。

#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 ——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天则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在已经出版了第一批成果[①]。这批成果的一个显著特点，即系统地将自科斯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发展运用于中国近年发生的制度变迁，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同时，这项研究也比较系统地在中国实践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但是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已有评论的注意。因此，这篇读书笔记就侧重讨论这项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并借此机会和读者交流学习科斯研究经济学方法的体会。

## 科斯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科斯有一个迷人的特点：他的研究成果好像总也造不成“立竿见影”的“轰动效果”。读者中一定有人知道，科斯在 1937 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要到二三十年后才被世人刮目相看。后来大行其道的“交易费用”概念，据科斯自己回忆，形成之时约为 1932 年。其时，科斯只是一个中国人所讲的“小年轻”，在英国一家经济和商业学院里担任“担心备课达不到水平”的助理讲师。五年后，论文发表，师友学长中

① 见张曙光执行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 1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有人前来道贺,但竟无一人认真讨论科斯的新见解。当时看好这篇论文对经济学发展有异常贡献潜力的,好像只有科斯自己(他当时写信告诉友人,"我不相信我的一生中还会做出如此重要的工作")。到20世纪50年代,论文被选入美国一本重要的文选;60年代,有人在脚注里加以引证;70年代,开始有人讨论;直到80年代,引证和讨论才突然与日俱增,以致"比前40年的总和还要多"。1991年11月,当科斯在斯德哥尔摩为他在交易费用、产权、企业和社会成本问题上对经济学的贡献而领取诺贝尔奖时,他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垂垂老矣。

不过,即使在科斯名扬四海之后,还是很少有人谈到他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贡献。我们看到,无论行家里手们同意不同意,"科斯定理"已经被广泛"考虑"过了。"交易费用"概念,有人阐述,有人运用,有人批评,也已经广泛地、甚至过于广泛地被"考虑"了。"社会成本问题"的理论,对产权、商业纠纷、环保和其他公用财产的利用,以及一切具有所谓"外部效果"的合约问题的深远影响,更是有目共睹。但是,科斯是何以得出这些影响和改变当代经济学的成果来的?科斯的研究方法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问题就少有人问了。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科斯简白的"散文"式论述中,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高深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时代的潮流好像就是宁肯崇拜"高深"而误入歧途。也许需要另一个40年,科斯"研究真实世界"的质朴手法才会引起应有的注意。

其实,科斯1937年的论文恰恰是从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开篇的。他在一开卷就指出,过去的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并批评许多经济学家在建立一种经济理论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在开篇第一段落里,科斯阐明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managable),而且必须是"真实的"(realistic)。这里讲到的assumption,常常是所谓"不言自明"的,本身并没有被验证过,甚至从没有被清楚地交代过。但是,前提性假设却限制了"可验证的假设"(testable hypothesis)的提出范围,影响到验证方向和验证手段的选择,作用于对验证结果的理解。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假设的真实性涉及能否使假说经受检验的条件要求)。

但是据科斯自己在1988年的一次讲演中推测,多数读者都忽略了他的这个方法论的意见,以致在阅读时会跳过这个段落(而一位叫Putterman的先生果然在一次再版此文时将这一段落全部删去,见

Coase,1988,第52页)。我们当然不得而知,有多少中国读者在阅读此文时跳过了这一段。我自己的经验是,虽然读了这一段,但还是误认为科斯的这段话无非是客气地引用并同意罗宾逊夫人的论点。后来,当我读了上引科斯的讲演稿,才知道科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意见完全与罗氏相左!因为罗宾逊夫人的论点是,经济学的前提性假设必须是易于处理的,如果我们能处理的假设不现实,我们也只能别无选择地利用这些不真实的假设。科斯当时就反对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了其"易于处理性"而牺牲前提的"真实性"。科斯明言,他的目标是发现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

这里所谓"易于处理",就是指易于运用经济学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来处理要研究的问题。这一点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在一个分工的知识结构中,专门学科的知识和技巧的累积对于提高认知的效率有重大意义。科斯并不反对假设的"易于处理性"。他反对的只是把"易于处理"作为选择前提性假设的唯一条件,特别是反对为了"易于在经济学上处理"而不惜牺牲前提的真实性。在科斯看来,这种为了易于处理而放弃真实的倾向,已经导致如下不良倾向:"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引文出处同上)。如果经济学家都如此"经济"地生产论文和著作,他们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和关系吗?

科斯选择了一个相反的替代:用真实的前提替代想象的世界。他要的是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科斯自己的工作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在科斯之前,经济学已经累积了关于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的大量知识和分析技巧。但是,以往的经济学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性假设是,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本身的成本为零。在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下,人们无从理解真实市场里一些复杂的组织和合约(如企业),甚至对此视而不见。科斯首先修订了"市场交易的零成本"假设,代之以一个"交易费用为正"的真实前提,然后将组织(企业)同(交易)成本分析连接起来。到了这一步,真实世界里的企业和其他复杂的合约形式,就变得在经济学上"易于处理"了,因为经济学以往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特别是边际分析),都可能用来分析被以往经济学忽略、但在真实世界里却存在的组织和合约。

## 如何做到“既真实又易于处理”?

欣赏科斯贡献的我们不免进一步要问:怎样得到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呢?对此,科斯在1937年可是半点天机也不曾泄露。要到50年后,科斯详尽交代了写作那篇论文的起源、含义和影响(见Oliver,1993),我们才可以从中领悟到科斯所取方法的由来。以下三点是我体会到的关键。

### ☞ 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

据科斯自己讲,他的经济学训练主要是在商学院里完成的。商学院的一个特点是注重实例研究(case study),也就是通过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来研究理论。因此,科斯一边跟着一位叫Plant的老师学习价格机制,一边对英国的公用事业下调查工夫,并且累积了研究真实的企业所必要的知识(如商法、产业组织、金融和会计)。可能正是这种“两线学习法”(一线理论,一线实例),使年轻的科斯一上手就“碰”到问题:如果价格机制可以自动配置资源,为什么还有不同的工业组织?后人可以看得清楚,科斯能够“碰上”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发展的大幸。当时也许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起了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是科斯没有对真实的企业下过工夫,他断然“碰”不到问题,或者“碰”上了也会擦肩而过。事实上,科斯的实干使他不但“碰上”问题,而且碰上就抓住不放,尽管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根本不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如何寻找“在价格机制起作用的现实世界里企业存在的原因”?下面这句话我认为可圈可点:“我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引文出处同上)。这就是科斯的态度。他为此在1932年利用伦敦经济学院提供的旅游奖学金,安排了一次远渡大西洋的游历:考察美国的企业和工业组织。科斯在美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访问工厂和公司的主管,通过与“真实家伙们”的交谈来发现他脑中挥之不去的疑问的答案。科斯为此可不吝啬时间,也不怕因为刨根揪底式的收集实际资料而“弄脏了自己的手”。作为年轻学人,科斯当然也访问了美国的学院和书斋,不过他只用“很少的时间去听课”。即便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奈特先生教授的课程,科斯也不过旁听几次而已。科斯关注的问题不是从

先辈学者的著作里找到的，因此他也不指望从现成的著作里找到现成答案。1932 年的美国之行，使科斯果然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的理由。回到英国后，科斯在 1934 年写下了他的草稿。三年后，这篇几乎未经修改就发表的草稿，就是今天举世皆知的“企业的性质”（注意：牛顿的故事，苹果落下树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发现万有引力）。

### ☞ 重点调查现实的约束条件

真实世界五光十色，因此到真实世界里求学问并非一件易事。科斯的法门是，着重调查问题的现实约束条件。他到美国调查企业时，心中想的是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但问出口去的却并不是“贵企业为什么存在……”这样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科斯到处发问：“企业在什么条件下购买产品，在什么条件下购买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自己制造？”这其实就是在调查企业存在于市场的约束条件。我们知道，科斯不用“虚例”而偏爱用实例。“虚例”是想象世界的简化，比如在经济学著作里屡屡出现的“孤岛上的鲁滨逊”之类，其好处是“易于处理”，用得好可以有助于说明复杂的理论。但虚例的危险性在于可能完全不反映问题的现实条件。试想如果问题都“虚”掉了，答案怎么可能增加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呢？在这一点上，“实例”的比较优势显而易见。实例是真实世界的简化，因此实例中总是包含着现实约束。不过，在简化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时，也有可能将一部分重要的真实约束简化掉。所以科斯不但偏爱用实例，而且偏爱用经过他本人下工夫调查的实例。比如英国历史上的灯塔究竟是政府修建的还是私人修建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如何通过分配频道资源集中了权力，福特汽车公司与其零配件厂的一体化程度，在这些著名的问题中，科斯都是一面利用大量一手或二手的材料弄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一面自己来对事实“简化”，从而得到可用于经济学研究的“够格的”实例。这很好地表明了科斯工作的重点。

### ☞ 把实例一般化

实例包含了回答问题的要素，但是实例本身并不能自动回答问题。从实例的研究到得出对真实世界里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解，中间还需完成一个跳跃，这就是把实例一般化。让我

们回到科斯的企业研究：他不但调查了一批美国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在什么情况下制造”的实例，而且从中把各个不同的现实情况一般化为如下这样一个判定：“如果企业为购入要素自己制造而支付的费用低于它直接从事产品买卖的费用，企业就制造；反之，企业则购买。”这个一般性判定是思维上惊险的一跃，因为科斯从中提炼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经济学概念——交易费用。经此，“企业”和各种复杂合约就如同“产品和劳务”一样，变得“易于处理”了。以往的经济学忽略了交易费用，或者不言自明地“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所以无法分析市场里的各种组织；科斯从实例中一般化出交易费用，扩充而不是抛弃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之可以“处理”企业问题。因此，当我们读到“企业的组织费用在边际上等于企业支付的市场交易费用”时，我们再也不会吃惊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的句子了。这说明，科斯的实例研究可不是满足于那些“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资料”，他要“咀嚼”实例，把实例一般化，直到得出“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

以上讨论表明，至少有三个关键词在科斯的方法论里占据重要地位：真实世界、实例和（把实例）一般化。这也提供了是否运用科斯方法的几个恰当的“指标”。下面，我们就据此来评论天则所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我们将看到，天则所研究成果的长处和不足，是可以通过这几个关键词的讨论来发现的。

## 引人入胜的真实世界

天则研究所的这批研究成果首先显示，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经过经济学家的精心整理，可以变得如此引人入胜。细究起来，真实故事引人入胜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往往与“大家公认”的逻辑相抵触。在这种场合，“公认”会发生的没有发生，而“公认”决不会有的事却偏偏来了。在这类“与常理不合”的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恐怕要数那些与“权威”的预言或断言不相一致的真实了。任何一个喜欢探究的人不免要问：为什么“反常”？这样的故事读着就会来精神。

举几个天则所提供的例子吧。比如人们曾经公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不会（或不应该）允许任何一种计划额度（票证）的买卖合法化的。这种共识的合理性在于，计划额度（票证）乃政府发出的分配凭

证,并不是"由劳动创造",本身"无价值",要是官方容许计划额度买卖,岂不就是纵容"不劳而获"?迄今为止,上述公认的逻辑在绝大多数场合依然有效,因为官方对为数不少的计划额度(票证)的地下买卖,从来都是采取禁止、打击和取缔的立场。但是,有一个却是例外:外汇额度交易。盛洪抓住这个例外细说从头,研究其何以从非法买卖演变成官方许可的合法交易,并且成为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这样的故事当然引人入胜:政府在什么条件下承认并保护"权利的交易"?又比如,人们公认"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从几十年前宣传计划经济优越性,到近几年批评经济建设中的时弊,"无政府竞争造成的浪费"总是一个基本的论据。但是,刘世锦、江小涓深入冰箱行业的调查,却表明恰恰是这种伴随着"浪费"的竞争,推动了冰箱行业的质量进步和规模经济,同时,正如张维迎的评论指出的,还有效地缩短了满足社会需求的时间。在这个冰箱的故事里更为有趣的是,那些以废除竞争、"计算起来更优"为特征的所谓"产业政策",不是根本无从实施,就是浪费更为严重。这些事实与"常识"如此不一致,人们总会有兴趣多看一眼"不应该有的"事实吧。

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恐怕要数成都和上海两地股票市场的案例了。这两个故事堪称"上品",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记录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一个重要进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很好地表明,比较复杂的交易形式所需要的那些支持系统,可以怎样"反常地"在中国形成。不少学者相信,应该在初级市场改革(如产品市场放开)的成果稳固之后,应该在企业改制见效之后,应该在一系列法规建立健全之后,特别应该在政府有条不紊的周全安排下,才可以考虑开放比较高级的市场(如股票交易和期货交易)。这或许正是耶鲁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警告中国政府在20年内不要开放股市的原因之一(见吴敬琏的转述,1995,第9页)。但是,杨晓维关于成都"红庙子"股票交易自发成市的出色研究,却表明在某种条件下(一个足够强的盈利预期、政府放宽管制等等),个人和自愿团体也有可能主导"为完成复杂交易不断界定产权"这样似乎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公共品的供应。"红庙子"发生的事的确是一个"倒爬楼梯"的个案:在初级交易还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大体靠自发势力实现了股票这样符号化产品的高级交易。这个故事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它"不合已有逻辑"的真实。你看,在法规、服务和什么都不健全或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这些四川

人居然用钱买“纸头”而使交易达到“每天 10 万—30 万人、成交额 1 000万元”的规模!

相比之下,陈郁提供的上海股市的故事就不像“红庙子”那样大起大落。不过,上海的真实也同样引人入胜:无论政府如何努力“规范”股票的柜台交易和场外交易,这种交易的“私人契约”特性——自由成交——总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是在“合法”、“非法”或“半非法”条件下实现私人契约的交易费用)。这场“规范”与“(持股人)牟利本性”的博弈,一直到上海证交所——一种把股票自由竞价制度化的组织——成立才算告一段落。陈郁的故事说明,那些试图“消灭”千千万万股民卑微的牟利动机的“规范”根本不会成为“秩序”之源,因为它们总是无法实行。上海的公开和私下的股票柜台交易最后落得了一个比成都“红庙子”市场更长远的制度结果。不过这一点不重要。制度演化史并不以成败论英雄。重要的是这两个故事共同揭示了在真实世界里制度和组织变迁的动力机制。伦敦、纽约和香港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有许多因素共同起了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成文的规范条款里去探查,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因为在每一条成文规范的底部,都熔铸着深厚的由利益驱动的自发努力、创新尝试、出了格的想象力和“家伙们”的看似疯狂。对自发性毫无理解的人要称懂得市场经济,恐怕只是他自己在自说自话。

引人入胜的故事,得来却不容易。天则所的同仁看来直接秉承了科斯的作风:“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制度变迁的问题和答案(樊纲研究非规范财政,还要走进乡村机构的办公室)。这种工作在哪里都不容易,但由于以下几点更加显得困难。第一,天则所项目确定的研究对象——制度变迁——本身比一般的研究科目更难以观察;第二,几乎任何一个领域、方面或组织的实际情况的累积性报告,在我国好像都特别稀缺,加之有限的一点资料还因为部门、地区分割以及“保密”等等而变得更为零碎;第三,成果评价系统对事实含量高的研究的激励不足。因此回过头去看,天则所组织这么一个立足真实个案的大型研究,没有很大的一股劲要去实践自己选定的方法论,恐怕是做不下来的。在张曙光关于这个项目的说明和“课题计划书”里,我们就可以读出这么一股“气”来:“本项研究不仅要补上案例研究的空缺,而且要从中探索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道路。”为了多读到引人入胜的故事,我愿意在此高喝一声:此志当贺,愿君能长久。

## “看不见的”约束

每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里，至少可以提出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抓到了问题，如何“打开”呢？上文说过科斯的办法是，侧重调查问题展开和问题解决的现实约束条件。对于制度性约束这样的“社会软件”，科斯从人或组织的经济行为的结果出发，追寻那些“看不见的”制度约束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在天则案例里包含了相当多一等一的制度变迁问题。紧接而来的，是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这些“似乎不该发生的”真实的现实约束条件，并通过这种揭示，增加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在这一方面，我对天则所首批成果的评论是，一些案例做得比较好，一些还不够好。

比如张宇燕研究的联通公司案例。张的问题极为重要：为什么国家在电信业这样一个重要、敏感、自然垄断特性明显的部门放松了管制，准许联通公司冲破邮电部的独家垄断？张宇燕的报告，至少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他具备回答这一重大问题的实力和潜力。第一，张文清楚而简洁地勾勒出电信行业从独家垄断到“双头竞争”的全貌。由于本案例涉及电信业整体、三个相关部委、军队机构和国务院高层决策，调查难度极大，写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第二，作者的理论修养使他直抓问题要害——国家扩大特许权而弱化了垄断。但是，当本项研究展开到要回答“国家在何种约束条件下才‘反常’地放松了电信管制”这一中心问题时，张却用“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电信业的放松管制直接滥觞于财政拮据”（第 167 页）——代替了进一步的调查。事实上，张的判据并不充分：“我们至少可从表面上看到，电信业放松管制与财政困难同时出现这一‘巧合’，其背后可能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第 157 页）。这其实只是一个猜测，因为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并不意味“有必然联系”。猜测常常是需要的，因为猜测有可能成为进一步调查（验证）的题目。问题是作者再也没有下工夫调查他猜测到的“某种必然联系”而是引用了一番诺斯和希克斯关于 17 世纪英国国王通过出售特许权增加财政收入的见解，就断然写下了他的“基本判断”。对此，一位看来非常熟知电信行业的评论人秦海，指出张的这一判断“是武断的”（第 182 页）。本书执行主编张曙光，在介绍张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之后，也指出“把电信业放松管制归之于财政困难并不确切”（第 19 页）。但是无论秦海还是张曙光，都没有提供出一个更

好的解释。秦海的替代性结论是“中国电信业的放松管制是电信业生产力变化的结果”(第182页),张教授的则是“其直接原因是巨大需求压力下的高额盈利的吸引”(第19页)。不知各位读者以为如何?我读了这两个替代性的结论,反倒觉得还不如张宇燕原来的猜测更有潜在的说服力。不过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两位评论人都没有从方法论上批评张宇燕,也都没有“咬住”张非要他继续调查否则不放他过马。对此我的批评是,他们和作者一样,把“调查现实约束”这一重点看轻了。“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放松电信管制”,如同“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在什么情况下制造”一样,是关键的关键。在这样的关节点上,猜测也罢,大经济学家已有著作的启迪也罢,都有意义,但都代替不了真刀真枪的对真实原因的探查。

有趣的是,当盛洪研究“为什么外汇额度交易被唯一认可”和张曙光研究“中国如何走向放开粮价、取消粮票”这两个案例时,他们的灵感也共同来自诺斯“财政考虑基本左右着政府的决策”的观点。这不奇怪,因为在诺斯之后,要成功地解释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动力机制而无视诺斯的见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同样的财政补贴压力,为什么在外汇交易上是允许其合法化,在粮票问题上却选择了压缩计划购销、扩大自由粮食市场的路线呢?就这一点而言,把盛、张两例放到一起后反而没有一个清晰的图像。因为还有一个好奇心没有被充分满足:承认外汇额度交易合法化和顶多默认粮票非法买卖的,难道不是同一时期的同一个中国政府吗?怎样说明同一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歧呢?我认为这里的弱点可能是作者在重点调查约束条件时,在取舍方面下的工夫不足。试想当年福特汽车公司决定一部分零部件自己设厂制造,另一部分购买时,一定有许许多多的因素起了作用。科斯在调查时,一定花费工夫对所有因素进行取舍,否则他怎么会最后集中到“工厂组织费用”和“通过市场购买的费用”这个要害的约束条件上来呢?在现实的、诸多的约束条件中,必有一些更一般、更重要、更根本的。研究中不仅要通过调查“取”这些重要的约束条件,而且要经过调查分析“舍”掉那些无关紧要的因素。否则,下一个步骤——“把个案一般化”——是无从入手的。

对照起来,本书关于自发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的研究,给人留下的印象简明而清晰。成都“红庙子”案例的中心问题是“自发的股票交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达到可观的规模?”杨晓维回答这个问题不凭猜测,也不靠灵感,而是把注意力“聚焦”在调查一个物件上——股东

身份证的复印件。调查的中心线索是,“同时持有记名股票和原始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是否可以过户?”可以过户,股票自发交易——一种权利的交易——就有了保障;不可以过户,自发交易图利就没有制度基础。“红庙子”自发股市的“弱小—兴盛—衰竭”三部曲,果然就是与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不被承认—承认(企业承认而地方政府不反对)—不承认(明令禁止)”相对应。我们都知道从权利确立到权利的可交易,是制度变迁中的惊险一跳。新制度经济学对权利界定和权利可交易性的讨论,包含着复杂的内容。但是我们(至少我自己)绝不可能想象、推理和设计出,支撑一项(颇为复杂的)权利交易的最必备的制度条件可以如此“简陋”。分散的自发创新过程所拥有的成本最小化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陈郁的调查更进一步,他发现在上海股票的自发交易阶段,“过户专业户”甚至有本事为那些没有原始股东身份证的“最次品”股票办成过户手续,因而那里大规模的股票私下交易是通过一个“分工结构”来实现的。经济学家通常是通过“价格差”来解释“交易”的。似乎只要差价——买入卖出股票的差价,买卖票证的差价以及诸如此类——足够大,交易就会发生。但是,把差价转化为当事人的收益需要“看不见的制度”的支撑。杨晓维和陈郁眼力不凡,一个看见了“身份证复印件”,一个看见了“过户专业户”,大大帮助我们理解真实世界里权利交易的约束条件。

## 把实例一般化

天则所首批成果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我看来是“把实例一般化”。这并不是说,天则的案例研究缺乏理论色彩和理论深度。恰恰相反,本书理论要素的密集、新颖和广泛,不但以往许多调查报告集不可比拟,就是相当一些“理论专著”也难以望其项背。比如唐寿宁讨论的“立宪性规则选择缺失条件下的行政性一致同意”,就是交给北京大学的博士生班去阅读,也还是可能令人担心其内容过于艰深。从这一点看,本项研究绝不是就事论事之作,符合项目设计中“进行经济系理论创新”的自我期许。

问题是,“前理论十足,后一般化不够”。此话怎么讲呢?九篇案例研究报告中,至少六篇的引言或导论立足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提出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前理论十足”。提出问题,描述个案,分析讨论,假设检验,一路来到结论。但是,在本书绝大多数篇章的结论里,

作者们似乎都没有费心把他们研究过的实例一般化。这不免令人读来气短。

口说无凭,有兴趣的读者还是随我快速翻阅一下九篇案例报告的结论部分。樊纲和刘世锦、江小涓两篇,结论用来讨论政策;孔泾源和张曙光则集中展望制度的演化方向(一个正向,一个逆向)。政策和展望当然重要,但它们都不是对实例中的经济行为或制度变迁过程进行抽象而得出的一般化结晶。张宇燕的案例分析理论性很强,但结论部分不知怎么来了一个"中国古典式"的模棱两可:"国家垄断的强化和弱化,特许权的扩大与缩小,至少用历史眼光看,恐怕也只能是一件因时而论而定的事情"(第172页)。唐寿宁越写越实,图书馆的案例被放到附录,全篇以故事和故事的概括收尾,没有为提炼他的故事留下空间。陈郁结论中的"经验总结"部分一样是故事的概括,而"理论总结"部分里的概念,如他的评论人张军先生批评的,"并没有在先前的案例分析中得到相应的体现和运用"(第53页)。换句话说,那不是陈郁自己研究过的实例的一般化,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文献里借来的一般化。

在我读来,九篇中只有杨晓维和盛洪两篇的结论用心对实例中的行为和过程抽象。杨晓维的故事一流,已如上述,他的结论也提升了实例中包含的有关"制度创新"的一般道理。但是,杨的结论似乎仍然过多地受到经济学家已有"框架"的束缚。"红庙子"的故事其实已经表明,所谓"自发的"股权交易不仅包含着纯粹"私人和自愿团体"的努力,而且包含着地方政府的默许和中央政府的鞭长莫及或眼开眼闭。"红庙子"的兴盛,是私人和自愿团体在盈利潜能的驱动下,与地方政府利益达成一种默契的结果。后来这个默契瓦解了,股票交易也由盛转衰。因此,这里有可能得出比林毅夫"自发的制度创新和强制的制度创新"范式更为丰富的创新范式。创新可能超出了纯粹私人自发的水平,但却还并不是政府强制性引导的结果。只要私人努力"诱致"政府不反对或默许,制度创新也可能发生。但是杨的结论限于"自发创新"和"强制创新"两个范式的讨论,虽然他对政府强制创新模式留下了深深的怀疑。我自己在研究农村改革的实例中也发现,包产到户合法化,就既不是纯粹的私人努力,也不是政府强制性创新所能实现的。它是在农民和政府(首先是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中达成的(周其仁,1994)。这里正好一并提出来求教于杨晓维、林毅夫和其他读者。

盛洪的结论部分对计划权利的交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合法化作了很好的一般化归结。从结论里，我们得到的对计划体制转型的认识，超越了外汇额度交易这一个案例的范围，而达到更一般的理解。盛洪的结论不是没有再讨论的余地，但在科斯方法论的意义上，我对他的结论没有批评。顺便提一下，这个案例的写法几乎没有“前理论”色彩，盛洪显然把抽象的力气都留到了后部，也就是把实例一般化。在天则所的同仁当中，只有盛洪一人访问过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得到过科斯的当面指教。也许因此盛洪的研究写作风格受到了科斯的“传染”。问题是，盛洪的“再传染力”要是再强一点就好了。

我们当然无从知道天则所首批成果在“把实例一般化”方面普遍薄弱的全部原因。只有他们自己的总结才更可靠。但有一个推测我要不揣冒昧地在此提出，这就是研究工作中的资源配置（研究基金和时间）失当。据我观察，现在利用基金，特别是国际基金的研究项目，几乎没有不重视事实调查和数据收集的。但是，往往“粗材料”到手之后，精力、钱和时间都不多了，只好匆匆了断，再奔下一个。其结果，对千辛万苦收集的原材料没有精加工。原料还没有被充分“咀嚼”，就“上市、出口”了。1991 年我刚到洛杉矶的时候，南加州大学有位教授研究中国的乡镇企业。我们一起谈过几次，也收集了一批资料。过了不久，他们写出了一份 200 页的项目书，内容包括背景、问题、已有文献、假设、模型、数据来源说明和初级检验结果。这份项目建议书显然要比国内许多研究成果还像“研究成果”。后来我知道，在美国手里拿着“半成品”或“大半成品”申请研究基金的可不是少数。这种“国际惯例”对科学研究的利弊如何，我没有全面评论的资格。但是这种做法至少有一点好处，一旦得到资源，便有力量对“半成品或大半成品”施加精加工。有此认识，我才敢在今年斗胆向樊纲建议，希望改革研究基金会，考虑向近十年利用各种基金做过的一些大型研究项目追加一点资源，专门用于开发其中可能潜在的高附加价值。天则所的这批成果，花在再加工方面的资源应该说已经不少，这从本书执行主编给许多作者的建议修改信和评论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但即使如此，本项研究中残存的附加价值还是极为可观（比如许多评论人的好意见，还没有在研究报告的定稿本中被吸收）。因此，福特基金会如果有意，不妨考虑对这批已经对真实世界下过工夫的作者们追加一点资源，专门用于支持他们再整理、再提炼和再“咀嚼”，专门用于逼迫他们“静想”和“静写”。如此，大有希望“憋”出一些对中国制度变迁的更

高质量的“一般化”认识。

## 超越“实证经济学”?

在利用科斯方法论的几个关键词对天则所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作了一番散漫的评论之后,我想回到对科斯方法论的一个“误会”来结束本文。科斯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常常被叫做“实证经济学”。更为广泛的,是把一切研究现实的作品,都称之为“实证经济学”。例如,本书[①]执行主编张曙光就把案例研究看成“是进行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第6页)。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因为涉及哲学上实证主义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经典的实证经济学强调理论的精确性可以由假设与事实的一致性而得到基本检验(Robbins,1932)。但是,自从弗里德曼1953年“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的论文发表之后,此种经济研究方法论变得特色鲜明而影响广远。弗里德曼的中心论点是,各种互相竞争的理论的优劣,应当以它们产生的预言的准确性来衡量(Friedman,1953)。对于弗里德曼来说,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预言(prediction)是经济研究的核心。如果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能与事实“令人惊奇地一致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有没有现实的基础并不重要。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简洁的、想象的预言能被验证,说明理论能用较少的投入解释大量的事物,恰恰是理论“经济性”的表现。简言之,预言的现实性并不重要。弗里德曼自己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就是如此。“永久性收入”并不是可以观察的,但是这一想象的假说与居民住户的消费数据之间的一致性却比凯恩斯理论的说明更好。虽然弗氏的这种实证经济学后来受到许多批评,如萨缪尔逊指责这是蔑视逻辑法则,但是经济学家试图“猜出”一个同数据更一致的预言的方法,还是大行其道。

科斯对以上方法都不满意。对于罗宾斯式的以检验假设与事实一致性为中心的实证经济学,科斯强调假设必须首先是真实的。对于弗里德曼式的,科斯更是斩钉截铁地表示“经济学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在预言的准确性的基础上选择他们的理论”(Coase,1988,第52页)。科斯并不认为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是提出预言并检验这些预言。经济学家要选

---

① 指《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编者注。

择理论，可靠的基础在科斯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实而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科斯毕生的工作，就是在发现、找寻“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前提。众所周知，他终于找到一个，这就是“真实的市场交易费用不为零”。根据以上讨论，我以为科斯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不同于实证经济学的。原则的区别有两点：(1)前提性假设必须真实而又易于处理；(2)主要使命是发现世界自身的逻辑从而增加我们的理解，而不是预言和检验预言。诚如科斯自己在获得诺贝尔奖时所言，他没有给经济学贡献过什么高级的理论，但他的工作——找寻一个更现实的前提性假设——却给经济学的结构带来根本的变化。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能比实证经济学在后辈学人里获得更大的回响吗？它能比实证经济学累积起更丰盛的研究成果吗？它真能够弥补实证经济学的方法里还包藏着的“脱离真实”的那些缺陷吗？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们也不必为这些终究要由“市场”来决定的问题过于劳神。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了不同于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知道有一小批经济学家开始实践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作为中国读者，我们还格外高兴地知道，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开始了它在中国的实践。天则所的工作还不是完美无缺，但他们比较系统地开始了。这一点十分重要。

# 美国经济学教育体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方汉明
（耶鲁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我自1994年离开复旦大学赴美留学到现在，一晃就已经有十一个年头了。我出国时国内似乎尚无互联网，所以我当时对到美国攻读博士意味着什么所知甚少，而且绝大部分是从先前留美的师兄师姐那里听来的。十年来我对美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了解得多了，但似乎对国内十年来的进步所知甚少。所以，当梁晶老师约我就中国经济学教育撰文时，我有点犹豫。我觉得还是利用自己的优势谈谈美国经济学教育体系，也许国内的读者能从其中得到一些启示。

## 本科、硕士和博士生

美国的本科生教育总的来说偏向于综合素质教育。高中生被录取以后往往要到第三年初（Sophomore）才选定专业。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往往要上很多其他学科的课程，以防止学生过早偏科。我任教的耶鲁大学甚至规定一二年级的本科生要选修一定数量的人文、自然和外语课程。在耶鲁和其他很多大学里，经济系本科生必须从经济系开的课程中选择十一二门课，包括必修的经济学入门课（Introductory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中级课程（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统计计量和一门数学系开的数学课。经济系的本科生毕业后很多到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政府部门做初级（entry level）雇员，很多人在工作几年后再读工商管理硕士，很少一部分会选择立刻上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在耶鲁，每年

140 名经济专业的本科生只有 5—6 名)。有攻读博士学位职业志向的学生一般会受到教授的指点,在本科时就选上更多的数学课,甚至会在本科时就选听经济系的研究生课程。

美国很多偏重于研究的经济系(包括几乎所有的名校)不设置专门的硕士项目(Master's Program),很多人在读博士过程中能自动取得硕士学位。硕士项目往往由偏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公共政策学院和排名偏后的经济系提供。

美国的博士项目(Ph. D Program)主要目的是培养研究型人才。经济系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入学申请。一个由 5—6 名经济系教授组成的录取委员会会阅读申请材料,并从中选择最优秀的学生给予录取和奖学金。值得一提的是,博士生录取完全由这个录取委员会的教授们决定;不在这个委员会的教授可以给学生写推荐信,但不能告诉他们应该录取谁。

一年级的博士生基本上都修相同的课程:(1)高级微观经济学,往往包括消费者和厂商理论(Theory of Consumers and Firms),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2)高级宏观经济学,包括经济增长理论(Growth Theory)和商业周期理论(Theories of Business Cycles);(3)概率论、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Probability Theory,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Econometric Theory)。所有的一年级学生必须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名称各异,Qualification Exams, Core Exams, Prelim Exams,等等)。系里一般会给学生两次机会,如果两次都不及格就会自动丧失继续攻读博士的资格。资格考试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最后所有的学生都有能力从事研究和完成博士论文。

两年级学生开始选修更专业化的课程(Field Courses)。主要的专业有:微观经济理论 ( Microeconomic Theory)、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劳动力经济学(Labor Economics)、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等。当然,不是所有的经济系都五脏俱全,甚至有些名校有的时候也不能配置所有的专业课。一般学生会选择至少两门专业。两年级的课程比起一年级课程来说,学生阅读的不

再主要是教科书，而是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原文，甚至尚未发表的工作性论文（Working Paper）。二年级的专业课人数比较少，因此学生课上参与讨论的比较多，这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近和了解教授，以便成为论文导师的主要机会。如果说一年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上课、作业、考试和存活（survive），二年级学生要培养的最主要的技能则是评论性（或挑战性）文献阅读（Critical Reading）。这是一个学生从上课到自己从事开创性研究的关键技能。Critical Reading 要求读者能对所阅读的论文（不管是理论性还是经验性研究）提出以下质疑：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motivation）？文章的主要假设是什么，是否合理？文章的方法和发现对理论或政策有无重大意义和广泛应用？文章有哪些缺陷，能否改进？最后要求读者对文章作出一个客观的综合评价。在一定程度上，Critical Reading 要求读者扮演一个匿名审稿人的角色，尽管所读的文章有可能已经发表了。

博士三年级又要经历一个更大的飞跃。所有博士项目都要求学生开始思考自己的研究课题，实现一个从上课（Course Taking）到独立的开创性研究（Independent Original Research）的转换。大部分学校要求学生在三年级末或四年级初确定博士论文课题（Dissertation Prospectus）。确定博士论文题目，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通常要求学生能对有关文献的前沿（Literature Frontier）有一个充分的掌握；阐述自己的研究课题有如何创意和对如何完成研究课题有一个十分具体的时间安排，包括数据收集、建构基本理论模型等等。

四五年级学生则是集中精力写工作论文（Job Market Paper）以准备找工作。在自己的研究之余，四五年级学生通常要求频繁出席（如果不是一次不落的话）系里有关专业的研讨会（Seminars），对同学的研究做出建设性的评价（Constructive Comments），有时还要在系里的研讨会上提交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找工作之前的模拟演习）。

在上述的时间线中，很多学生在二年级之后会做系里的助教和助研。助教对外国学生尤其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锻炼自己用英语交流的机会。助研则在一定程度上与“徒工”相似，给予学生一个完成教授布置的研究任务过程中理解研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 经济学家就业市场

一般博士生在完成和精心修改（polish）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以后

开始寻找职位。有必要指出的是,美国经济系的博士论文根本不要求写一本专著,通常的博士论文由两三篇相关课题的论文组成。工作论文(Job Market Paper)由这些论文中的一两篇组成。博士生的工作方向有教育机构(Academia)、私人企业(Private Sector)和政府机构及国际组织(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我本人比较熟悉的是教育机构的工作。找到教育机构工作最重要的是论文质量和导师及学校的推荐。由于美国经济学期刊实行匿名审稿人制度,因此发表周期很长,所以找工作的博士生一般都没有已发表或已被接受发表的论文;一般根据系里教授对文章的评价决定是否录用。

美国经济学博士找工作是一个重大问题,具体情节对第一次找工作的人来说相当复杂。所幸的是,一般系里有专门的教授(Placement Officers)指点迷津。钱颖一教授曾经撰写"经济学家在美国"的文章对经济学博士找工作做了较详细的介绍,我不在此多述。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各系基本上不直接雇佣自己培养的博士生,即便是自己最优秀的毕业生。这个习俗如何形成我并不明白,但是它至少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防止近亲繁殖,有助于学术观点多维化;第二,有外部市场对学生论文质量作出评价而不是系里的有关老师说了算,这防止学生将大量精力放到政治交易(Politics)上。

## 经济学研究

经济系培养的博士必须能够独立从事开创性的研究。高质量的经济学研究并没有一个模式。比如说,最近几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的 Matthew Rabin(2001 年), Steven Levitt (2003 年)和 Daron Acemoglu(2005 年)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风格;他们相同的地方可能只是他们的开创性。

### ☞ 理论(Theoretical)与经验(Empirical)研究

美国经济学界对理论(Theoretical)和经验(Empirical)研究都很重视。一般的经济学家要么从事纯理论或应用理论研究,要么从事经验研究;但最近十年来能两样都做,因而能将理论和数据结合起来的学者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人们往往把理论研究等同于数学化模型,其实不然。一篇好的理

论研究要用的数学工具完全看其需要。在观点创新等同的前提下，越浅显易懂的论文越受到重视。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主要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主要发表观点创新、浅显易懂的论文；而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的主要期刊 *Econometrica* 主要发表数学更高深的文章。值得指出的是，数学比较浅显易懂的论文要想发表到《美国经济评论》这样的顶级期刊上必须有相当新颖的观点；而数学高深的论文要想受人重视，其技术方法必须有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家毕竟不是数学家，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懂所有的数学。对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数学头脑（Mathematical Sophistication），也就是说在必要时能够自己吸收有关的新的数学工具。

美国的经验研究不只是看数据，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经验研究方法的研究，因为任何一篇以数据为主的论文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取决于所用的研究方法。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James Heckman 的选择模型（Selection Model）完全改变了之前的关于劳动力供给（Labor Supply）的研究成果。经验研究所用的数据偏重于美国的数据，虽然最近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用得越来越多。美国的数据来源各异，有政府（如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Census Bureau 等）收集的，也有营利或非营利的私人机构甚至个人收集的；也有数据并不是特意收集的（比如工业组织重用的 Scanner Data 就是商家在经营中自然产生的）。总的来说，美国的数据强调其精确度和可重复性。很多期刊要求作者把数据提供给想要重复研究成果的其他研究人员，作为接受其文章的条件之一。

在经验研究方法上，美国经济学界有两大派别：Reduced Form Approach 和 Structural Approach。我不知道这两个英语术语该如何翻译成中文。这两大派别的区别在于它们对经济理论在经验研究的作用。Reduced Form Approach 认为，经验研究应该让“数据自己说话”（Let data speak for itself）。他们认为经济理论模型是研究者的意志决定的，把研究者的意志强加到数据上面而得到的结论只有在模型正确的情况下才会正确。因为研究者不可能知道什么模型是正确的，他们的主要研究工具很简单：使用各种各样的回归分析（Regression）。Structural Approach 则认为，数据不可能完全显示自己是怎么产生的（Data only can never reveals its own data generating process）。Structural Approach 原创于考尔斯基金会（Cowles Foundation，现位于耶鲁大

学)，Jacob Marschak 是早期的阐述者。Structural Approach 认为，如果说经济研究的目标是数据产生的结构(Data generating process)的话，那么只有在研究者的模型的协助下才能了解数据产生的结构，即便研究者的模型可能是错误的。Structural Approach 在科学研究方法上很接近于物理学家。物理学家要了解物质如何运转，他们经常提出模型，然后用实验检验。物理学家的模型可能是错误的，即便模型与目前所有的数据符合。但是没有模型，物理学家的理论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一大堆无模型的数据不能被用来预测(Prediction)。Structural Approach 的经济学家注重模型，注重估计模型中的原始参数(Primitive Parameters)。所谓的原始参数，指的是那些在偏好和技术方程中的参数。这些参数不会因为政策干涉而变化 (Invariant to Policy Interventions)。因此，Structural Approach 得出的政策预测能通过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相反，Reduced Form Approach 研究所估计的参数多数不是原始参数，因此无法用来进行预测，尤其无法预测从来没有实施过的政策会有什么影响。

### ☞ 学院(Academic)与政策(Policy)研究

对经济研究另一个有用的归类是学院和政策研究。美国教育机构的教授主要投身于 Academic 研究，目标是将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并不直接关注这些论文能不能直接产生影响政策。学院研究者并不受其他利益的支配，因而观点比较客观。相反，政策研究主要由 Think Tank 和政府机构研究人员执行，代表这些机构的利益。美国大学教授每年必须向学校申报除工资外得到的报酬和来源，强调研究者要避免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

## 研究成果交流：工作文章(Working Paper)、研讨会(Seminars) 和 学术会议(Conferences)

美国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它的研究成果交流体系，这包括工作文章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研讨会系列(Seminar Series) 和学术会议(Conferences)。基本上所有主要的经济系都有自己的工作文章系列，以便外界的学者能有机会了解本系教授的最新研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系列现在很多都只发电子版，因而成本

也不是很高。近几年来,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SSRN)成为这些电子工作文件的清算中心。这给在同一个领域工作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个互相了解最新研究动向的最好机会。

研讨会(Seminars)则提供了一个更加动态的交流机会。美国高校经济系都有专门的资金邀请别的学校或其他机构的学者到本系讲述自己的最新论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使得系里的教授和学生能够掌握系外学者的最新研究,同时也给系外学者提供了交流意见、批评和反批评,以及最终改进文章的机会。前面已经提到,系里的教授和学生一般都积极参加本系组织的研讨会,并在研讨会积极发言。有趣的是,一个教授的名声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在研讨会上给别人提出恰到好处的评论和建议。

学术会议(Conference)给研究者提供一个更加浓缩,但是多变的交流机会。美国经济学会每年组织年会(Annual Meetings),计量经济学会每年组织夏天和冬天两次年会,其他大型年会还有动态经济学会(Society of Economic Dynamics)的夏天年会、金融学会(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的年会、公共经济学会(Pubic Economic Society)的年会,等等。除了这些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公开投稿、学科综合、广泛参与、时间较长的学术会议以外,美国还有很多小规模的、课题比较专门、参与者以邀请为主的短小型会议。比如说,著名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简称 NBER)每年组织很多领域的小型会议,只邀请 NBER 自己的会员和几个最有关的局外人员,时间上只有一天或一天半,所以可以在周末举行。很多系本身也会举行一些小型会议。比如耶鲁大学的考尔斯基金会(Cowles Foundation)每年会举行一些课题不定的小型会议。大型会议的好处在于听众较多,起到"一石多鸟"的目的;缺点是时间较短,因而在讲述论文上往往只能蜻蜓点水。小型会议则给予论文提交者较多的时间,因而在讲述论文上能比较深入,并且可以和与会者有较多深入的探讨和会后的交流。

## 研究成果的发表:期刊体系和匿名审稿制(Anonymous Referee System)

我个人觉得美国经济学教育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它的研究成

果发表体系。美国经济学界有一批层次不一的期刊体系，包括最顶尖的五大综合性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Econometric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P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RES）和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这五大综合性期刊中，*AER* 和 *Econometrica* 分别是美国经济学会和计量经济学会的主要期刊，一般由很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任主编，主编是哪个大学的并不是确定的；JPE 和 QJE 则分别由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主编，从不例外；RES 是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的主要期刊，主编总是由欧洲的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担任，同时也有一个外国编辑组（Foreign Editors），一般由美国教授组成。五大综合性期刊以下还有少量的二流综合性期刊，包括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国际经济评论，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日本的大阪大学经济系主编），*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 年创刊取代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成为欧洲经济学会的主要期刊）和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 年前是欧洲经济学会的主要期刊，后来因为欧洲经济学会和其出版商 Elsevier 的矛盾而独立）。

各个专业有自己的顶尖专业期刊。比如，*Journal of Finance*（金融），*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宏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经济理论），*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工业组织），*Journal of Econometrics*（计量经济学），*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公共经济学），*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劳动力经济学），*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发展经济学），*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国际经济学）等等。顶尖专业期刊又有二流专业期刊，在此不一一列举。

所有期刊都采纳匿名审稿制（Anonymous Referee System）。匿名审稿制有两种形式：双重匿名（Double Blind）或单重匿名（Single Blind）。所谓双重匿名，是指作者不知道谁是审稿人，审稿人也不知道谁是作者；所谓单重匿名，是指作者不知道谁是审稿人，但是审稿人知道谁是作者。当然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审稿人能从论文的题目很方便地查出文章的作者，所以匿名审稿制最重要的是作者不知道谁是审稿人。因为作者不知道谁是审稿人，审稿人能够毫无顾忌地阐述自己对论文的真实看法。期刊的主编在收到投稿以后，一般会根据文章内容将论文寄给两三位对本课题有较深入研究的学者请求审稿。审稿人要写一篇匿名的审阅报告（Referee Report）和一封给主编的信。审阅报告一般对论文详细评述，指出错误，提出改进的建议，等等；给

主编的信里，审稿人则对此文是否适合发表作出推荐。主编根据审稿人的推荐和自己对文章的看法可以选择“拒绝”(Rejection)，“修改重投”(Revise and Resubmit)和“接受”(Accept)的决定。

层次不一的期刊体系起到了给文章“测定质量”(Quality Certification)的作用，而匿名审稿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发表的文章的质量。很多期刊都采用了数据公开化的政策，以便保证经验性论文的结果能被其他学者重复(Replicate)。

目前美国经济学期刊体系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发表周期(Publication Cycle)太长。一篇论文从初稿到最后见到打印稿至少要两年以上。这一方面显示了对发表文章质量的严格要求(因为一篇论文往往要经过好几轮修改)，但也严重影响了教授评估，因为很多年轻教授往往在第五六年时仍然没有什么已发表的文章。

## 教员的评估：终生教授(Tenure)制度

对所有在美国教育机构任职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来说，最大的首要目标是取得终生教授职位(Tenure)。在美国一旦取得终生教授职位，就意味着终生就业有了保障，因为除非犯罪，大学不能解雇取得终生教授职位的教授。

取得终生教授职位的难度当然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在什么大学，但是所有的研究性的大学授予终生教授职位主要看其研究成果，包括已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等等，一定程度上还要考虑到未来的研究计划。不同大学的标准有所不同，但不同标准只是一个量的区别。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芝加哥等名校取得终生教授职位要求最为严格，往往要求候选者已经是有关专业的学术领头人。评终生教授职位不光光看文章数量，更主要的还要看文章的质量，要看文章是否发表在顶尖期刊上。

从助理教授到评终生教授的时间因人而异，有六年、七年、八年和九年不等；有的学校还会给生育小孩的教员一些延期。总的来说，一旦助理教授到了评终生教授的时候，系里会让其提交所有有关的材料，包括简历、论文、研究计划阐述等等。系里会请求该助理教授有关领域的本校以外的知名教授写推荐信，以便取得信息决定是否应该给该助理教授终生职位。

取得终生教授职位对助理教授提供了工作的强大动力。在美国

学校里经常能看到助理教授比研究生工作更加努力的例子。可是,一旦取得终生教授之后,又有什么机制保证教授们继续有努力工作的动力呢?当然,绝大多数终生教授有内在的动力(Intrinsic Motivation),他们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也会尽力投入研究。美国的经济学家劳动力市场也提供一些外在动力。比如说,在工资上终生教授的涨薪可能跟其论文发表有关,更重要的是,只有活跃发表的教授才有可能从其他的好学校拿到抢挖的高薪聘书,而拿到外校高薪聘书往往是涨薪的主要途径。

在名校取得终生教授职位很难。那么,如果没有拿到终生教授职位又如何呢?很多人会在其他学校拿到终生教授职位;有些人会再寻找一个助理教授职位,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发表文章;也有人转向私人企业或政府机构及国际组织任职。有趣的是,有研究表明,没有拿到终生教授职位的人,几年之后一般跟取得终生教授职位的同行基本上同样快乐,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 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启示

以上我对美国经济学体系作了一个较详细的介绍。总的来说,它包括博士生培养、博士生工作市场、研究成果交流、研究成果发表和终生教授制度五个方面。未提到的还有一个"认可制度"(Recognition System)。美国经济学会最有名的奖可能是前面提到的克拉克奖章(Clark Medal),每两年颁发一次,并且只授予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另外的荣誉有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Distinguished Fellow,这是一个终生成就认可的荣誉。

中国经济学教育跟国际接轨才刚刚起步,路程还很遥远。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要培养国际性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等到中国培养的经济学博士能够在欧美市场找到就业和能在国际著名的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就像中国培养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一样。这显然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欧洲经济学界培养的经济学博士最近十年越来越多地在美国找到工作证明这个目标在长远是可行的。

在短期内,中国经济学显然是更加应用型的,而且应用也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改革出现的现实问题。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觉得短期内中国经济学教育可以从美国借鉴的是:将经济学博士和应用性的公共政策博士区别开来;经济学博士生课程在条件

成熟时与国际接轨;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学博士就业市场,减少甚至取消留本校任职;将学院研究和政策研究分开;注意大学教授下海产生的利益冲突;教员考核制度更加注重开创性研究成果。

我认为,中国经济学教育跟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有很多国际性期刊。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再增加国际性期刊。毕竟,中国出版的国际性期刊如果只有中国人读的话是不会有多大的国际影响力的。德国、日本和法国都没有自己国家的国际性期刊。我认为,中国应该花大力气收集更多的跟中国经济问题有关的数据,并将其英文化。我觉得中国经济学教育跟国际接轨的突破口在于以国际认可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这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是有利的。我觉得美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甚至包括中国历史,都充满了兴趣,但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 后 记

历史上中国的农耕文明虽然孕育了丰富的经济思想和塑造了士大夫“经世济民”的人生情怀，但中国的古典经济思想并未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学科和理论，究其原因，简单的说是缺乏可以以“一”贯之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而在西方，自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以来，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科学，已经存在了近300年的历史。受其启发，先哲严复洞见到经济学研究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也正是通过他的翻译和引介，开启了中国引进和传播经济学的先河。

由于特定历史发展轨迹的影响，没有一个时代可以与今天的中国对经济学的巨大需求相比，更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赋予了经济学家如此重大的责任、如此多的荣誉和如此高的期望。众多优秀的人力资源已经被吸引和投入到经济学研究的工作中，但是直面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实现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难怪陈志武教授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喟然感叹：“‘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已八十多年，今天我们还在为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谁是主流、谁是非主流以及什么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展开争论，这本身说明经济学在中国还在初步形成，并没有成熟，更谈不上中国经济学家不久要主导经济学世界。”其根本症结正如林毅夫教授指出的即“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于对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的关注，我们从大量文献中精选了11位经济学家的15篇讨论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教育问题的代表性文章，编辑了这本《经济学方法——十二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文章的观点都是每位作者结合自己的长期研究经

验，以其国际学术的眼光，针对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提出的真知灼见。我们相信本书的读者一定能从中体会到现代经济学研究的要旨和精髓，我们更期望本书的出版能推动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这里首先对英年早逝的杨小凯教授表示纪念，他的去世不唯是学术界的损失，也使我们无法征求他对本书的意见。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衷心感谢其他作者的授权和支持，特别感谢陈志武教授越洋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也感谢复旦大学刘昶研究员、李俊慧博士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编　者

2006 年元旦